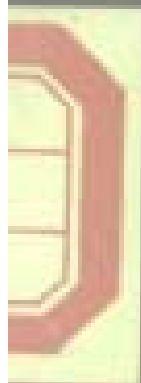


陈独秀年谱

王光远编 重庆出版社

1879—1942



70549

陈独秀年谱

中華書局
上海
一九八〇年
王光遠編

王光远编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登林
封面设计：王孝国
技术设计：郑汉生

王 光 远 编
陈 独 秀 年 谱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48 千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800

*

ISBN 7-5366-0372-X

K·22

书号：11114·124 定价：2.85元

目 录

| | |
|---------------------------|-----|
| 一、青少年时期(1879.10—1901.10) | 1 |
| 二、辛亥革命前后(1901.10—1915.9) | 6 |
| 三、五四运动的主将(1915.9—1920.4) | 24 |
| 四、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4—1924.1) | 84 |
| 五、在大革命洪流中(1924.1—1927.7) | 153 |
| 六、从取消派到托派(1927.7—1932.10) | 275 |
| 七、狱中生活(1932.10—1937.8) | 325 |
| 八、晚年(1937.8—1942.5) | 345 |

DIBS/22

一、青少年时期

(1879.10—1901.10)

1879年

10月8日 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市)。原籍怀宁县广圩陈家破屋(现广圩区白泽湖乡沈店大队)，后迁居到安庆市里北门“后营”(现116医院隔壁)。

陈独秀，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此外还用过重甫、众甫、仲、仲子、仲山、实、实庵、由民、顽石、撒翁、郇儿、春水、雪衣、D.S、CC生、独秀山民、熙洲仲子等笔名。

陈独秀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习儒业十二世”，号称“义门陈氏”。初时家道小康，其叔父陈衍庶中举做官后，始成为有名富户，在贵池县有土地800多亩，在安庆市四牌楼附近有铺面房产多处，光绪末年，又在南水关盖了大片私宅。并在上海开有金店，北京琉璃厂开有“崇古斋”古玩店，奉天设有分店，在辽宁省彰武县还有土地200亩左右。当时人称之为“安庆望族”。

1881年 2岁

10月7日 清光绪七年农历中秋节，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病逝于江苏省苏州市怀宁会馆，终年34岁。

陈衍中，字象五，生于1848年10月15日（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十九日）。曾中秀才，性情温顺孝敬，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书。讲求实学，不喜陈腐八股。逝世前在苏州窦军门家中任塾师。他的人品才学，对陈独秀有一定影响。

陈衍中共兄弟四人，长兄陈衍藩（1841—1861）曾给杨厚庵当保幕，后为太平军刺伤，伤病而死。次兄陈衍藻（1846—？）早夭。四弟陈衍庶（1851—1913）。

1885年 6岁

是年 陈独秀开始随祖父陈章旭读书。

陈章旭，字太占，又字晓峰，即《实庵自传》中所称之“白胡爹爹”。生于1819年9月17日（清嘉庆二十四年己丑七月二十八日）。曾得过“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头官衔，但从未放过实缺，终年在外教书或作幕僚。有一定学识和才干，家谱称他“精明强干，迥不犹人；上恢先绪，下启后昆”。思想守旧，脾气古怪，对幼年时的陈独秀曾寄以很大的期望。

1889年 10岁

7月10日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六月十三日，祖父陈章旭去世，终年70岁。祖父死后，曾为陈独秀请过多位塾师，但都不满意。后跟随哥哥陈庆元继续读书。

陈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生于1872年2月4日（清同治十年辛未十二月十六日）。长陈独秀7岁，府学廪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为人忠厚老实，有一定才识。他知道陈独秀不喜八股文章，因此，除经书外，还教他读《昭明文选》。

陈独秀还有两个姐姐，大姐适吴向荣，二姐适姜超。

1896年 17岁

是年 陈独秀参加了县考，宗师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对这样不通的题目，陈独秀“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他大哥看了文稿后，“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以为必然落第。谁知却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录陈独秀为第一名，成了青年秀才。亲朋们都夸赞陈家祖坟风水好，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

是年 陈独秀正式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

陈衍庶，字昔凡，自称石门渔隐、石门湖叟，生于1851年11月24日（清咸丰元年辛亥十月初二日）。1875年（光绪元年）中举人，曾任怀德、柳河知县等官职，后又授任辽阳州，升凤凰厅，钦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1908年左右致仕归里。他的诗文、书画都有相当成就。陈衍庶没有子嗣，很喜爱陈独秀，曾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诲。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怕连累自己，表面上去宗祠办了“退继”手续，但暗中仍给以接济。陈衍庶死于1913年5月18日，终年64岁。

1897年 18岁

8月 陈独秀随大哥陈庆元等人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据陈松年等人回忆,陈独秀没有考中。据其表弟濮清泉回忆,陈独秀曾考中举人,陈家曾为此“开贺”一番)。

通过这次乡试,陈独秀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认为所谓“抡才大典”,不过是开了一次动物展览会。从此,促使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由“举人、进士、状元郎”的道路,走向了“康党、乱党、共产党”的道路。

是年 陈独秀与高大众(一说名高晓岚,大众为其乳名)结婚。高大众是安徽霍邱高登科之长女,高当时任安庆营统领,后升为副将,因立有军功,清廷曾赏穿黄马褂,且有世爵。高大众生于1877年2月12日,长陈独秀三岁,目不识丁,“与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婚后感情不融洽,“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去日本留学时,“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钁作游资,坚决不肯”。高大众是延年、乔年、松年及长女筱秀之生母,于1930年9月9日病逝,终年55岁。

冬 陈独秀回安庆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共6948字,文章概述了扬子江流经的区域、流程、主要江段名称、水势及各地军事设防情况。他自称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防备列强侵略,而献策于政府的。他说:“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文章以木刻竖排本印行,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撰。此后,陈独秀文名远扬,被誉为“皖城名士”。

1898年 19岁

春 陈独秀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前身，1897年为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是清末著名的新式书院）。陈独秀住在杭州肖寺。因有反清言论，被驱逐，逃往南京，结识了正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不久回到安庆。

是年 陈独秀同大哥陈庆元一起，随嗣父陈衍庶去东北，曾在其官署里做过文字性的工作。

是年 陈独秀的长子延年诞生。

1899年 20岁

是年 陈独秀的生母查氏病逝，终年47岁。查氏为怀宁查传芳之长女，生于1852年1月27日（清咸丰元年十二月七日）。陈独秀称她是“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她受旧礼教影响较深，吃斋敬神，但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她对陈独秀的影响较大。

1900年 21岁

是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趁机侵占东北，血染海兰泡，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因东北战乱，陈独秀随大哥陈庆元由东北返回安庆。

是年 陈独秀的长女筱秀（玉莹）诞生。

二、辛亥革命前后

(1901.10—1915.9)

1901年 22岁

10月 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他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并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此时，陈独秀曾一度参加了“励志会”。

“励志会”成立于1900年春，是旅日留学生中最早的团体之一，该会人员复杂，既有进步留学生，也有宪政派分子，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机分子也混迹其中。关于该会宗旨，有人说：“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也有人说：“惟言维新而已”。该会“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所以不久就分化了。陈独秀和张继等人先后脱离该会。

陈独秀在日本仅学习半年即回国。

1902年 23岁

春 陈独秀回国途经南京时，曾同江南陆师学堂的汪希颜谈教育问题。他说：“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育为人道之本，无德则无以立，智必不醇。”

春 陈独秀偕潘赞华返回安庆。不久，与武备学堂学生

柏文蔚、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及葛渭仲、何春台等人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并在安庆城内孝肃路北正街创办了藏书楼，开辟图书室，展出革命书刊。又发起组织了演说会，他和葛渭仲等人发表爱国演说，进行反清活动。这一切，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陈独秀被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被迫再度逃亡日本。

秋 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冬 陈独秀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20多人组织了“中国青年会”，它是从“励志会”中分化出来的，“励志会中意气发舒者别为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日本留学生中最早的爱国团体之一。陈独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合影留念。

此时陈独秀结识了苏曼殊，成为他的挚友之一。

是年 陈独秀出版了一本《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是为新学制小学堂编写的教材。署名陈乾生，石印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是年 陈独秀次子乔年诞生。

1903年 24岁

4月 由于帝俄强占我东北，又不肯按照《满洲撤兵条约》撤兵，反而提出了7条无理要求，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不满。

4月29日 由钮永建、秦毓蓂等人发起，日本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推蓝天蔚为队长，学习军事，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战场。

5月8日 湖北学生王璟芳向驻日公使蔡钧告密，说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不久，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要求，勒令解散义勇队，留学生们更为气愤。一夜，陈独秀相约友好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闯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把姚的辫子剪掉，“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事后，姚呼请日本警察抓人，酿成交涉，陈独秀等人被迫遣返回国。

5月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又利用青年励志学社，仿效东京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效命疆场。

5月17日 陈独秀在安庆组织了一次有300多人参加的爱国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抗俄，号召大家团结奋斗，齐雪国耻。他用自己在东北目睹的事实，控诉了沙俄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他的演说“词情慷慨，满座歆嘘”。5月25日上海《苏报》报道了开会的消息，26日发表了他的演说，署名陈由己。

这次集会还接受了陈独秀关于组织“爱国会”，出版《爱国新报》的提议，当场有126人签名，并公推陈独秀、潘缙华等7人起草章程，社章规定其宗旨是：“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他们还准备与上海爱国学社和东南各省志士联合，进一步创办国民同盟会，争取南方独立。

5月24日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为清廷两江总督侦知，密令皖抚缉拿为首者。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谕以

学生不得“干预国事，鼓惑人心”。陈独秀被迫潜往上海，西学堂被封闭，安徽大学堂开除了十数名“议论拒俄”的学生，青年励志学社也从此星散。

7月7日 由章士钊担任主笔的上海《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入狱。

8月7日 章士钊、张继、陈去病、卢和生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仍由章士钊任主笔，陈独秀也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该报因反清言论激烈，被人称为《苏报》第二。

8月9日 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了《哭汪希颜》诗三首。汪希颜，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陈独秀好友，其弟汪孟邹、其子汪原放，皆与陈独秀交厚。

8月17日 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了《题西乡南洲游猎图》诗一首：“驰骋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同时，陈独秀还协助苏曼殊翻译了法国小说《惨社会》（即雨果的《悲惨世界》）。在报上连载发表。

12月1日 《国民日日报》因经费无着，被迫停刊。此后陈独秀仍留在上海，和苏曼殊同住，继续翻译整理《惨社会》，共得十四回，后由镜今书局出版。

1904年 25岁

年初 陈独秀由上海回到安庆，旋去芜湖，住在芜湖长街汪孟邹开办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同房秩五、吴守一等人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由陈独秀担任主编。该报为半月刊，内容有13大类，它以通俗的语言，尖锐生动地揭露和批判了列强

瓜分中国和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该报共出版了23期（现发现了22期），发行量最多时达3000多份，有的还一版再版，销路之广，为全国俗话报之冠。

3月31日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出版，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写了《开办安徽俗话报缘故》和《安徽俗话报的章程》。宣称：“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在这一期上，陈独秀还发表了《瓜分中国》一文，一开头他就说：“唉嗟！这是怎么好呢？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了呵！这样大祸临门，……这不是要活活的急死人吗？”在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之后又说：“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整顿蒙馆学的法子》一文，提出四条整顿办法：（一）管理学生要整齐；（二）课本要相当；（三）教授法要活泼；（四）教习的性情要平和。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醉东江·愤时俗也》。指斥清政府是“奴才本性”，对洋人“干爹奉承”，他说：“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

4月15日 陈独秀用“由己”的笔名在《警钟日报》上发表了《哭何梅士》的诗。

4月30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二期上发表了《论安徽的

矿务》一文。他说：“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好像一个傻子财主，祖宗丢下来许多好产业，让旁人占去了，他也不知道发急的。”“依我看起来，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办了第一件，就自然没有了第二件。”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安徽的煤矿》一文。

5月4—5日 陈独秀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社论：《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

5月7日 陈独秀在《警钟日报》上发表了《夜梦何梅士觉而赋此》诗一首。

5月15日 从《安徽俗话报》第三期开始，陈独秀连续发表了《恶俗篇》五篇，批判了包办婚姻、敬菩萨、缠足以及婚丧嫁娶中的陈规陋俗。他认为敬菩萨“好像把钱丢在水里响都不响”；缠足“比犯重罪的囚犯，装钉脚镣，还要苦得几倍哩”；带镬头“好比得犯人的手铐”。他的结论是：“像这样的坏风俗，真是大有害于世道人心呀！”

从这一期开始，还发表了《地理略》四篇，介绍了世界和中国的地理情况。

从这一期开始，还连续发表了《中国历代的大事》11篇，题目分为：开国源流、汉苗交争、大禹治水、汤武革命、周初之隆盛、十四年共和、王政复兴、大戊之祸、春秋时代之五霸、吴越争雄、战国七雄。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国语教育》一文。

6月14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五期上发表了《说国家》一文，提出“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

的国家”。国家“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他又说：“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

7月27日 从《安徽俗话报》第八期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了《亡国篇》三章，揭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他说：“我们黄帝老祖宗丢下来几千年的好江山，到了今日子孙们无用，糊里糊涂的让了外人。”他分析亡国的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

从这一期开始，还发表了两篇《东海兵魂录》，讲述了日俄战争中六个日本军人的故事。

7月31日 中国留日学生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暗杀团，并发展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等人加入。陈独秀得章士钊的函招，由芜湖到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加入了暗杀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月余，向杨笃生等学习制造炸弹。

9月10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上发表了《论戏曲》一文，认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他反对以职业评论人的高低，他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应轻视。

从这一期开始，还连续发表了章回小说《黑天国》六章，

主要讲了俄国西伯利亚某矿山发生的故事。

9月14日 在《警钟日报》上发表了《赠王徽伯东游》一诗。

10月23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四、十六期上发表了《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批判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说：“教育童子的方法，就像冰霜剥落草木一般，一毫生意也没有，人才如何能发达呢?!”他极力主张改良教育。

从这一期开始，还陆续发表了三篇《中国兵魂录》，介绍了中国古代先轸、赵云、张巡、李光弼等人的战斗故事。

从这一期开始，还发表了《枪法问答》三篇。

11月 蔡元培等人将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会址设在上海。陈独秀也加入了光复会。

12月21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八期上发表了《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一)俄国》一文。

1905年 26岁

2月 在办《安徽俗话报》的同时，陈独秀还兼任了安徽公学的国文教员。该校原是李光炯、卢仲农等人在湖南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黄兴、张继、赵声等人都在该校讲过课。1904年秋，学校迁回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在该校先后任教的，除陈独秀外，还有章士钊、柏文蔚、刘师培、陶成章、苏曼殊等人。学校设中学、师范两部，学生都是安徽各地有志革命的青年，这是一所倡导反清革命的学校。

8月15日 《安徽俗话报》因刊载外交消息，引起英国驻

芜湖领事的不满，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各种题材的文章十多篇，约八万字。他的文章旗帜鲜明、含义深刻、犀利流畅、通俗感人，极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读。

陈独秀1922年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

8月20日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的总章和宣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夏 陈独秀与体育教员柏文蔚及宋少侠、王静山等人利用暑假，到皖北各地漫游，结交淮上革命志士，筹备组织反清革命团体。他们经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到寿春，又经合肥回芜湖。陈独秀曾在寿春停留半月，结交了孙毓筠、张树侯等人，同他们商谈反清革命问题。

夏 陈独秀回到芜湖，和柏文蔚、常藩侯、宋少侠、杨瑞甫等人，建立了秘密的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该会的宗旨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效法民族英雄岳飞，宣称：“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该会是个半军事性的组织，开始时有30多人参加，以安徽公学为主，还有陆军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一部分军人和知识分子。成立时曾在关帝庙烧香盟誓，并设立了联络中心。

不久，柏文蔚去南京，常藩侯去安庆，并在二地设立了岳王会分会，在芜湖设总会，陈独秀任总会长。

夏 在芜湖科学社，陈独秀和吴樾、赵伯先（赵声）等人密谋策划暗杀清廷官吏，想以此“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起来反对君主立宪。嗣后，吴樾又在北京西山向杨笃生学习制作炸弹。

吴樾是皖北桐城人，1903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后在保定创办了旅保“两江公学”和直隶《白话报》。并同杨笃生、马鸿亮、杨炽厚等人组织了北方暗杀团。

10月24日 西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进一步欺骗全国人民，杨笃生为其翻译随员，吴樾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车站炸五大臣未中，以身殉国。

陈独秀听到五大臣遇炸的消息后，立即致函在保定的张啸岑探询：“北京虐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把吴樾牺牲的情况及吴樾留存的《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等著作，悉遵烈士嘱咐，转交给陈独秀。

是年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后，派吴暘谷回国组织同盟会安徽分部。是年冬，吴回到南京，与岳王会领导人柏文蔚、倪映典、胡淮栋等人在鸡鸣寺召开秘密会议，介绍他们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 27岁

夏 陈独秀与苏曼殊等人第三次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他住在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同章士钊、苏曼殊三人合租一屋，生活相当困苦。

秋 陈独秀去日本后，岳王会的中心转移到安庆。此时，安徽督练公所在安庆成立了步、马、炮、工、辎五种弁目训练所，岳王会成员常藩候、袁子金、薛子祥、范传甲等人都加入了训练所。

不久，岳王会的活动为安徽巡抚恩铭侦知，袁子金等人被开除，张汇滔、程恩普被迫东渡日本。后经孙中山先生授命，张汇滔回寿春组织了信义会，程恩普回颍州组织了安仁会，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两个分部。

是年 陈独秀还写过一首旧体诗，赠给苏曼殊，题为《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

1907年 28岁

春 陈独秀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及日人幸德秋水等，筹备组织“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洲各国的社会党联成一体。由章太炎起草了《亚洲和亲会约章》，宣称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夏 陈独秀作《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一诗。

9月1日 陈独秀用“熙洲仲子”的笔名在《天义报》第六号上发表了《题曼上人〈梵文典〉》。

是年 陈独秀在留学日本期间，对中国的汉学和西方文学都进行了研究。并经常去东京《民报》馆，同章太炎、钱玄同等讨论汉学问题。

1908年 29岁

秋初 陈独秀作《华严瀑布》诗14首（其中八首发表在1911年2月19日的《民立报》）。

不久，陈独秀从日本回国。

9月下旬 安徽省教育总会召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出席了闭幕式并发表了演说。

10月3日 陈独秀的哥哥陈庆元因患肺病，在沈阳病逝，终年36岁。生有三子：遐年、勋年、永年。

秋 岳王会势力在安庆有了很大发展，并建立了“维新会”、“励学会”等外围组织，不少成员在新军中担任了领导职务。原计划利用新军在太湖会操的时机发动起义，后因领导人被捕，起义未能如期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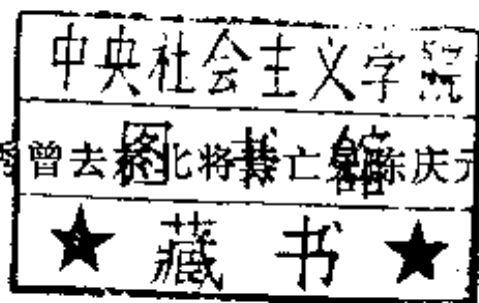
11月26日 因传来了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的消息，岳王会决定立刻起义，推炮队队官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参加起义的有新军马、炮营全体、六十一标全标、六十二标第三营、辎重队一部，经过三昼夜激战，起义失败，岳王会也从此瓦解。

冬 陈独秀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员。

是年 陈独秀写了与苏曼殊唱和《本事诗》十首，署名“仲”。诗中说：“黄雀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抚秦箏”。反映了他抑郁孤愤，忧国伤民的情思。

1909年 30岁

是年 陈独秀曾去北将亡陈庆元的灵柩运回安



庆，并作《述哀》长诗，以悼念亡兄。

7月 陈独秀和苏曼殊等人筹建《梵文书藏》，因应者无人，卒未成。

1910年 31岁

是年 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婚。高君曼是原配夫人高大众的同父异母妹，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热爱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情趣相投，由相敬而结合。婚后共住杭州，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与旧友刘季平、沈尹默等人“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此时，他写过一些游景诗，有《游韬光》、《游虎跑二首》、《灵隐寺前》等。

是年 致书苏曼殊。他说：“仲（陈独秀）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是年 陈独秀三子松年诞生。

1911年 32岁

1月5日 陈独秀在《民立报》上发表《感遇》诗一首。

1月16日 在《民主报》上发表《寄士远长安》诗一首。

春 作缅怀故友的《存歿六绝句》。悼念故友吴孟侠、何梅士、汪仲伊、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等六人。

5月 以“顽石”笔名，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一年第一号上发表了《女学之必要》一文。

6月 以“顽石”笔名，在《时事新报月刊》第一号上发表了《禁米出口问题》一文。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安徽也宣布独立，王天培任都督，不久，被原安徽巡抚朱家宝撵走，朱任都督，又为吴旸谷请来的赣军赶走。安徽旅沪人士推举孙少侯(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10月 辛亥革命爆发后，杭州陆军小学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通讯和联络机关。陈独秀等人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他起草了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人用大字写好，夜里贴在鼓楼门旁。第二天，檄文不见了，换上了抚台衙门严厉镇压的告示。

11月4日 孙少侯正式任职，并电请陈独秀回皖，任都督府秘书长。

1912年 33岁

1月3日 年初 应孙少侯之邀，陈独秀由杭州到上海，绕过被张勋顽守的南京，几经辗转回到安庆，出任都督府秘书长。

1月 陈独秀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工赈救灾活动，当年安徽水灾严重。陈独秀奉孙少侯之命，同卢含章、李光炯、李少穆等人去上海，与安徽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研究救灾事宜。经他们努力，在芜湖成立了“全皖工赈筹办处”，在上海设立了“全皖工赈通讯处”，一面募捐，一面组织测量团去灾区测量。这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区人民的生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是时，陈独秀还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聘请马其昶(通伯)为校长，他自任教务主任。不久，他把秘

书长的职位让给了李光炯，自己专任教务主任。

5月 孙少侯去北京，被袁世凯重金收买，留在北京，辞去安徽都督职务，改任袁的高级顾问，后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5月 柏文蔚接替孙少侯，出任安徽都督。此时，陈独秀因没有满足学生的无理要求，被逐出学校，柏文蔚请他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当时安徽人普遍认为，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是由陈独秀主持。据当时在都督府任事的老人回忆，陈独秀在职期间，提出的施政意见主要有：（一）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二）旧有官僚要敬克任用，不能因其有经验而全部留用；（三）对违碍革命的事，应大刀阔斧地革除。当时被人誉为佐柏文蔚“治皖有功”。

是年 陈独秀和邓艺荪等曾上书大总统，保释刘光汉。

是年 陈独秀次女子美诞生（高君曼生）。

1913年 34岁

3月20日 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

3月 宋案发生后，柏文蔚十分气愤，同陈独秀等人商议，由陈起草了一封给袁世凯的责骂信，准备派王镜芙送往北京，王认为责骂于事无补，不如写一最后忠告，柏、陈同意后，由王起草并送往北京，袁世凯见信后极为不满。

6月 袁世凯先发制人，宣布撤销粤、赣、皖三省都督，柏文蔚被免职后离开安庆去上海，和孙中山商议起兵讨袁。孙中山认为安徽接近北方，不宜先动，要柏于湘、粤、赣独立后再举兵。

6月 柏文蔚去职后，袁世凯任命孙多森为皖督，陈独秀鄙视孙之为人，因而呈请辞职，未获批准前，即留书自去。7月初，国务总理批准了他的辞职。

7月12日 二次革命爆发后，柏文蔚奉命出任皖督讨袁，陈独秀也随柏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不久，柏文蔚的部下胡万泰叛变，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

8月 陈独秀到芜湖，和师长袁家声一起，指责当地驻军龚振鹏按兵不动，结果遭龚逮捕，并草出布告要枪决陈独秀，后经当地知名人士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等人极力营救，柏文蔚也亲临芜湖解救，才得幸免。于是偕高君曼潜往上海。

8月27日 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进占安庆，倪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陈独秀家中被抄，延年、乔年逃往乡下，侄永年被捕，后经极力营救才得保释。

冬 陈独秀写了《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一首。

冬 陈独秀蛰居沪上，杜门写《字义类例》一书。有人去上海将其家中遭遇告之，陈独秀闻之愤怒非常，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

是年 陈独秀以“CC生”的笔名，编写了一本《英文教课书》，公开发行。

是年 陈独秀四子鹤年（又名和年、哲民）诞生（高君曼生）。

1914年 35岁

年初 陈独秀第四次去日本，在江户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当时他的生活极为贫困，过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李大钊此时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法本科学习，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陈独秀和李大钊可能在此时相识。

6月10日 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一卷二号上发表了《致甲寅记者函——生机》一文，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8月10日 在《甲寅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了诗七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咏鹤》、《雪中偕友人登吴山》等。在《咏鹤》诗中他写道：“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以鹤自诩。

8月25日 陈独秀还参加过黄兴、章士钊等人在日本组织的“欧事研究会”。

11月10日 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他提出的救国之道是：“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合，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干，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双桧记〉叙》一文。此书为栏柯

山人(章士钊)所作。他在叙中说：“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

是年 陈独秀曾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过法语。

1915年 36岁

5月10日 在《甲寅杂志》一卷五号上发表了他悼念亡兄的长诗《述哀》。

7月10日 在《甲寅杂志》一卷七号上发表了诗二首：《远游》、《夜雨狂歌答沈二》。同时还发表了《〈绛纱记〉序》一文。该书作者为县鸾(苏曼殊)。

夏 陈独秀由日本回国。

三、五四运动的主将

(1915.9—1920.4)

1915年 36岁

8月1日 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帮助汪孟邹把《中国白话报》改刊为《通俗杂志》。陈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了《谈责任》一文。

9月15日 陈独秀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青年杂志社告》，提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又说：“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

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对青年提出了六条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科学和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

焉”。《青年杂志》一开始就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

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法兰西人与世界文明》一文，认为法兰西的三大发明构成了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他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他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

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法国薛纽伯著《现代文明史》的第三章——“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的一部分和法国Max. O' Bell著《妇人观》的短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陈独秀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王庸工》的信中，批判了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同时，他又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在《答章文治》的信中，主要介绍了上海各学校的情况。

《青年杂志》为月刊，16开本，开始时仅发行千册，改为《新青年》后，在上海设总发行处，全国各地设有分发行所74处，在新加坡设发行所两处，发行最多时达1.6万份，在全国影响很大。

10月6日 汪孟邹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寄给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并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约他给该杂志写稿。

10月15日 在《青年杂志》一卷二号上发表了《今日之教

育方针》一文。认为研究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之对象；二是教育之方针；三是教育之方法。中心是教育方针问题。他提出的教育方针是：“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在论述惟民主义时，他说：“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他认为近世国家是“民主的国家”，“真国家”；专制主义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伪国家”。

在这一期上，陈独秀还翻译了印度诗人太戈尔的诗《赞歌》和美国国歌《亚美利加》。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李平敬》的信中，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在《答王珏》的信中，谈了求学问题。

11月15日 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了《抵抗力》一文。提出：“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弱肉强食，中外古今，举无异说。”他又说：“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召乱之媒。”“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他认为我国民抵抗力薄弱的原因有三：“一曰学说之为害也”；“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一曰统一之为害也”。他在文中还错误地提出：“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

进化。”

在这一期中，还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出：“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变而为理想主义。“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并介绍了一些欧洲知名的作家。

在这一期中，还发表了《欧洲七女杰》一文，介绍了英国的奈廷格尔、俄国的苏非亚、法国的居里夫人等人的事迹。

在这一期中，还为谢无量长律诗《寄会稽山八十四韵》作按语，提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吴勤》的信中，介绍了逻辑学的有关知识和著作。

在《答李大魁》的信中，对佛教进行了批判。

在《答吕君》的信中，提出“优胜劣败，终难幸免，彼欧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进，不外竞起研求四字，岂有奇谋异术哉。”

此外，还有《答李平敬》信一篇。

11月 陈独秀用“陈仲”的笔名，编写了一本《汉译英文选》，由益群书社印行。

12月15日 在《青年杂志》一卷四号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认为差异有三：“（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说：“累代同居，传为佳话。文虚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质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

文章进一步宣传了人权平等思想，他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内，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张永言》的信中，主张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

此外，还有《答穗》、《答沈伟》两篇。

1916年 37岁

1月15日 在《青年杂志》一卷五号上发表了《1916年》一文，提出“以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他对青年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第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

文章还批判了儒家的“三纲”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这些“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2月15日 在《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继续宣传进化论思想，他说：“进化公例，适者

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他认为“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还认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乃在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张永言》的信中研究了人口问题，他说：“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他主张中国应学习西方，采取节育措施，他说：“若夫吾之国力不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

此外，还有《答姚孟宽》、《答辉迂》两篇。

3月3日 上海青年会写信给发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提出《青年杂志》和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与陈独秀商议，决定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8月13日 陈独秀致函在美国的胡适，信中说：“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8月 国会在北京恢复开会，讨论制定宪法问题。是时，康有为上书北洋政府，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载入宪法。因遭到宪法商榷会的反对，最后达成一折衷意见，将原来《临时约法》中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靠法律不受限制。”对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

9月1日 《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青年》一文，提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在生理上要有健全之体魄；在心理上要有新鲜之信仰。他说：“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他提出，“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

在这一期和下一期上，陈独秀还发表了《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介绍了俄国科学家梅特尼廓甫和阿斯特瓦尔特。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七篇。

在《答汪叔潜》的信中，提出“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在《答沈慎乃》的信中，主张国语统一，文字“宜改用罗马字母”。

此外，还有《答何世侠》、《答舒新城》、《答毕云程》、《答陈恨我》、《答程师葛》五篇。

10月1日 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了《我之爱国主义》一文，提出“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他认为中

国之危在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他提出了六个字作为根本的救亡之道，即勤、俭、廉、洁、诚、信。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对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在揭露孔教与帝制的关系时指出：“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的孔教，为“历代民贼所利用”，是“帝制根本思想”，“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定孔教为国教，就是为了恢复帝制。同时还指出：“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

在这一期上，还为吴稚晖《青年与工具》一文作按语，称赞它“全文无一语非药石”。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胡适》的信中，主张文学革命应充分展开讨论。

在《答王庸工》的信中，介绍了诺贝尔奖金的情况。

此外，还有《答毕云程》、《答李平》二篇。

10月5日 致函胡适，提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1月1日 在《新青年》二卷三号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一文。进一步指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他认为孔教与民主是根本对立的，他说：“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他提出：“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如果这样，则“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

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六篇。

在《答一民》的信中，称颂“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犹为科学文艺之渊藪。”

在《答毕云程》的信中，他说：“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我“一息尚存，寸心不懈”。

在《答莫美卿》的信中，赞成独身主义，他说：“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因产业加增之率低于人口加增之率也。”他甚至主张“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

在《答T. M. cheng》的信中，提出“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

此外，还有《答李平》、《答陈蓬心》二篇。

11月底 陈独秀为书局招股事，来到北京，住前门外旅店中。一日，与沈尹默相遇，沈邀他来北京大学任教。

12月1日 在《新青年》二卷四号上发表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对二者做了对比，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伦理学”。最后他提出：“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措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

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肉体之袁世凯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凯固犹活泼泼地生存于吾国也。”因此要肃清袁世凯之余毒。他还提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西文译音私议》、《〈碎簪记〉后叙》等文。《碎簪记》为苏曼殊所作。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常乃惠》的信中，批评了他尊孔的错误观点，指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

在《答王统照》的信中，提出“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医，且恐非教育可救也。”

在《答孔昭铭》的信中，提出“社会进化，因果万端”，“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

此外，还有《答毕云程》一篇。

12月26日 北洋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 38岁

1月1日 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再论孔教问题》一文，再次呼吁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他说：“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又说：“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六篇：

在《答吴又陵》的信中提出：“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具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在《答孔昭铭》的信中提出：“儒术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在《答褚葆衡》的信中提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此外，还有《答李平》、《答顾克刚》、《答T. M. Cheng》三篇。

陈独秀连续发表的这些批孔文章和通信，对康有为等人鼓吹的尊孔逆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中，他首先高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尊孔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时是有重大影响的。

在这一期《新青年》中，还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为该文作“识”，他说：

“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1月4日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采取“兼蓄并包”的办学方针。

1月11日 经沈尹默、汤尔和等人介绍，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名义，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亲去旅舍拜会了陈独秀。他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称赞陈独秀“品学兼优，堪称斯任”。

1月15日 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正式就职，并在校内公布。

陈独秀来北京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来北京，社址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北京大学一些遗老攻击他学无所长，只会写些策论式的时文，不配出掌最高学府的文科。蔡元培表示，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章太炎先生也视之畏友。安徽籍的一些教授也表示，戴东原以来，安徽人士研究文字之学已成传统，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这样，才使这场风波逐渐平息。

1月 致函胡适，请他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哲学或文学教授，并请他为《新青年》杂志投稿。

2月1日 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

迂晦的 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批评前三种文学说：“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穹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他坚定地表示，为了文学革命，“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五篇。

在《答程演生》的信中提出：“仆对于吾国 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

在《答叶挺》的信中提出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叶挺在给他的信中曾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

在《答常乃惠》的信中，再次批评了孔教，指出：“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

在《答陈丹崖》、《答钱玄同》的信中，讨论了新文学的问题，强调提倡写实主义。

3月1日 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发表了《对德外交》一文，积极主张站在协约国方面，参加战争。认为参战可以带来四种利益，可以“获学术思想之进步”，“肃军纪，理财政，兴学奖业”。同时批驳了五种反对参战的言论。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九篇。

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说：“同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

在《答蔡元培》的信中说：“愿今后宗教家，以虚心研求真理为归，慎勿假托名宿之言，欺弄昏稚。”

在《答佩剑青年》的信中说：“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现，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

在《答傅桂馨》的信中又说：“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也。”“是扬汤止沸耳。”

在《答淮山逸民》的信中，论述了道德问题，指出：“道德为人类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认为道德“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

在《答莫英卿》的信中提出，青年修养应注意“宏毅”二字，“宏则希望远大，毅则艰苦卓绝、百折不回”。

在《答俞颂华》的信中说：“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又说：“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

此外，还有《答汪启疆》、《答常乃惠》等二篇。

3月15—16日 陈独秀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民党与时

局》一文，认为“以官为业之吾族，此时实无运用政党政治之道德与雅量”。他主张“三党(国民、进步、官僚派)平分政权”。

3月17日 陈独秀在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德育部做了关于道德问题的讲演。提出“道德观念之成立，由于人类有探索真理之心，道德之于真理，犹木之于本，水之于源也。”他认为目前西方道德主要有两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至于中国的封建道德，早已无讨论之价值。

4月1日 在《新青年》三卷二号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对俄国二月革命表示欢迎，他说：“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又说：“吾料新俄罗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师事德意志之无道国家，宇内情势，因以大变。”

在这一期中，陈独秀还为李大钊《青年与老人》一文作接语，认为“青年不可轻蔑老人”，老人也要看到青年的进步。同时，还为桐城方孝狱《我之改良文学观》作识，他说：“愿意白话文学的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常乃惠》的信中说：“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家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应绝对承认者”，但孔教“果实行于今之社会，不徒

无益而且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不当有所顾惜”。

在《答曾毅》的信中说：“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

曾毅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曾说：“仆知后来者之视足下，亦将如今人之视孙黄辈为政治革命之前驱也。”

在《答L.T.M》的信中提出，应该“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

此外，还有《答张嵩年》信一篇。

4月9日 胡适致函陈独秀，谈文学革命问题。他在信中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5月1日 《新青年》三卷三号发表了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题目是《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他说：“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但他又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他这种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11篇。

在《答胡适之》的信中，主张文学改良问题应展开自由讨论。

在《答刘竟夫》的信中，他说：“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

在《答俞颂华》的信中，再次提出孔子的“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

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赞成“汉文改用左行横迤”。

在《答李亨嘉》的信中，提出“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

在《答胡子承》的信中，区别了西洋式的真教育和东洋式的伪教育，他说：“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真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

在《答张护兰》的信中，提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其势目前虽不可侮，将来必与八股科举同一运命耳。”

此外，还有《答余元浚》、《答李杰》、《答毛义》、《答××》等四篇。

在这一期上，还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作了后记。

5月 在《丙辰》杂志第三期上发表感怀诗 20 首。抒发了他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

6月1日 在《新青年》三卷4号上发表了《时局杂感》一文。主张进步党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实现国家统一，“削除此自古与国家绝对不能两立之叛将骄兵”，如张勋、倪嗣冲等，他说：“欲存国家，必去此凶顽。去此凶顽，然后财赋可理，政令可行，学可兴，国可保，然后始有共和可言，不然不但共和必无幸，国家之危且如系卵。”他又说：“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

在这一期中，还为吴曾兰《女权平议》一文作识语。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钱玄同》的信中，再次提出“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并揭露说：“康南海意在做大官，尊孔复辟皆手段耳。”

在《答胡适之》的信中，对《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进行了评论，认为最好的小说是《金瓶梅》，“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

7月1日 《新青年》三卷五号上发表了陈独秀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题目是《近代西洋教育》。他主张中国教育“必须舍旧维新”，向西方学习，他认为西洋教育有三条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值得学习的。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七篇。

在《答李演恭》的信中，劝他暂勿回国，因为“国民毫无自觉自动之意识，政界有力者与在野之旧党相结合，方以尊孔教、复帝制、复八股为志，视欧洲文明及留学生如蛇蝎”。

在《答〈新青年〉爱读者》的信中，对《公民杂志》发表的培风《孔子之道与今日中国》一文进行了批判。

在《答吴又陵》的信中，提出《礼运》大同说并非见之于孔教。

在《答顾克刚》的信中，改变了《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宗旨，他说：“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彩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又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在《答卓鲁》的信中，提出“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

在《答沈藻墀》的信中，提出文章可分两类：“一日应用之文，一日文学之文”。

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赞成他对应用文改良的13条建议。

7月4日 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政局之根本解决》一文。

8月1日 在《新青年》三卷六号上发表了《复辟与尊孔》一文，再次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又说：“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在这一期上，还为刘延陵《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一文作后识，不赞成该文反对自由恋爱和独身主义的主张。关于人口

问题，他说：“方今世界人口加增率，已逾物产加增之量。默计将来，人增无穷，物增有限，马查士(马尔萨斯)人口论，今仍为经济学界有力之说。”

在这一期和下一期上，陈独秀还翻译了赫克尔《世界之迷》的第二十章，题目是《科学与基督教》。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陶孟和》的信中，提出“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所需之要求，不可废也。”认为：“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

在《答钱玄同》的信中，讨论了标点符号的用法。同时指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抄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

此外，还有《答冯维钧》一篇。

9月1日 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9月10日 应陈独秀之请，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教授。

9月22日 毛泽东同志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齐至蔡和森家，曾对陈独秀做过这样的评论：“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11月7日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11月20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五号载“本校教职员捐助天津水灾赈款清册”，其中有“陈独秀捐五元”。

11月27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10号载：“本校捐助航空学校白故学员永魁奠仪一览表(补登)”，其中陈独秀捐2元。

12月16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27号载，陈独秀、胡适、

章士钊等七人当选为北京大学编译会评议员。

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陈独秀对北大文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聘请了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文科任教，胡适、刘半农等人先后来校。又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八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负责文科的改革事务。

在陈独秀领导下，北大文科进行了以下的改革：建立了严格的升级、留级、毕业考核制度；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功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对原有课程进行了调整和增设。

1918年 39岁

1月15日 《新青年》四卷一号出版，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七人组成编委会，实行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并实行集议制度。陈独秀负责第一期。

这时，鲁迅和陈独秀相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友。鲁迅曾回忆说：“其时惹我最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又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却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在《新青年》四卷一号的通信栏中，发表了《答刘延陵》一篇，讨论自由恋爱等问题。

1月16日 陈独秀与沈尹默、刘半农、程演生、钱玄同、王星拱等六人，对北大改革提出了三项建议：一，组织大学俱乐部；二，划分大学区域；三，制定教员、学生制服。这

些建议执行后，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校貌起了一定作用。

1月 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2月15日 在《新青年》四卷二号上发表了《人生真义》一文，分析了宗教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人生观的看法。提出了他对人生真义的九条见解。他认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他最后结论说：“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2月25日 胡适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美学会”，陈独秀积极支持，在该会成立时，陈独秀捐款120元，是献金最多者。

2月27日 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了“进德会”，自任会长，会员分甲、乙、丙三种，陈独秀加入甲种会员。

3月15日 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发表了《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的长文。是年1月，康有为曾出版了《共和平议》一书，极力反对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陈独秀对它进行了逐卷逐条的批判。说他“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诅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

陈独秀在文中还第一次肯定和歌颂了苏联十月革命，他说：“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一首《丁巳除夕歌》，他写道：“除

夕歌，歌除夕，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

4月15日 《新青年》四卷四号增设“随感录”专栏，陈独秀在此专栏中发表短文三篇。

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批判了国粹论。他说：“国粹论者，守缺抱残，往往国而不粹，以沙为金，岂不更可悯乎！”他还提出：“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二曰勿尊古，……三曰勿尊国。”

在《国会》一文中，批判了某些人对国会的攻击，认为只有国会才能“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他又说：“国会唯一之责任与作用无他，即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耳，此外固无事业可为。”

在《元曲》一文中，批驳了某些人对北京大学文科增设元曲课的攻击。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钱玄同》来信一篇。主张进行文字改革，废汉字，存汉语。他说：“中国文字，既难转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又说：“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言，焉有独立之必要？”

5月14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135号刊登文科学长陈独秀告白，各门功课必须及格，方能给予毕业证书。

5月15日 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了《有鬼质疑论》一文，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灵学”，向有鬼论者提出了八个质问。他说：“鬼若有质，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日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

犬马之鬼耶？”

在這一期的通信欄中，還發表了《答湯爾和》來信一篇，批判了三焦、丹田說，指出：“吾國學術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時代，故往往於西歐科學所證明之常識，尚復閉眼胡說，此為國民根本大患，較之軍閥跋扈，猶厲萬倍。”

這一期還發表了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5月21日 北京大學等院校學生二千多人赴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5月23日 為學生請願事，北大校長及各科學長提出辭職。在給教育部和大總統的呈文中說：“本日接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璠、……聯名一函稱：獨秀等因不能襄助校長管理學生，有負學長職務，謹行辭職云云”

（載《北京大學日刊》144號）。

5月24日 《北京大學日刊》第145號載，“校長學長已允留職”。

6月3日 陳獨秀以152票當選為“進德會”評議員。

6月12日 陳獨秀擔任了北京大學入學試驗委員會副會長。會長為蔡元培。

6月15日 在《新青年》四卷六號的通信欄中，發表了答讀者來信三篇。

在《答張繆子》的信中，批評了中國的舊戲，認為它“在文學上、美術上、科學上果有絲毫價值”邪！“愚誠不識其優點何在也”。

在《答崇拜王敬軒者》的信中，認為討論學理之自由是神聖的，應反對“學愿”作風，他說：“‘學愿’者，真理之賊也。”

此外，还有《答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的来信一篇。

6月25日 陈独秀又为“成美学会”捐款10元。

6月30日 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7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一号上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强烈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他提出：“第一当排除武力政治”，否则“不但共和是个虚名，就是复辟立君，也没有办法”；“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他还妄想劝说各派军阀放弃武力政治，实行“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

在这一期随感录中，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韩世昌》一文中指出，文盲充斥国中，昆曲名角韩世昌竟一字不识。

在《自由正义与和平》一文中提出要尊重自由正义与和平，不要学习德意志军国主义。

在《科学与神圣》一文中认为，在森罗万象中，并无神灵主宰，而“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

在《学术独立》一文中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在《阴阳家》一文中提出：“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8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二号上发表了《偶像破坏论》一文，这是一篇破除迷信、讨伐偶像的战斗檄文。他称偶像

是“一(指)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是一个十不全的怪物。他又说：“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最后他发出呼吁说：“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比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圣言与学术》一文中，提出：“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然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则是荒谬的。“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在《基督教与迷信鬼神》一文中，提出宁信鬼神，也不要信基督。

在《信神与保存国粹》一文中，批评了印度人迷信佛教，提出一个民族如不知革新，必然削弱。

此外，还有《社会裁制力》、《伪善的基督教国民》二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陈独秀为区声白与陶孟和通信中论世界语问题作附言，提出“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他认为世界语流行，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利器之一。

此外，还有《答孙国璋》一文。

这一期还发表了《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一文，只言有鬼，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明。陈独秀为此文作识，对其谬论进行了逐条批驳。

9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三号上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批判了《东方杂志》记者所鼓吹的定孔教为一尊的谬论，向他们提出了16个质问，他认为如果用孔子思想‘统整’一切，“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

9月19日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结识了陈独秀等人。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指陈独秀）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9月20日 《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陈独秀在北大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他提出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在于“研究学理”。他号召学生“注重外国语”，“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同时提出，在文科各门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

9月25日 北京大学校长召开会议，研究参加法文协会事。会议公推陈独秀、胡适二人为代表，加入该会。

10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四号的通信栏中，陈独秀和胡适之一起发表了《答易宗夔》的信，提出创造新文学，必须破坏旧文学，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10月23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234号发表了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告白，学生选定的学习科目不能随意更改。

10月25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236号发表文科学长陈独秀启事，要“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以为学生读书之所。希诸君各将所授科目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

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

11月2日 《北京大学日刊》243号载文科学长陈独秀布告，特开一专习法文音读班。

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克林德碑》一文，错误地攻击义和团运动，说他们“可耻”、“可恶”、“荒唐”，称他们是“匪”。他认为义和团闹事的原因有五：（一）道教；（二）佛教；（三）孔教；（四）中国戏；（五）守旧党。最后他提出：“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12月3日 北大学生成立了“新潮社”，并决定出版《新潮》杂志。陈独秀给予了积极支持，他答应：“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

12月初 陈独秀致函周作人，约他为即将出版的《每周评论》写稿。周写了《人的文学》一文。14日，陈独秀再次给他写信，准备将此文用于《新青年》，请他另行写稿，周又写了《平民的文学》和《论黑幕》两文。

12月15日 在《新青年》五卷六号的通信栏中，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张寿朋》的信中说：“鄙人说孔子不好，却确有证据，并非不虚心，不看书，轻易说话。”

在《答莫等》的信中，提出“宇宙间万象森罗中，有客观的实质和主观的幻觉二种”，鬼相乃是幻觉。

在《答爱真》的信中，批驳了他对《新青年》的攻击。

在《答朱塘》的信中，赞同其用国语发行报纸等四项建

议。

12月22日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联合创办了《每周评论》，社址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每星期日出版，内容有十二大类，使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期刊之一。陈独秀用“只眼”的笔名，在该报发表过大量文章。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发刊词》。宣称：“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却错误地吹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曾提出过和平意见十四条，高唱“保护弱小民族”，“公平解决一切殖民地纠纷”等，当时迷惑了不少人。)

在创刊号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两团政治》一文中指出，人民怕督军团，督军团怕外交团，这就是“中国之两团政治”。

在《义和拳征服了洋人》一文中，揭露法国使馆也在扶乩请神。

此外，还有《战争的责任者》、《公仆变了家长》二文。

12月29日 在《每周评论》2号上发表了《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的社论。他说：“鄙人以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

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他在批判了“武断政治”后却说：“像中国的徐(世昌)总统，……从义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

在這一期的《国外大事述评》中，谈到德国的情况时，陈独秀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今日已经没有根据了，所以他的势力在国会上也渐减少。”这说明陈独秀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甚少。

在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大红顶子红缨帽》一文中指出，清室已退位，但仍有戴大红顶子红缨帽的奴仆出入于宫廷。

在《异哉搭现问题》一文中，揭露了铁路和电话系统在收纸币时要搭现的怪现象。

在《野心》一文中指出，个人野心家必将遭到中外的反对。但他错误地吹捧了威尔逊和冯国璋两位总统。

此外，还有《倒军阀》一文。

1919年 40岁

1月5日 在《每周评论》3号社论栏内发表了《国防军问题》一文，提出“中国民困财穷”，“最好将现在所有的兵，分年裁尽，一个也不留”。更不要招什么新国防军，他说：“单招些无教育的游民土匪，就当作国防军，这不是有意骗人，也就是无心作梦。”

在这一期《国外大事述评》中，谈到俄国的内战时，他说：“一般的工人农夫向来是受劳苦、受践踏的，听了过激

派的福音，当然是欢欣无量的，但过激派要求世人承认他的胜利，应该做出一种公平的政治组织，把国内混沌状态肃清才是。”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得众养民》一文中指出：“共和国人民是靠自己养自己，不靠人养的，更不要官养的，不但不要官养，并且出租税养了官。”

在《谁是匪》一文中揭露了官匪不分现象。

此外，还有《军民分治》、《又要制造民意了》、《到底是那一团利害？》三文。

1月12日 在《每周评论》4号《国外大事述评》栏中，发表了《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一文，批评了俄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他说：“过激派的错处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军人与官僚》一文中指出：“野蛮的军人，腐败的官僚，都是国民之仇敌。但是两样比较起来，军人更觉可怕、可厌。”

在《武治与文治》一文中，他愤慨地指出：“中国的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收人民的膏血。”

在《尊孔与复辟》一文中指出：复辟之前，必先尊孔。

此外，还有《国防军》、《安徽小鬼》二文。

1月15日 《新青年》从六卷一号起开始实行由编辑部轮

流编辑的方法。一号陈独秀，二号钱玄同，三号高一涵，四号胡适，五号李大钊，六号沈尹默。

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有力地回击了某些人对《新青年》的攻击和诬蔑。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表明了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奋斗的决心。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一文，他谈了五点感想，认为梁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为了殉清而自杀的，是不值得的。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王禽雪》的信中提出，如以保存国粹为名，不许自由思想，“其弊将不可胜言”。

在《答吕澂》的信中提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不可只会“临”、“摹”、“仿”、“抚”，复写古画。

此外，还有《答黄介石》的信一篇。

1月16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288号发表了文科学长陈独

秀布告，通知关于学生请假事。

1月18日 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有20多个国家，1000多名代表参加，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

1月19日 在《每周评论》5号上发表了《除三害》一文，提出中国有三害：“第一是军人害”，“第二是官僚害”，“第三是政客害”。若不除去这三害，中国政治便永无清宁之日。他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予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二篇。

在《国民大会》一文中提出：“国民大会，必须经过合法的手续，方能成立，断不许所谓名流私人集合可以冒充的。”

在《鸦片与纸票》一文中指出，虽然上海烧了烟土1000多箱，但在许多省仍然“烟苗遍地，丘八贩烟土。”

1月26日 在《每周评论》6号上发表了《烧烟土》一文，对上海烧鸦片事进行了评论，批判了反对烧烟土的种种谬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请问蒋观云先生》一文，为国民大会问题，向他提出八个问题。

2月2日 从《每周评论》7号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了《我的国内和平意见》的长文，对“和平会议”提出了六个问题。

(一) 关于先决问题，他提出：“第一先决定问题，就是北方不要固执‘中央威信观念’，南方不要固执‘单纯的绝对

的护法观念’”。 “第二先决问题，就是此次和平会议，应当把解决国家的重要根本问题，造成比较的永久和平为目的。”

(二) 关于废督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治上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在一切政治法律问题之上。”他反对“军民分治”的主张，他说：“地方行政，有了省长的民治，便无需督军的军治的，有了督军的军治，那省长的民治，便是军治的附属品，断然不能独立自主。”他奉劝各督军自动放弃权位，他说：“他们钱也刮够了，恶也作满了，借这机会回家享福，总算他们的运气好，也未必定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又说：“若是我们国民没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请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

(三) 关于裁兵问题，他说：“照我们的理想，是反对战争，是完全去兵的主义。”他提出可以和平地分期裁兵，“半年裁一次，一次裁十万，五年内可以裁尽”。

(四) 关于国防军问题，他说：“这国防军倘不取消，在内政上，在外交上都是破坏和平的危险物。”他期望段祺瑞采纳这个意见，不要“为人利用，留下子孙万代误国的恶名！”

(五) 关于国会问题，他主张既要“爱惜法律的假面”（迁就南方），又要“迁就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迁就北方）。

(六) 关于宪法问题，他认为原有的宪法不应“根本取消”，另搞新法。

在《每周评论》7号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公理战胜强权》一文中，提出“我们对于参战，简直算没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会议席上，提出无数的要求，固然可耻；但是在各国方面，要把这个理由来拒绝中国，难道公

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在《揭开假面》一文中，他说：“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

此外，还有《呜呼特别国情》、《谁的罪恶》二文。

2月5日 陈独秀编撰的《汉译英文选》，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发行。

2月9日 在《每周评论》8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威大炮》一文中，改变了对威尔逊的看法，他说：“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

在《公理何在？》一文中，他为十月革命辩护说：“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煞，又试问公理何在？”

在《特别国情》一文中，批判了筹安会成员景耀月认为中国国情特别，不必学习欧美，只能实行帝制的谬论。

此外，还有《光明与黑暗》一文。

2月15日 在《新青年》六卷二号上发表了《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从十个方面与《东方杂志》记者进行了论战。继续批判他们鼓吹的尊孔思潮，指出：“独尊一家言，视为文明之中心，视为文化之结晶体，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国粹，视为国是，有与之立异者，即目为异端邪说，即目为非圣无

法，即旨为破坏学术思想之统一，即旨为混乱矛盾庞杂纠纷，即旨为国是之丧失，即旨为精神界之破产，即旨为人心迷乱”，这是“荒谬绝伦”的。

2月20日 南北和会正式在上海开幕。

2月23日 在《每周评论》10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司令部土多》、《信实通商》二文中，指出贩卖烟土均在司令部中进行，而且是现金交易，信实通商。

在《第一次警告》一文中认为，过激派暗杀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算是第一次警告，因为他忘记了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此外，还有《理想家那里去了》、《不准百姓点灯》二文。

年初 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胡适当时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曾持有异议。陈独秀在信中说：“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又说：“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作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

2月 北京大学学生兼《神州日报》的记者张厚载（张謇子）两次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造谣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

3月 张厚载又在《神州日报》上发表通信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

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项谣言的流传，给北京大学和陈独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3月2日—6日 在列宁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成立。

3月2日 在《每周评论》11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旧党的罪恶》一文中指出：“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想，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

在《中日亲善》一文中指出，这是日本提出的骗人口号。

在《铁道管理问题》一文中，主张铁道可以国际共管，这不能算是“亡国政策”、“卖国行为”。

此外，还有《亡国与卖国》一文。

3月9日 在《每周评论》12号的社论栏内，发表了《人种差别待遇问题》一文。主张“打破那人种差别待遇的观念”。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欢迎英美舰队》一文中指出：“日本人说这是英美对华的野心，我们说这是东洋一线光明的希望。”

在《亡国与亲善》、《不忘日本的大恩》、《日本人的信用》、《日本人与曹汝霖》、《国际管理与日本管理》等文中，揭露了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

此外，还有《陕西问题》一文。

在这一期《每周评论》上，重新发表了林琴南臭名远扬的文言小说《荆生》，在这篇小说中，他影射攻击陈独秀等新文

化运动的领导人，说他们是“禽兽之言”、“伤天害理”，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伦理立国”的传统，甚至要求用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此后，在《每周评论》上即对这篇小?说展开了批判。

3月10日 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辟谣：“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16日 陈独秀出席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在理科第一教室召开的成立大会，该会共有200多会员，陈独秀也是会员之一。

同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3号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指出：“中国人有‘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东局千零十三号》一文中揭露，日本人说没有参战，但却发现了它参战军训练处的电话号码是1013。

在《参战军》一文中，主张裁撤国防军。

此外，还有《亚洲的德意志》、《爱尔兰与朝鲜》二文。

3月19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348号发表了蔡元培校长《致神州日报函》，为陈独秀等人“辞职”事辟谣。

3月23日 在《每周评论》14号上发表了《为什么不要南北分立?》一文，反对南北分立的主张，认为这是浅薄之见。他说：“我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要点，不在南北分立与否，而在能否合舆论的内力和友邦的外力，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不能“仅就一时特殊势力少数野心家造成的现象，便主张毫无民意根据的南北分立”。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朝鲜独立之感想》一文，热情歌颂了朝鲜的“三一运动”。他说：“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瞭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想。”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还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你护的什么法?》一文中，反对设立九个军区的主张。

在《希望各国干涉》一文中，提出“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况且光明正大的希望各友邦用好意来干涉，比秘密和一国亲善，勾引外力来巩固个人的地位大不相同。”

此外，还有《和平的根本障碍》、《中国的李完用 宋秉峻是谁?》、《莫做傀儡》、《何人的命令?》、《停止纳税》等五篇。

3月30日 在《每周评论》15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更加肉麻》一文中指出，清朝的官吏老儒，投降革命党后，显得更加肉麻。

在《林纾的留声机器》一文中揭露，林纾运动其同乡的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

武器。

此外，还有《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拿人吗？》一文。

3月 国会议员张元奇提出了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并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和恫吓。国会因害怕引起社会舆论和学生们的反对，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3月31日 蔡元培校长采取断然措施，将传播谣言、损坏学校名誉的张厚载开除学籍。

4月1日 蔡元培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公开表示，“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与。”

4月6日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6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冤哉洪述祖！》一文中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被判处死刑，而指使人袁世凯却受人尊敬。

在《南北一致》一文中指出，在对种鸦片烟的态度上，南北一致。

在《纲常名教》一文中，他说：“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在《太监与缠足》一文中揭露，广州一记者公开主张缠足，北大一教授又说：“宦官是中国特有的好制度。”怪哉。

此外，还有《中国和平的障碍》、《安徽省议会的笑话》、《婢学夫人》、《倪嗣冲的儿子》等四篇。

在这一期《每周评论》上，还发表了陈独秀摘译的《共产

党宣言》的一部分。

4月10日 北京大学召开本科教务处成立会议，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陈独秀因事请假南归，没有出席会议。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蔡元培不得不通过废除学长制成立教授会的机会，请陈独秀离开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

4月13日 在《每周评论》17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11篇。

在《衍圣公和张天师同声一哭》一文中提出，欧洲和会关于信教自由中规定，“各国政府元首，不得敕封各教的教师和僧道的职员爵位”。如果这样，则衍圣公、张真人等封号应一概取消，为此，可以同声一哭。

在《关门会议》一文中指出，南北代表都主张关门会议，“免得议论庞杂，意见纷歧”。若此，还不如请一位皇帝来下圣谕。

在《文治主义原来如此》一文中揭露，文治政府也要驱逐大学教员。

在《形式的教育》一文中，批评了中国教育的形式主义，他说：“我们中国的青年，也正要死在形式教育的监牢里面。”

在《怪哉插径班！》一文中，批判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要把基督教做为“校教”。

在《预定的计划》一文中指出：“中国式的官僚政治，大弊病在无论什么事都没有预定的计划，总只是随事敷衍，四面八方不得罪人，才好保全他那打不碎的橡皮饭碗。”

此外，还有《不可思议的新旧思潮》、《林琴南很可佩服》、《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议长串通卖矿》、《美国也有

军械借款吗?》等五篇。

4月15日 在《新青年》六卷四号上发表了《我们应该怎样?》一文，提出要反对两种危险的人生观，“(一)顺世堕落的乐观主义；(二)厌世自杀的悲观主义”。应该信仰和提倡“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

4月20日 在《每周评论》18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在《多谢倪嗣冲张作霖》一文中，称他们是两位“制造社会革命的急先锋！”

在《伤寒病和杨梅毒》一文中指出，军阀的武治主义是伤寒病，官僚的文治主义是杨梅疮，一病未好又加一病。

在《四大金刚》一文中指出，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被称为亲日派四大金刚。

《在世界第一恶人》一文中，指日本寺内内阁为世界第一恶人。

在《毕竟南方军人有良心》一文中，称赞程潜等七人发表通电，“痛说军人干政的罪恶和军费过大的弊病”。

此外，还有《土匪世界》、《却没有了自己》二文。

4月 陈独秀对北京的居民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当时北京有人口932540人，其中有洋车夫4万多人，排字工人1万多人，公娼私娼1万多人。另有失业贫民占人口总数的1/10。

这些人处境最悲惨，最苦恼！“常常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

4月27日 陈独秀根据自己的调查，在《每周评论》19号上发表了《贫民的哭声》的社论。他说：“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殊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佣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因此，“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认为：“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

他在文中还提出，那些不劳而获的军阀、官僚、政客、贵族们，听不到贫民的哭声，但最后他们也要“发出同样的哭声”。他说：“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九篇。

在《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輿到底是哪国的人？》、《再看江庸的戏》等文中，揭露和讽刺了亲日派。

在《法律是什么东西？》一文中指出，禁止吸鸦片和赌钱的法律，只用于穷人，富人可以自由。

在《克伦斯基与列宁》一文中指出：“克伦斯基本是俄国温和派的首领，现在居然致电劳农政府，说他的思想渐渐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接近。可见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

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在《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一文中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像那20个毫无力量的代表，是湖南人说的话‘没得寸用’。”

此外，还有《干政的军人反对军人干政》、《破坏约法的人拥护约法》等二篇。

5月4日 爆发了北京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这一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20号上发表了《孔教研究》的评论，对北京《顺天时报》上的尊孔文章——《孔教研究之必要》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他再次指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护法？丑！套狗索！》一文中，揭露和痛骂了国会议员，说他们“为了每月三百大洋，居然摇尾伸头套了非法内阁的‘套狗索’，这种轻骨头，比三钱灯草灰还轻。”

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他说：“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他的这篇短

文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还有《护法吗？要钱！》、《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共同管理》、《我国》、《何苦瞎打通电》、《梅兰芳》等六篇。

5月7日 致函胡适，向他介绍了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他表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

5月9日 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离京。不少人曾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

5月11日 在《每周评论》21号上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认为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因为自国的权利欺压我们，这是他们被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的，我们不必怨他。”也不是亲日派，“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种种罪恶的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我们也不必专门怨他。”他说：“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像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只有这种镇压人民爱国的人，才是造成中国外交失败的罪人。

5月18日 在《每周评论》22号上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他指出：“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又要

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陈独秀还忿怒的指出：“若还不要脸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又说为政客利用煽动，……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样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陈独秀这篇文章对推动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一文。上海总商会曾致电政府，主张山东问题不必提交巴黎和会，可以同日本直接交涉。这一主张得到日本的赞扬。陈独秀对此进行了评论和批判。

5月26日 在《每周评论》23号上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之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说：“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一个人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最后他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卖国都有凭据吗？》一文中指出：大卖国贼卖国是不用凭据的，如朝鲜的李完用卖国。

在《自家人不及外国人》一文中，指责政府对日妥协，对

南方态度强硬。他说：“难道国家的权利，尽可以让给外国，却断断不可让给自家吗？请问政府当局是什么肺肝。”

此外，还有《对外圆满，对内统一》、《只有叹气！》二文。

6月1日 在《每周评论》24号上发表了《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感言》一文。5月21日，日本小幡公使照会中国政府，态度蛮横，完全不是对等国口气。24日，段祺瑞发表了主张签字的通电。陈独秀的文章对此事进行了评论。

在这一期随感录栏内，还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同盟会与无政府党》一文中指出，过去清廷捕人，都扣上“同盟会”的罪名，现在政府捕人，都扣上“无政府党”的罪名。

在《日本参谋部与谢米诺夫》一文中，揭露日本与俄国白匪勾结事。

在《冤哉〈益世报〉！》一文中讲了《益世报》被查封事。

此外，还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日本人那有这种斗胆？》、《别得罪亲日派》、《北京十大特色》等四篇。

6月3日 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这一运动。

6月8日 在《每周评论》25号上发表了《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社论。指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了短文14篇。

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指出：“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

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现在看来，“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

在《六月三日的北京》一文中，称赞了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当天“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学生们去街头演说，被军警捉去多人。

在《爱情与痛苦》一文中指出：“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此外，还有《吃饭问题》、《护法总裁的名誉》、《南北一致》、《像煞有介事的钮永建》、《到底还是伍老头子有良心》、《章宗祥还不算顶坏的人》、《可怜大折其本》、《政学会与桂系》、《西南简直是反叛》、《丑学生丑教育界》等10篇。

6月9日 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4年、7年两次对日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

6月10日 陈独秀到中山公园等地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6月11日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等人到新世界游艺场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警察厅逮捕。

同日夜，《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住宅）被搜查。

陈独秀的被捕，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在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励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诃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

6月24日 李达同志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7月14日 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7月20日 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由胡适主办，他在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

7月25日 苏联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

8月31日 《每周评论》37号出版时，被北洋政府封闭。

9月上旬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提出陈独秀被捕之事。他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要求释放陈独秀。许世英表示，立即打电报回去。

9月16日 陈独秀被捕三个多月后，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北大同学召开欢迎会。

陈独秀出狱后，担任了国史馆编纂。

10月12日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出席《国民》杂志周年纪念及欢送许德珩、陈宝镛二人赴法勤工俭学的会议。他在会上致词，鼓励青年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他还提出：国民觉悟可分为三步：第一是爱国心之觉悟；第二是政治不良之觉悟；第三是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应尽量不断增多国民之觉悟。

11月15日 由于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六卷六号推迟四个月后，才得出版。这一期发表了李大钊《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他写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后，却不见了你和我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只眼即陈独秀)

11月22日 在《晨报》上发表了《论“的”字用法》一文，和胡适、止水、周建侯等人讨论“的”字和“底”字的用法。

12月1日 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了《本志宣言》，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号召青年“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提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分析了民治主义在中国没有实行的五条原因，提出了实行民治主义的五条原则。他说：“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他又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失，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

在这一期上，陈独秀还为潘力山著《论新旧》一文作附识，指出：“若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一言一动都跟着环境走，不觉得‘为什么’、‘何故’要这样，就日夜生活在极新式极文明的社会，……却仍旧是外部的被动的无意思的旧式生活。”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笼统”与“以耳代目”》一文中，提出办事情不能“不求甚解”。

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

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一文中指出：“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

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批判了调和论，认为这是“人类的堕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关于道德，他主张“道德革新”，他说：“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

在《留学生》一文中，指出留学生很少有作为，“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

在《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一文中，主张通过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来改良社会。他说：“从自己个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洁的人格，再由自己个人延长，渐渐造成公正廉洁的社会。”

同一天，陈独秀还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同时他还认为，中国也存在着财产工商界和无产劳动阶级的对立。他还说：“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同一天，上海益群书社出版了陈独秀编撰的《模范英文教本》(四册)。

12月11日 在《晨报》发表了《对于国民大会的感想》一文。他说：“国民大会是我国人民对于本国政府及世界各国表示我们公共意见的一个顶好的方法。”“我对于今后国民大会应该做什么？也有二种意见，……对内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对外，不仅要排斥日货，而且要组织起来，“振兴工业，才是根本办法”。

12月13日 北京《晨报》发表了陈独秀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呼吁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歧视妇女。

12月31日 陈独秀为日本武者小路笃实作《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作附记。他说：“今天是1919年的最后一日，我希望全人类的姊妹兄弟们都把以前的旧梦打破，以前的污浊、罪恶、羞辱，都随着旧岁同时消灭，从明年明日起，大家总要真心接触，随着新年面目一新，不再将手去染血，都流额上的汗，不再借金钱为力，都委身于真理，把从前用在互相猜忌的力量，用在互相帮助做人类有益的事！”

1920年 41岁

1月1日 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发表了《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一文，是为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的自杀事件写的评论。讲了五个问题：(一)自杀的趋势；(二)自杀的时期；(三)自杀的原因；(四)自杀的批评；(五)自杀的救济。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答半农的D——诗》，感谢大家

对他的称誉，他说：“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造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做来给我吃。……倘若没有他们，我要受何等苦况！”对于他在北京的被捕，他说：“不过几个顽皮的小兄弟弄把戏，他们一旦成了人，自然会明白，自然会向他们戏弄过的人赔礼。那时我们答道：好兄弟，这算什么，何必客气！”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0篇。

在《〈浙江新潮〉——〈少年〉》一文中，鼓励两个刊物永远发挥与“穷困及黑暗”奋斗的精神，“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在《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一文中指出：“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吗？”

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一文中，认为这是“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

在《解放》一文中，他说：“解放就是压制的反面，也就是自由的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的历史。”“我们生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又说：“在思想转变的时候，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的公开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此外，还有《新出版物》、《裁兵？发财？》、《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阔处办》、《青年体育问题》、《约法的罪恶》等六篇。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17人的《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提出组织“工读互助团”的目的是“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

同一天，还在《星期评论》31号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一文。提出“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我们希望赶快补习三门功课，补习好了，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

1月4日 在《新生活》杂志20期上发表了《祝窝窝头会》一文。

1月5日 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认为应该欢迎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他说：“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

1月29日 陈独秀去上海，同章士钊、汪精卫等人商谈在广州筹办西南大学事宜。以陈独秀为主，草拟了《西南大学组织大纲》。

2月1日 在《新青年》七卷三号上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改变了他反对宗教的态度，竟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基督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又说耶稣的精神有三点“（一）崇高的牺牲精神；（二）伟大的宽恕精神；（三）平等的博爱精神。”“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

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虞杏村》的信中说：“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我也曾经害过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汗流浹背呵！”

在《答藏玉海》的信中，称林纾为“野狐禅的古文家”。

在《答明慧》的信中，提出“男女都应当有普通选举权”。

2月2日 应湖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邀请，陈独秀去武汉讲学，先由上海到南京，然后乘大通轮去武汉。4日到达，住在文华大学。陈独秀到武汉时，曾受到学联代表的冒雪欢迎。

2月5日 湖北学生联合会召开千余人的欢迎大会，欢迎陈独秀和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顾文萃等人。陈独秀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的演讲，认为当今为新旧交替之时代，一般青年实为改造社会之主体。

2月6日 上午，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学校教育多属于知识之教育，而情感之教育则不多”。“西国之强健不仅系知识教育之发达，仰情感教育有以并进之耳。”他说：“贵校系基督教徒所设立，耶稣基督惟其能牺牲自己一切，所以为世界之模范夫。”

下午，陈独秀做了题为《改造社会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了“改造社会三方法”，“（一）打倒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同时他

提出要有两个信仰：“（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

2月7日 陈独秀上午在武汉高等师范做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认为新教育就要方法新、精神新，不在于科目新。他提出新教育有三个要点：（一）教育要趋重社会；（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三）要讲究实际应用。

陈独秀演说后，接待了议会议员刘俊夫等5人来访，谈了“强迫教育”问题。他表示：“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行强迫教育之制。东西各国行之既久，是以富强。”“夫一国文化之程度以国民认字者之多寡为比例”，“其物有本末，事有缓急，吾国疑图存立，此天演竞争之世，当以实行强迫教育制始。”

下午，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欢迎陈独秀大会。陈独秀发表演讲，对武汉国民提出两种希望：（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各业之发达。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许多报纸都作了报道，因此引起了湖北反动政府的注意，他们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当晚，武昌学界周春煦、李慕琪、吴国干等在普海春设宴，为陈独秀饯行。席间陈独秀同他们谈了汉字改革等问题。宴罢即登车返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期间，还通过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对武汉工厂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以后发表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武汉共产党支部建立时，陈独秀即介绍郑凯卿加入。

陈独秀在武汉时，包惠僧以新闻记者身分对他进行了专

程访问，从此二人建立了联系，以后又介绍包惠僧加入了武汉共产党支部。

2月上旬 陈独秀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等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北京政府得知此消息后，在他寓所周围布置了军警，准备待他回京后再次逮捕。李大钊等人闻讯，即派人去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中暂避。

2月12日 在《晨报》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一文。分析了使用白话文在各方面的价值。同一天，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强迫教育谈》一文。

2月13日 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国语谈》一文。

2月中旬 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去天津。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身，躲在车内，由李大钊应付一切。在途中，两人商谈了建党等问题。到天津后，陈独秀乘船去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据《胡适的自传》中讲，陈独秀和李大钊先去河北乐亭县李大钊家中暂避，然后才到天津去上海。）

2月19日 陈独秀到上海，遂即发表了一篇谈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社会改造问题，他认为广州比北京政治空气好，“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第二，关于西南大学问题，他反对将该校办在上海租界。第三，他去广州后改造印刷业，将吾国固有之单音语变为复音语（拼音）。此谈话发表在1920年2月23日的《民国日报》。

2月23日 在《太平洋》杂志二卷七号上发表了《过沪之

谈片》一文。

同一天，写信给北京大学教授程演生，希望他出国时能来广州稍聚。

2月26日 陈独秀从上海再次致函北京大学教授程演生。

2月27日 陈独秀、张国焘、刘涛扬等20多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多次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3月1日 在《新青年》七卷四号上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做了比较正确的批判。他说：“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的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却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预言，当时所意想不到的了。”又说：“贫穷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的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他还认为，马尔萨斯学说是“掩护资本家的偏见”。

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七条解决办法：（一）发展生产事业；（二）发展交通事业；（三）发达科学；（四）发达生产技术；（五）增加劳力的数量；（六）分配平均；（七）限制人口。

3月2日 上海船务栈房工会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等人出席并发表演说，宣传劳工神圣，开展劳动运动，以提高工人觉悟。

3月3日 陈独秀致函胡适，催稿并征求他对开办西南

大学的意见。

3月5日 陈独秀原计划乘船去广州，与汪精卫、章行严等人商议西南大学事宜，因等船未能成行。是日接章行严自广州来电，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将校址设在上海，他们不日即可返沪。后因经费困难，开办西南大学的计划未能实现。

3月9日 《太平洋》杂志二卷八号发表了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

3月11日 致函周作人，向他约稿，并请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

3月30日 上海《时报》连载了陈独秀在江苏教育会上的演讲词，题目是《教育缺点》。他认为：“教育上缺点和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

3月 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秘书马迈也夫等人，偕同翻译杨明斋来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波列沃依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召集在京的进步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座谈，并举行欢迎会、演讲会。李大钊介绍他们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不久，马迈也夫留在北京，维金斯基等人去上海。

3月 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刊登了成立启事，旗帜鲜明地宣布：“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学校还专门拨房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做图书室（即亢慕义斋图书馆）。

四、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4—1924.1)

1920年 41岁

4月 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达上海，受到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4月1日 在《新青年》七卷五号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他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应该注意三点：(一)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团体的活动；(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他愤慨地指出：“中国的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

陈独秀在文中错误地提出要用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他说：“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又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一文。他说：“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4月2日 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现代教育的弊病》一文。

4月5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陈独秀在上海航务栈房工会理事会演说大略，题目是《工人应有之觉悟》。

4月18日 中华工业协会、航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团体，筹备纪念“五一”节大会，陈独秀被推举为大会的顾问。

4月20日 《时报》发表了陈独秀在中华工业协会、中国商界协进会等全体会上的讲演词，题目是《劳工要旨》。

4月22日 《时事新报》发表了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演讲词，题目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爱国救国”。其特有的精神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

4月26日 致函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研究《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和编辑问题。

4月 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文，陈独秀和李汉俊帮助进行了校译，并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4月—5月 陈独秀邀集上海各方面人士，同维金斯基进行了多次座谈，研究建党问题。先后参加座谈的有李达、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陈公培、沈玄庐、邵力

子、沈雁冰、李季、李震瀛、刘大白、懋克水、丁宝林(女)、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维金斯基曾打算由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和主编《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人，联合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在酝酿过程中，戴、张二人拒绝参加。

5月1日 上海工人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因遭军警阻挠，几次转移会场。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讲。大会还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和抗议军警镇压行为的《上海工人宣言》。

同一天，《新青年》七卷六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演讲。他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没有他们，“我们便不能生存”。“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还提出劳动者的觉悟应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他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主张“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开始改变了他过去盲目崇拜西方的观念，认为中国不应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

里，……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改良主义的主张，认为中国应实行“协作社会”，由资本家分一部分红利给工人，让工人入股，“渐渐变到资本家的地位”，“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知耻》的信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他说：“工人劳力所产生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久是要大声叫冤的。”

在《答章积和》的信中，指出“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

5月5日 毛泽东到上海，曾和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列主义书籍，并研究过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此后，二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我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5月24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一文。

5月30日 陈独秀接见上海袜厂女工工会发起人，支持她们工会的成立。

5月 陈独秀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6月11日 在《工界》第五期上发表了《在今日而言劳动的问题》一文。

6月21日 在《工界》第六期上发表了《戏拟劳动家致资本家书》一文。

6月 上海杨树浦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第一、二、三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陈独秀等人组织募捐，支援工人罢工，终于使罢工获得胜利。

同时，陈独秀等人还在上海小沙渡开办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

7月7日 为亚东图书馆新印《水浒》一书作叙。他说：“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美妙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7月19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后移至莫斯科）召开。

8月2日 致函胡适，提出“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的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8月 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等人在上海首先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又有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邵力子等人参加。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决定《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仍

由陈独秀任主编，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参加到编辑部中工作。

8月 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通信，研究建党问题，并报告上海已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建议北京也迅速成立。

8月15日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它是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刊物。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提出“既然是劳工神圣，……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为什么“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8月21日 致函程演生，向他要“白话文稿”。

8月22日 在《劳动界》第2册的闲谈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中，他说：“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在《霍乱和痢疾》、《老爷们的卫生》二文中，指出劳动者的不卫生现象和传染病流行，是穷困造成的。

同一天，陈独秀还致函周作人，向他约稿，并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8月 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招收革命青年学习俄文。由杨明斋任校长。

8月 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不久，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夏曦、郭亮等数十人。

夏 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的王乐平，请他帮助组织共产党小组。王乐平是山东省议会议员，曾创办“齐鲁书社”，对宣传新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把陈独秀的意见转告给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请他们进行筹建工作。

夏 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时和陈独秀交谈多次，陈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并请他回武汉筹建共产党。同时，李汉俊也同董必武取得联系。不久，成立了武汉共产党筹备小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会员二十余人。以后，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1日 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他说：“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又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

存物。”

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

他最后提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他说：“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他认为国家“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的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的表现”。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虚无主义》一文中指出：“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我盼望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恶罪，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

在《俄国精神》一文中提出，当时有人主张“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

起来”。他表示：“我们 倘能将俄 国精神 和德国 科学合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

在《上海社会》一文中提出：“上海 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的中心，那末，中国的舆论和文化可真遭透了。”

此外，还有《男女同校与议员》、《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二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四篇。

在《答费哲民》的信中提出，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

在《答高铨》的信中，主张发展自然科学，避免空论。在教育上主张“男女同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

在《答杨重熙》的信中，主张“挽联、寿联、喜联等一切虚伪的文字，当然不应该存在”。

在《答知耻》的信中提出：“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

9月5日 在《劳动界》第4册上发表了《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文。他说：“我要说一句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的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在这一期中的闲谈栏，还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一文中，做了六种比较：

富人“肥鱼大肉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穷人“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此外，还有《怕劳动》、《贫民窟》二篇。

9月上旬 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在广州筹办《广东群报》，写信给陈独秀，争取他的支持和帮助。陈独秀在回信中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说：“广东和广州是我国的重要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的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

9月12日 《劳动界》第五册通信栏中发表了杨树浦路电灯工厂工人文焕给陈独秀的信，表示“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祝先生身体健康！”

9月19日 在《劳动界》第六册闲谈栏中发表了短文二篇。

在《为什么不吃牛肉》一文中提出，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因为牛替我们出了力。同样，“种田的、织布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肉呀！”

在《无理的要求》一文中指出，上海三新纱厂资本家认为工人罢工是无理要求。陈独秀表示，只有同替人劳作、供人肉吃、不会罢工的牛相比，才算是“无理的要求”。

9月26日 《劳动界》第七册的通信栏中发表了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等答仲渊、慕痴等人的信，请他们来外国语学社，商谈出版《店员周刊》事宜。

9月27日 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致中国政府宣言》（即第二次对华宣言）。

9月28日 致函周作人，约他和鲁迅为随感录栏写稿。并提出“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

9月 “新青年社”正式成立，地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脱离群益书社，而由新青年社出版。此外还出版了《新青年社丛书》及其他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党成立之后，“新青年社”成了党的出版机构。）

9月 陈独秀致函胡适，谈“新青年社”股款和约稿事。

9月 李大钊派陈为人去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联系，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济南共产党筹备小组。

9月底 《广东群报》出版前夕，陈独秀给谭平山等人去信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发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决不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

10月1日 在《新青年》八卷二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再论上海社会》一文中指出：“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在《学说与装饰品》一文中，他说：“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又说：“生产劳动者又受了

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

在《懒惰的心理》一文中指出：“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三篇。

在《答人社》的信中，主张男女同校。

在《答赵仁铸》的信中提出：“增高一国学术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程度不可，增高大学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教授程度不可；此时中国要增高大学教授程度，非多多聘请外国学者不可；这是一定的道理。”

在《答知耻》的信中，再谈工人教育问题。他说：“人类生活的欲望是由物质的进到精神的，断没有丢开物质的便进到精神的。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

10月3日 上海机械工会召开发起会，出席工人代表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等六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陈独秀被推选为经募处主任，又被发起会聘为名誉会员。（经募处10月13日取消）

10月10日 陈独秀为《伙友》创刊号写了发刊词。提出：“本周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就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0月12日 陈独秀致函胡适，要他安心养病。

10月20日 《广东群报》创刊，在“筹办群报缘起”的发刊

词中提出：“广东群报宗旨：（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又说：“我们群报的目的，就是主要改造社会”。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5点希望：“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蔽安乐窝。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0月23日 在《劳动界》第十一册上发表了《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一文。他说：“不敢希望我们中国的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

10月25日 为亚东图书馆新印《儒林外史》作叙。称它“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并提出国人应改变鄙视小说的心理。

10月27日 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写信给陈独秀，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简章的主要条款，如宗旨、会员、会费和组织等。此信发表于《劳动界》第十三册通信栏中。

10月 陈独秀给毛泽东寄去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请他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不久，长沙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书记。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为核心的共产党小组。

10月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和北京大学的邀请，来中国讲学。他到中国后，四处演讲，大肆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开发实业等等。直至1921年7月才回国。

10月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成员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骏、张申府等。不久，又创办了《劳动者》周刊。

秋 维金斯基在上海会晤了孙中山，商谈苏俄帮助孙中山建立电台和军事援助等问题。

11月1日 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发表了《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他说：“封建主义时代只极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说：“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不可逃的命运”，“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独异的。”

在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一文中，他说：“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的改革才得有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他又说：“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

在《三论上海社会》一文中指出：“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

此外，还有《劳动者的知识从哪里来？》一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两篇。

在《答郑宗贤》的信中，批判了郑宗贤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指出：“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中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的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他又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下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在《答柯庆施》的信中，批判了有人妄想用“‘德莫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等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

11月1日 孙中山和陈炯明联合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

陈独秀为此事写信给李大钊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回信

表示赞成，认为“他去广东领导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

11月7日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由李达负责主编。陈独秀为创刊号写了《短言》。指出：“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他号召中国劳动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制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11月 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成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同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同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

11月21日 在《劳动界》第十五册上发表了《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一文，认为劳动运动不应带上“政治的臭味”，不要“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否则，就会被“政客利用”。他提出：“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

同一天，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和陈独秀等人都到会祝贺并发表

了热情的讲话。陈独秀说：“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是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该会聘请他为“名誉会员”。

11月 研究系分子张东荪在11月6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接着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第二次大论战。他们借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贫穷，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

12月1日 在《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编写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包括他《复张东荪先生的信》等，对张东荪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就这一期的随感录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九篇。

在《华工》一文中，他说：“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

在《四论上海社会》一文中，他指出上海的青帮最有势力。

在《劳工神圣与罢工》一文中，他说：“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认为提倡罢工和提倡劳工

神圣“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在《革命与作乱》一文中，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又说：“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否则“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

陈独秀在文中还区分了“政治革命”（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指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

在《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一文中，批判了老子以来的虚无主义，它只能“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返古”。他说：“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

在《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批判了所谓的“民主政治”。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又说：“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

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改正了他上一期提出的点滴改良的观点，他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

是不可知的。”又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此外，还有《提高与普及》、《无意识的举动》二文。

12月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出版《劳动界》、组织机器工会事，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极大恐惧。陆军部在给上海镇守使的密电中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令其查禁《劳动界》等刊物出版，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

12月16日 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陈炯明表示同意，陈独秀遂由上海动身去广州。他离开后，由李汉俊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陈望道担任《新青年》主编。

同一天，陈独秀致函胡适、高一涵。他在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12月 陈独秀致函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告诉他们，《新青年》编辑部已交由陈望道负责，沈雁冰、李达、李汉俊3人也加入编辑部工作。并向他们约稿。

是年 胡适曾致函陈独秀，称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1921年 42岁

1月1日 在《广东群报》增刊上发表了《欢迎新军人》一

文。他提出新军人应有“两大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他主张“军人自治”，用新军人代替旧军人。

1月2日 陈独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做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在于：

| | | |
|----------|---|------------|
| 旧教育——主观的 | { | 教育主义——一个人的 |
| | | 教育方法——教训的 |
| 新教育——客观的 | { | 教育主义——社会的 |
| | | 教育方法——启发的 |

他说：“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

1月11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答冯菊坡先生的信》。讨论了裁兵问题，他说：“虽然将来的法律及军队渐渐和现在不同，而绝对的废止期，几乎是现在的人类一种空想。”

1月19日 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共讲了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他在演讲中，用中外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资本主义“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的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有两大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一是生产过剩。“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

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他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和战争的关系，指出：“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

他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等假社会主义学说。

陈独秀的这篇演讲以后发表在《新青年》九卷三号上，题目是《社会主义批评》。

1月21—24日 《广东群报》连续发表了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题目是《教育与社会》。他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分离，而应打成一片。他说：“若教育与社会分离，是即个人之教育，其效力甚微，其不经济实甚。盖社会支配个人，其力量大；个人支配社会，其力量小，理至明也。”

1月23日 广州隆重举行朱执信追悼大会，孙中山写了祭文，陈独秀送了挽联。他写道：“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

1月24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一文。这是他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演讲词。他说：“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正当的人，就是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

1月28日 陈独秀在甲种工业学校做了《工学生与劳动运动》的演讲，指出：“今日之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他的这篇演讲词连载在

《广东群报》上。

1月31日 《广东群报》上连载了陈独秀在广东省女界联合会的演讲词，题目是《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他论证了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因此，“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对”。

1月 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多次酝酿建党问题，陈独秀表示：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运动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不久，解散了原来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小组，组成了以谭平山为核心的广东共产党小组。

1月 陈独秀和区声白在《广东群报》上就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了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第三次大论战。陈独秀和区声白互致三封信。陈独秀在信中对无政府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针对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的观点，他指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是“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

针对无政府主义主张取消法律，代之以群众公意的谬论，他指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

针对无政府主义“善良教育”的谬论，他指出：“善良教育

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

在信中他还提出：“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这暴露了他蔑视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

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九卷四号上。

1月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年会上分析国内政治局势时指出：“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1月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月 陈独秀到广州后，对改革广东的教育提出了三项计划：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要分期使其绝对普及。二，成年教育，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影戏、音乐、一般的宣传、特殊的宣传皆属之。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外，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

2月初 《新青年》八卷六号在上海出版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没收，并罚款5千元，勒令不准在上海出版。“新青年社”被迫迁往广州，社址在广州兴昌马路26号。

2月10日 广州理发工会成立，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发表了讲话，他提出“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

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学习。”2月下旬，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还到校作了指导。

2月11日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陈独秀，对他表示支持和敬仰。信中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这封信后来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九卷四号上。

2月12日 在《广东群报》上连续发表了《讨论社会实际问题》文章五篇。讨论了小学教育问题、马路撒水问题等。他认为广州没有言论自由，不去研究实际问题，“专门发空议论”。这是“滑稽的言论自由，不法的言论自由，假的言论自由，毫无价值”。

2月13日 陈独秀帮助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宣传劳动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在第一期上发表了陈独秀在理发工会的演说词。他说：“今日中国的工会，不过开始，成立的实在不多。”他称赞广东政府：不独取消了治安警察法，而且制定一种工会法，叫工人依照这种法律和一定的手续，政府就会准许立案，自然受法律保护。

2月14日 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

2月15日 致函鲁迅和周作人，告诉他们《新青年》已移往广东出版，并请他们积极投稿。同一天，陈独秀还致函胡适，邀他到广州一游。

2月20日 在《劳动与妇女》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一文。他说：“自来伦理思想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强者。……我们应该取那一派呢？我以为应该取助弱抗强的社会主义。”

2月 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和陈公培，要他们与张申府取得联系。不久，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等。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前身。

这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周佛海等也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3月8日 陈独秀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观》一文。主张“男女平等”，他呼吁说：“被轻视的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

3月18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辟谣——告政学会诸人》一文。政学系的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说，陈独秀在广州各学校鼓吹“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陈独秀对此进行了辟谣和驳斥。

3月 陈独秀在广东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李汉俊，关于党组织，建议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也草拟了一个草

案，寄给陈独秀，他主张地方分权制，双方表生了争执。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把这个职务推给了李达。

春 陈独秀利用自己职位的有利条件，在广州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指定张汉毅为负责人。谭平山等人曾去作专题报告，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时，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河南区办了机械工人夜校，有学生一百多人，由谭平山任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任班主任。

春 陈独秀主持创办了广东宣传员养成所，以培养革命骨干。养成所的宗旨“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他派陈公博为所长，谭植棠为教导主任，招收进步青年一百多人，开设的课程有共产主义常识，社会科学和社会教育等。

同时，陈独秀还倡办了俄语学校。

4月1日 《新青年》八卷六号发表了陈独秀在广东高师的演讲词，题目是《新教育是什么？》。

4月 陈独秀为新印《红楼梦》写了新叙。他认为《红楼梦》也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他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4月7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决定取消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5月5日正式就职。

5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一号的随感栏中，发表了短文二篇。

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他认为应把这两种运

动分开，不能混同。

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青年之大毒”。他提出：“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5月 苏联代表达敏到达广州，与陈独秀、陈公博等人再次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6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二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下品的无政府党》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只是借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白党”。

在《反抗舆论的勇气》一文中，他说：“舆论就是群众心理的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提出：“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

此外，还有《青年的误会》一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皆平》的读者来信一篇。他主张要“造成科学的风尚”。他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中国、印度古来诸大冥想家、谣言造了几千年，梦语说了几千年，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的知识，比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一毛，我们快醒了。”

6月3日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会同原

驻上海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柯尔斯基，同上海发起组的李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问题，并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来上海开会。

6月7日 在《共产党》第五号上发表了《告劳动》一文。提出劳动者“都必须知道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

6月22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张太雷、瞿秋白等人出席了会议。

同日，《广东群报》发表了陈独秀在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讲词。

6月23日 陈独秀致函易培基，向他报告易白沙蹈海情况。

6月 陈独秀、李大钊联合知名人士周建人、夏巧尊、经亨颐等15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新时代丛书社”，在“编辑缘起”中说，该社的目的是“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学问的人提供下手的途径”，宗旨是“普及国人必要的基本知识”。社址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8号。这是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继“新青年社”之后，创办的又一个进步的出版机构。

7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三号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过渡与造桥》一文中，他说：“永续不断的宇宙人生，

简直是看不见彼岸或竟实无彼岸的茫茫大海，我们生存在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与其说是过渡，不如说是造桥。”“这桥便是彼岸，此外更无所谓彼岸。”

在《卑之无甚高论》一文中，他竟然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若照中国多数人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些议论，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观点。

在《革命与制度》一文中，他说：“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

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中，他说：“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因此他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我以为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张嵩年》的信中，他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

在《答朱谦之》的信中，回击了他的攻击。他曾骂陈独秀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13人。陈独秀在广东为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的经费，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托陈公博带来一封《致各代表的信》，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出席大会，并向大会提出了四点意见：

一曰培植党员。（指发展党员）

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三曰纪纲。（指注意党员纪律）

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指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好准备）

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会议还决定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介绍会议情况，并请他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

8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四号通信栏中，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二篇。

在《答何谦生》的信中，对同善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善社是灵学会的化身，是专门鼓吹封建迷信的团体。他提出，对同善社“只有用刑法来裁制，那里够得上加以学理的批评”。

在《答蔡和森》的信中，他说：“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8月 陈独秀在广东的革命活动，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

恶毒攻击。一批旅居上海的广东守旧派人物，组成一个“广肇公所”，发出通电说：“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要求把陈独秀驱逐出粤。

8月 陈独秀以治胃病名义请假，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在同包惠僧返回上海时，他曾表示：我们没有必要依靠第三国际，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10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

回上海见到马林后，陈独秀又向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他同马林之间关系不睦。

8月27日 致函胡适，提出安徽的政治形势有变化，在上海的安徽人想请胡适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

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9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五号上发表了《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批判了某些人对太平洋会议的幻想，指出：“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借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又说：“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依靠列强只能是“与虎谋皮”。他呼吁说：“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运命。”

9月 陈独秀和中央局研究，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地址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今成都路7弄30号）。对外假称社址在广州。该社曾出版过《共产党

宣言》、《列宁传》等书籍15种。

9月 经茅盾介绍，陈独秀还兼任了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

10月4日 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寓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后又捕到褚辅成、邵力子等人。后经张继等人努力，国民党在上海开办的中华银行用白银五百两保释陈独秀出狱，其他人不久也被释放。10月26日，法国当局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罚款×百元”结案。

陈独秀出狱后，立即以中央局书记的身分召开了会议，研究党的工作。并同马林进行会谈，二人的关系有所好转。

10月 陈独秀与李达等人商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材，开展妇运工作”。同时也可以让一部分干部家属参加，一边学习文化，一边掌握劳动技能。由王会晤任校长，陈独秀、邵力子、沈雁冰等任教员，开办不到一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11月18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工人与军人》一文。他说：“令人失望的中国军人已经糟到不可救药了，令人很有希望的中国工人怎样呢？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他们的内容，不但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

11月20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过激》一文。指出：“过激这个名词是恶探拿来倾陷人用的，正和前清时代拿康党、革命党来倾陷人是一样的作用。”

现在学生界和工会也有用它攻击别人的，真令人痛心。

11月 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并以中央局书记名义通知各区，提出六点要求：

一、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半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

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2千团员。

三、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并切实联络其他工会。

四、中央局宣传部在1922年7月以前，必须出版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20种以上。

五、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

六、按章程改组“青年团”和“女界联合会”。

12月10日 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拜访了孙中山先生，进行了多次会谈。

12月21日 为新印《西游记》作新叙。认为该书“述妖状怪，亦欠深刻”，“这种南北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我们是无所取得了。”

12月 上海平民女校开始招生。

1922年 43岁

1月12日 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1月1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半月刊

创刊。

1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参加。

2月9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一文。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的一个委员会罢了。”他说：“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的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呵！’”

2月10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随感录栏中，发表了《宁波水手》一文。认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有两层重大的意义：“（一）是劳动界阶级的觉悟”，“（二）是劳动界民族的感情”。他呼吁宁波水手，勿贪小利而破坏了香港海员罢工。

3月5日 陈独秀写了《平民教育》一文。他说：“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

3月15日 在《先驱》第四号上发表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他说：“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慄。”“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又说：“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

3月 少共国际执委会派达林到中国来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上海时，曾和陈独秀等人多

次商谈实现国共合作问题。党中央派瞿秋白和张太雷陪同他去广州参加大会。

4月4日 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这个意见没有被全会接受。

4月6日 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金斯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说：“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若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然，我们倘若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4月7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对他们只讲宗教自由，不讲反宗教自由，提出了批评。他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吗？请尊重弱者的自

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4月9日 为汪孟邹开办的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年纪念册》题词。回忆了他在此创办《安徽俗话报》的情况。

4月23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陈独秀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演讲词，题目是《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他说：“我国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只有少数人可以受得到，一大部人简直得不到一些好处。”他提出，“普及教育和妇女问题，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去解决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同一期，还发表了《再致周作人先生信》，批评了他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态度，指出：“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那么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反对过旧思想……等等。”

4月24日 由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动身返回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4月25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陈独秀在上海交大沪校的讲演词，题目是《宗教问题》。他从历史上考察了宗教的起源，他说：“人民所以有崇拜心，不出二种原因：（一）可怕，（二）可爱罢了。”后来，“想要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超过人的灵性的东西，来支配人类的灵魂，于是那抽象的神就被他们想出来了。”他还揭露了基督教会残杀异教徒等罪恶。

4月26日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他同孙中山也多次会谈了国共合作问题。

4月底 根据达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负责干部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等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达林建议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对此，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不反对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但反对加入国民党。

4月30日 陈独秀再次写信给维金斯基，要求亲赴莫斯科，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并请他向共产国际转达这个意见。

5月1日 在《先驱》第9号上发表了《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他说：“对于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自然都应该反对。”“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

同一天，陈独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并作了《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的演讲，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这个演讲词发表在5月3日的《广东群报》上。

5月3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做旧诗》一文。他说：“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的人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

5月5日 陈独秀在广州参加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发表演说，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

5月7日 陈独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长篇讲演。

5月22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一文。他提出了10条理由，对于非基督教运动表示赞同，但同时又警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应盲目的反对教会学校。

5月23日 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

同一天，还发表了《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的态度》一文。提出：“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同一天，陈独秀在陈公博等人陪同下，去惠州访问了陈炯明。

6月3日 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成立大会。后与国内党组织联系，中共中央通知它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6月15日 陈独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判了封建、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废督裁兵”等各种错误的政治主张。提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

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并提议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

6月16日 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

事件发生后，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就两党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中国共产党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会因孙中山先生暂时受挫而改变我党的政策。同时，陈独秀又批评了广东支部偏袒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错误态度。后来陈公博等人在《珠江评论》上仍拥护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因此，中央决定，谭植棠开除党籍，陈公博给予警告处分，谭平山撤销广东支部书记职务。陈独秀这些果断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实现。

6月30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局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了书面报告，汇报了党务情况、政治宣传工作和劳动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并领导了多次罢工，同时，还印发了陈独秀关于太平洋会议的论文5000份。

同一天，陈独秀再次写信给维金斯基，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小。”

6月 为了寻找革命道路，朱德同志到上海，曾会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遭到陈的拒绝。

7月1日 在《新青年》九卷六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一文，共四个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关于剩余价值理论、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又说：“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黄凌霜》的来信一篇。指出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又说：“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

7月11日 马林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对国民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做了过低的估计。

7月16—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12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等决议，并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大钊、高君宇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7月 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8月上旬 由于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回上

海。

8月9日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寓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

陈独秀被捕后，党组织立即发动各阶层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上海、北京等各地报纸连续发表消息和通电，谴责华法反动当局，呼吁立即释放陈独秀。

8月10日 《东方杂志》十九卷十五号发表了陈独秀6月间写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中国政治的状况，也可以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三）是政党之衰弱，……”。他提出，中国的阶级斗争应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

文章还批判了联省自治的主张，他说：“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说：“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

8月12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返回中国，建议召开第二次西湖会议，再次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8月15日 北京《晨报》发表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等10团体“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的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蹂躏中国的罪行，热烈地称颂陈独秀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是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

8月17日 蔡元培等人在北京面质法国大使，请其转令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立即释放陈独秀。

8月18日 上海法国领事当局开庭判决，陈独秀被罚款400元，然后保释了案。

8月20日 陈独秀出狱后，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说明家存4万元的收条，为广东省教育经费，请各方勿生误会。

8月25日 苏俄代表越飞在李大钊、林伯渠等人陪同下，开始同孙中山先生进行会谈。

8月29--30日 根据马林的建议，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马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经过讨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还决定原机关报《共产党》停刊，出版《向导》周报，由蔡和森负责主编。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分别拜访了孙中山，共同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讨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问题，会谈结果十分圆满。不久，李大钊首先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人，也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8月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广州。

8月 亚东图书馆编印了《独秀文存》四卷，陈独秀写了《自序》，他说：“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9月4日 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士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张太雷、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了会议。孙中山讲解了联俄联共的新政策，马林也在会上讲了话。

9月6日 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还担任了国民党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兼国民党本部参议。

9月8日 陈独秀致函汪原放，商议《向导》周报出版事宜。

9月13日 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正式出版，在“出版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最后宣称，本报“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陈独秀在《向导》第一期上发表了《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一文，批判了联省自治的主张，他说：“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

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

9月17日 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答张东荪》一文。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两个途径”，我们应该走前一条路。

9月20日 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了《造国论》一文，他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还处在“造国”时代，面临的任务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他提出的造国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他在分析了国民党的党纲和党员成份之后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的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

9月24日 李大钊、蔡元培等十多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因陈独秀被捕，损失2000以上，故募集捐款。

9月 党中央机关迁往北京，直至“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又迁回上海。

9月 党中央决定派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派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派铁路工会王均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0月4日 在《向导》第4期上发表了《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还威海卫!》一文。根据华盛顿会议决定的门户开放政策，英国应退回威海卫给中国，但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不愿放弃侵略特权。文章对此事进行了揭露和评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一文。当时，有些国会议员到美国顾问芮恩施家中秘密开会，陈独秀提出警告说：“我请诸君小心一点，并且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呀!”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一文，揭露了英美等国妄图共管中东路的阴谋。

10月初 陈独秀曾离沪回安徽一次。

10月 陈独秀、刘仁静、王均动身去苏联。经奉天、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前到达莫斯科。

11月5日—12月5日 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出席了会议，刘仁静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宣布“根据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第一次把国共合作问题公布于众。

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做了《关于东方问题的

意见》的发言，并起草了一个“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提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人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曾参加了这一提纲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议期间，拉狄克同中共代表团谈话，批评中国党“议事日程上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要中国党：“滚出孔夫子的共产主义研究室！”

12月11日 陈独秀致函蒋梦麟、胡适，商议江苏自治学院经费问题。同时提出：“（孙）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此事亦请二公注意。”

12月23日 在《向导》第13期上发表了《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一文。他说：“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很知道俄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由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苏俄，是绝不会‘侵略’的。所有反对苏俄的宣传或谣言，都不过是想离间中俄人民的感情的。”

12月30日 在《向导》第14期上发表了《丧尽利权之鲁案协定》一文。对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协定进行了评论，他说：“惟有没有一个真正人民的政府，才处处损失国权”。“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

1923年 44岁

1月1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国家

建设计划及斗争方针，这是他走上新道路的重要标志。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成形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又说：“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陈独秀带着这一指示回国，并按此精神，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月18日 在《向导》第16期上发表了《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提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不应以阶级、党派、个人的行为作标准，而是“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他还提出，革命派可以变为反革命派，如陈炯明“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

在这一期中，还发表了《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还说不上建设民主的统一政制。目前第一步的奋斗是要比较进步的党派即刻觉悟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打破最黑暗的军阀……及卖国官匪……互相勾结的反动的政局。这种反动的政

局，是中国政治向民主统一的路上之唯一的障碍物，此物不去，民主的统一政治永远不能开始工作，去此障碍即是民主的统一政治开始工作之第一步。”文章还对工人、学生、工商业家以及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等党派发出号召说：“谁是爱国者便应该担任这联合战线上之第一个炮声！”

1月23日 孙中山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中国国民党的参议。

1月24日 在《向导》第17期上发表了《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一文，对国会议员受贿案和国会下令镇压请愿学生案，进行了揭露和评论。关于学生请愿问题，他说：“我们向来不赞成这种叩头下跪式的请愿，正因为他是非革命的方法，是和缓革命的道路，现在既然由国会宣告‘此路不通’，大家赶快另外寻一条可通的路去走罢！”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评蔡校长宣言》一文，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一事进行了评论。他说：“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积极的高尚洁己态度。”又说：“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最低问题》一文。提出要注意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政治问题，不要只谈最高问题。他认为总统问题，“不过是价值二百元的一个小小政治问题”。

1月25日 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对汪原放的婚姻纠纷进行调解。他说：“不可以恋爱妨碍了立身建业。”

1月26日 经过多次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1月31日 在《向导》第18期上发表了《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一文，批评了所谓“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的主张。他说：“中国政治坏到现在这样地步，不是军阀官僚自己要包办政治的罪恶，乃是士、农、工、商都放弃责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张不问政治，甘心让军阀官僚包办的罪恶。”又说：“‘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一文，他宣布：“我们明瞭正确的主张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训练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因而爆发为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

2月7日 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在长辛店和江岸血腥屠杀工人，50多人遭杀害，300多人受伤，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人英勇就义。此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发生时，陈独秀、马林和党中央机关都在北京，吴佩孚曾发出通缉令，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被迫迁回上海。

事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宣言。

2月9日 在《向导》第19期上发表了《为自由而战》一文，他说：“现在恶浊政治热烈的指教我们，使我们渐渐知道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他呼吁：“各界人士其同时速起，为自由而战！”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一文。他说：“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救济中国兵患之根本方法，不专在裁兵，而在改用征兵制来代替现在的职业兵。”他又说：“各级议会的议员都没有相当的职业，这种以议员为职业的议员，自不得不视职业为谋利的工具，这种浮萍无根的议会，自不得不仰权门的鼻息以图生存，他们助纣为虐固然可以横厉无前，若真为民权奋斗而抗权门，直不能一朝存在，议员只能为恶不能为善，乃是必然无可逃避的事实。”“救济之道，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改用由现存的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一文。他说：“我们认定宣传不合作主义，在打倒恶浊政治方面看起来，是绝对无效的方法；在消灭民众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来，却是第一有效的方法。”

2月21日 孙中山返回广州，不再继任大总统，改复大元帅职。

2月26日 陈独秀曾去广州一次。

2月27日 在《向导》第20期上发表了《统一的国民运动》一文。他说：“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事的。”

“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

4月7日 致函胡适，请他帮助出版瞿秋白的著作。同时指出：“孙公(中山)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

4月18日 在《向导》第21期上发表了《怎样打倒军阀》一文，揭露了封建军阀的种种罪恶，分析了军阀横行的原因，提出了打倒军阀必须进行的六项工作。他说：“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他还提出：“凡属民主革命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它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

4月25日 在《向导》第22期上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特点，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还提出了一个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即“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一文。4月16日，沈鸿英公开叛乱，派兵进窥广州，扬言驱逐孙中山离粤。陈独秀认为这是南北冲突的开始，也是国民党与政学系第二次破裂的表现。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一文，批

评了孙(中山)曹(锬)携手的主张，认为这实际上是向曹锬投降。他说：“北洋头领曹锬，代表帝政余毒的旧势力，民党首领孙中山，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势力，两者不能并存，民主革命的企图中，必不容北洋军阀有存在之余地，有了北洋派，便没有民国。”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海军态度》一文，对驻沪海军宣布脱离北京政府事进行了评论。希望他们“结合南北各省革命的军人、工人、学生，彻底打倒北洋军阀”。

5月2日 在《向导》第23期上发表了《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一文，批评了学生运动中“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倾向”。

5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共13条，其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第一次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指示到“三大”闭幕后7月18日才收到。

5月9日 在《向导》第24期上发表文章5篇。

在《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一文中，揭露陈炯明妄图鼓吹地方主义，拉拢粤军，对抗孙中山。他对粤军说：“凡是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都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合力打倒北洋派军阀，建设统一的真正民国，那才是粤军的真正光荣。”

在《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一文中，指出吴佩孚派杨森打四川，绝不是“为中国统一而战”，“最诚实无欺，应该说

‘为杨森割据四川而战’。”

在《可怜的伸手派》一文中，他说：“现在统治中国的封建阶级里面，武的既然拿枪抢大钱，文的只得伸手讨小钱，本没有什么稀奇，拿枪抢钱的诚然可恶，伸手讨钱的也委实可怜。他们这种分赃的怪现象，本是军阀官僚的政治中应有的文章，非经过民主革命，建立民主的国会，是不会改变的”。

在《好个救国妙计》一文中，他说：“曹吴等反动的局面越开展，他们去崩溃的日期越近。”

在《答邓汉琼》一文中，他说：“此时实际上‘统乱’中国的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之王是曹吴，不是黎元洪，黎是曹吴的傀儡。”

5月 山东临城发生了土匪抢劫客车事件，虏去百余旅客，内有外国人26人，曹锟一面将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革职查办，一面向帝国主义屈节谢罪，答应各项条件，允许外国人干涉中国路政，充分暴露了曹锟政府的媚外丑态。

5月16日 在《向导》第26期上发表了文章六篇。

在《闽赣局势之新发展》一文中，指出张作霖、卢永祥、孙传芳等在厦门开会，联合倒吴，“纯然是两派反动旧北洋军阀争夺地位，别无他项意义”。

在《段派之活动》一文中，他说：“段派安福部是中国极腐旧而横暴的军阀官僚之结晶。段派背后是日本，和吴佩孚背后是英美一样，表面上虽是皖与直之争，里面实是日本与英美之争。”

在《吴佩孚与康有为》一文中，揭露了吴佩孚与康有为相勾结。他称吴佩孚是“放纵无行”、“张勋第二”；康有为是“丑妓从良，又复见弃，老而不安于室”。

在《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一文中，批评新闻记者对临城事件的报道中，只知“下流媚外”，“实在比土匪还不如”。

在《国民党与交通、安福》一文中，反对国民党与交通系、安福系相勾结。他说：“国民党欲以革命手段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必当重视全国革命分子，建设势力于倾向革命的民众之上，不得重视官僚分子，建设势力于蠹国乱政的官僚之上。”

在《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一文中，揭露杨森占领四川后，一面大肆吹捧吴佩孚，一面宣称“我们至少要做到像阎锡山之在山西。”

5月19日 在广州《劳动周刊》第六期上发表了《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一文。

5月23日 在《向导》第26期上发表文章五篇。

在《临城掳案中之中国政象》一文中，批评了某些人想借临城掳案来推倒曹吴的主张，他说：“我们断然不可借洋大人来打倒军阀，因为洋大人比军阀是我们更大的仇敌。”

在《孙曹果然携手了？》一文中，指出曹锟令沈鸿英积极向广州进攻，看来孙曹携手之说已成泡影。

在《军阀统治下之学生运动》、《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二文中，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吴佩孚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在《国会议员宣布张阎罪状与曹吴态度》一文中，指出，

在对待国会议员温世霖宣布内阁总理张绍曾罪状问题上，曹锟和吴佩孚态度不一，有“翻脸之征兆”。

5月30日 在《向导》第27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和军阀一丘之貉：“若还不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勾结为患，若还相信外国帝国主义者现在痛恨中国军阀了，以后不援助曹、吴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还在曹锟之上。”

在《吴佩孚的“匪力统一政策”》一文中指出，吴佩孚实行的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匪力统一，在他统治下的河南，已成土匪世界。

在《黎元洪与曹张》一文中，揭露曹锟准备联合张作霖，取代黎元洪，出任正副总统。

5月 陈独秀在广东高师作了三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他说：“这并不是我们发疯，也不是我们好奇，实在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叫我们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它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唯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社会主义是“我们必由之路”。

第二，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能相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

工团主义。他说：“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第三，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他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政治经济特点之后，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

这次演讲，是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解释。

6月1日 孙中山任命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并推陈独秀任委员长。6月8日，发布大元帅指令第240号，予以正式任命。

6月6日 在《向导》第28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一文中，他说：“这种在外国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过是各国共管中国各商埠之变相名词，这样变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费派兵来共管的方法，更是个妙！”

在《中国土匪也来了！》一文中，把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比做土匪，土匪来了指该党派代表马郎柴纳访问上海。

在《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一文中，针对5月7日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的演说，他说：“我们更希望冯玉祥，反对外国侵略勿把美国除外，反对文武官僚贪横勿把自己除外！”

6月12—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多人。陈独秀向大会作了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的中心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同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等。在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大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蔡和森担任宣传工作并继续主编《向导》周报，加上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

6月13日 在《向导》第29期上发表了《日本惨杀长沙同胞》一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沙枪伤中国市民40多人的罪行。

6月15日 《新青年》改为季刊，在第一期上陈独秀发表

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的工作做了小结，指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同时提出，今后《新青年》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刊物，“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流派辩论”。最后他郑重宣布：“《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决议案》一文。

6月20日 在《向导》第30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儿戏之北京政府》一文中指出，北京一些官僚政客，为了拥护曹锟上台，在天安门前召开驱黎运动国民大会，认为黎元洪当总统没有法律根据。他认为：“北京目下之政局，与其说他是恶贯满盈，不如说他是儿戏！”

在《告上海纳税华人会》一文中，他说：“我们更要敬告上海纳捐华人会诸君：要收回主权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可靠，和平请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来交涉，都是不济事的呵！”

此外，还有《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一文。

同一天，广州书店出版了《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一书。

7月1日 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在“本报露布”中称：“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

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先锋，只愿打头阵。”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他论述了农民的痛苦和解除痛苦的方法，提出要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他说：“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但他又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国民运动》一文中，批评了国民党某些人的妄想，他说：“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中国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外国势力，因为国民运动第一目的正是要排除外国势力；既然是国民运动，就应该依赖国民自己的势力，断然不能依赖军阀势力来做国民运动，这种四不相的国民运动，其结果必然是‘王婆照应武大郎’。”

在《国学》一文中，他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不能“在粪秽里寻找香水”。

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一文中，他错误地主张应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建立联合战线。

在《仇孝论讨父会》一文中，回击了湖南宁乡县议员对他的造谣攻击。该议员说陈独秀“无家庭 无政府 无宗教”，“著有仇孝论，发起讨父会”。他回击说“‘三无主义’是一些所谓无政府党人的话，不知何以无端加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身上”。“陈独秀他未曾著过仇孝论，……早已无父可讨”。

7月11日 在《向导》第31、32期合刊上发表了文章四篇，针对北京政变后的局势，号召各界积极开展国民革命。是时，曹锟用卑鄙手段，发动了逼宫式的政变，驱逐了傀儡总统黎元洪。

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的战线，一是军阀的战线。”“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

在《北京政变与学生》一文中，肯定了学生运动的成绩，他说：“同学们！积乱的中国，非国民自力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

在《北京政变与军人》一文中，他说：“民国12年的历史，是大小军阀……的乱国史，也就是一般军人……困苦牺牲的史。”“可怜的军人们！……你们何必千辛万苦拼着可贵的生命为曹锟个人争地位，”“军人无罪，罪在军阀。”

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一文中，他说：“国民党若真与曹锟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所有国民党的忠实党员，都有痛辟此邪说的责任。”

7月18日 在《向导》第33期上发表了《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一文，他说：“将来管理中国的不外三种势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强势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军阀势力；第三，是农、工、商、学生人民势力。”“第三派势力，乃是中国真正主人翁的势力，这派势力目前自然还是混乱、散漫、软弱，但这派势力若终不能集中强固起来管理中国，中国便永远没有救济的希望！”

7月 中共中央发布《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为了挽救危机的时局，“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

8月1日 在《向导》第34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欢迎〈民治〉周刊》一文中，对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出版《民治》周刊，表示欢迎，他说：“我们竭诚欢迎商人阶级起来做国民运动，我们更欢迎商联会的《民治》周刊富于国民运动的精神。”

在《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文中，批评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使馆，请各国保留北京政府承认案。认为这是“认敌为友，非国民运动的态度”。

在《答李子芬》一文中，他说：“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做共产主义的运动。……此时乡村里只宜于国民运动。”

8月16日 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成员中有张太雷等人，直至12月5日回国。

8月29日 在《向导》第38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护路提案与美日》一文中，认为美国和日本反对英国的护路提案，其目的是想鼎足而三。

在《粤局与革命运动》一文中，针对陈炯明企图进占广州的情况，认为“真的革命党人，对于广州之得失不但无所喜戚，或者还以失去广州为国民党真的革命运动之开始发展。”

在《江浙和平公约与商界》一文中，对江浙商界赞成和平公约事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心理之表现”。

8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9月2日 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翌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宣言。

9月8日 在《向导》第39期上发表了文章三篇。

在《日本大灾与中国》一文中，预计日本大灾之后，对华侵略政策会有相当的变动。

在《章炳麟与民国》一文中，批评章炳麟支持黎元洪、陈炯明、赵恒惕等人，是“利令智昏”，“贪昏叛国的小人”。

此外，还有《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一文。

9月10日 党中央由委员长陈独秀和代理秘书罗章龙签名告各地：“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罗章龙同志兼代。”

9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在闸北象山路(原名秀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设立了中央局机关。

9月16日 在《向导》第40期上发表了《黎元洪南来》一文。黎元洪被曹锟赶下台后，避居上海，仍自称总统，“还在和曹、吴吊膀子，这种人是何等可恶而又可怜！”

9月23日 在《向导》第41期上发表了《东铁地亩问题》一文，苏俄愿意归还中东路多占的土地，美国却出面干涉。为此他说：“究竟俄国人(新俄)是中国之好友，还是美国人是中國之好友呢？我们现在该可以明白了罢！”

9月30日 在《向导》第42期上发表了《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一文。指出“曹锟若做总统，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吴的兵力结合起来，人民所受的桎梏将格外加紧。”

9月 苏俄政府派鲍罗廷来华，9月30日加拉罕签署了介绍他晋见孙中山的函件，10月6日，鲍罗廷抵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

10月9日 曹锟以5000元一票的高价收买议员，当选为总统。

10月15日 陈独秀签发了中央通告第19号文件。指出：“中俄外交为现在国内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于反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极有关系。”要求各地发动一场承认苏俄的运动。

10月17日 在《向导》第43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一文中，他说：“受内外二重压迫的国民，应该同时努力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如果“只知道军阀的罪恶，而忘了在军阀背后作恶之帝国主义的列强，实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了！”又说：“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

在《研究系与中国政治》一文中，批评研究系支持曹锟贿选。

在《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一文中，批评新闻记者报道临城事件时如丧考妣，但对日本军警杀害华侨工人174人的事件，却不作报道。

10月20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中国青年》出版。陈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了《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一文，他说：“中

国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做，第一要明白他责任重大，而不可自弃，这是因为国民中只有学生比较是醒觉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这是因为他不及商人、工人、农民有阶级的战斗力。”又说：“青年学生们的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和欧美的学生界不同的地方。”

10月27日 在《中国青年》第2期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一文，反对翻译泰戈尔的著作，他说：“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尔?”

11月7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苏俄六周》一文，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文章歌颂了苏联的成就，驳斥了一些人对苏联的攻击。他说，苏联成就“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谤苏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谤苏俄的过激党；可是感佩苏俄的人，也应该首先感佩苏俄的过激党!”

11月13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科学人生观〉序》一文。当时，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勱、梁启超为首的玄学派，进行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实际是两派唯心主义的混战。陈独秀的文章，既批判了玄学派的唯心论，也批判了胡适的心物二元论。认为两派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说：“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

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11月16日 在《向导》第46期上发表了《安徽学界之奋斗》一文。赞扬安徽学界惩戒国会议员的行动，称他们是“全国学界之领袖”。

11月24—25日 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八人出席。会议讨论了中央局的工作，各委员报告了各地工作的情况，并研究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劳动运动、教育宣传工作、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的准备等问题。

11月25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正式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等9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顾问。会议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27日 在《向导》第47期上发表了文章3篇。

在《陈炯明与政局》一文中，指出陈炯明是曹锟的爪牙，受曹的指使而在广东叛乱。

在《外币与主权》一文中，反对外国在中国发行纸币。他说：“一切外国在中国发行纸币，都是意在操纵金融，用心叵测，应该协力设法阻止，勒令停发，以维主权。”

在《恢复华人领港权》一文中，积极支持1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各口华人领港会议提出的，恢复华人领港权的要求。

1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

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再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党。

11月29日 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

同日，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反对三大政策的“请愿书”。他们说：“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无学理之根据，指斥我党为落后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知其别有怀抱，党员致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他们这一行动，遭到孙中山的批驳。

11月 陈独秀和罗章龙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一号。指示各地应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

11月 陈独秀曾患慢性脑炎，卧床不起，《向导》暂由罗章龙负责编辑。

12月1日 在《前锋》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

对于工人阶级，他一方面承认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另一方面又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对于农民，他一方面承认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

难苟安”，“农民难以加入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他正确地把它分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为以后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亡国者留学生也》一文中，他说：“留美学生亲美卖国，留英学生亲英卖国，……欧美同学会几乎是一个卖国机关。”

在《皇帝与学术》、《辜鸿铭太新了》二文中，揭露和批判了北大教授、封建遗老辜鸿铭。

在《孔圣人又要走运了》一文中，针对曹锟通电募捐修理孔庙一事，指出“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

此外，还有《中华民国的新法律》、《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二文。

12月4日 孙中山发布命令，裁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

12月6日 致函胡适，谈书款问题。

12月9日 陈独秀写了《致胡适》一文，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中，对胡适思想进行了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他说：“‘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唯物史观的哲学家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能“和经济

立在同等地位”。

12月12日 在《向导》第48期上发表了文章二篇。

在《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一文中，指出赵恒惕引北兵进湖南，陈炯明投曹、吴，算什么联省自治派。

在《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一文中，针对两省农民运动遭到军阀镇压的情况，提出“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

12月16日 北京大学举行民意测验，参加者1000多人，当问“在您心目中，国内或世界的大人物有哪几位”时，列宁排在世界大人物之首，孙中山和陈独秀排在国内大人物之首。

12月19日 在《向导》第49期上发表了《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一文，他说：“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国民统一的国家，是新中国主义，什么新西南主义，什么联省自治，都是割据的派头，都是国民革命之障碍”。

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宪法与自治学院》一文。揭露张君勱因支持曹锟贿选，得到了特别拨款，开办了江苏自治学院。

12月25日 党中央发出了陈独秀署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指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迫切将同志非同志可以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同时提出“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参加国民党的“一大”。

12月29日 在《向导》第50期上发表了文章二篇。

在《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一文中，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事，……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

在《宾步程与工人》一文中，揭露了湖南宾步程下令屠杀水口山工人、封闭工人俱乐部的罪行。

五、在大革命洪流中

(1924.1—1927.7)

1924年 45岁

1月9日 在《向导》第51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商界反对火车加价与和平运动》一文中，支持商人反对运费加价的要求，同时提出：“商人们想免此束手待毙的痛苦，只有积极的努力推翻军阀官僚政治才行，决不是他们此时消极的敷衍的省事的向军阀官僚们告哀的和平运动可以有效的。”

在《广东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指出，讨伐陈炯明“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之战争，决不是广东内部的什么孙、陈之争”。

在《内债与军阀》一文中提出，内债不能做混战的兵费和“豢养政客之用”。

在《研究系与小孙派》一文中，认为研究系首领梁启超和小孙派首领孙洪伊，都是“自毁人格为人做爪牙的人们”。

1月18日 致函胡适，请他推荐张申府去商务印书馆任主任。并谈了蔡和森书稿出版问题。

1月20日 再次致函胡适，催办前事。

同一天，在《向导》第52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一文中，希望该会“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要而奋斗！”

此外，还有《日本政友会之分裂》一文。

1月20—30日 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一大”代表，但他没有出席会议。

1月21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唁电苏联致哀，并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1月27日 再次致函胡适，因蔡和森生病，经济困难，催寄稿费。

1月 在《中国国民党演讲集》第一集中发表了陈独秀的《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一文。

2月1日 在《前锋》第3期上发表了《1923年列强对华之回顾》一文。列举了22项各列强国对我国进行侵略和欺侮的暴行，号召开展反帝斗争。他说：“列强不是靠军阀而存在，军阀却是靠列强而存在的。”“我们以为不打倒列强的侵略，中国军阀的势力是不会倒的，因为列强是军阀的靠山，”“是抑制吾人推翻军阀建设民治政府的力量发展之唯一魔王。”又说：“比军阀更甚的仇敌，便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长篇的《实庵笔记》。记载了工人生活、关税、教育、财政、纺织、物价、邮政、银行、外贸

等情况。

在這一期的寸鐵欄中，還發表了短文四篇。

在《精神生活東方文化》一文中，他說：“我們不是否認有精神生活這回事，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生活而存在，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質生活。”又說：“其實人类的文化是整個的，只有時間上進化迅速，沒有空間上地域異同。”“若把東方文化當做特別優異的東西，保守着不思改進”，“是自閉于幽谷”，是“禍國殃民亡國滅種的議論”。

在《國學》一文中，明確提出“學問無國界”。

在《夷場上的農村立國》一文中，批評了章士釗的農村立國論，說他“所理想的農村立國的社会，比現在中國人之生活与文化更簡陋的社会”。

在《聖人也得崇拜商品》一文中，批評了康有為(聖人)，他說：“聖人也免不了衣食住，‘忧道不忧贫’这句话，不过说着好听，其实没有这回事。……在商品崇拜的社会里，虽聖人也未能免俗，这是毫不足奇的事。”

2月2日 在《中國青年》第16期上發表了《列寧之死》一文。他認為，列寧逝世了，但蘇俄的革命事業不會終結。他還論述了社會規律和個人意志的關係，他說：“個人的主觀意志無論如何偉大，決不能創造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的東西”，又說：“個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創造客觀上不可能的東西，而在客觀上可能的範圍以內，却有個人意志回旋的余地，並且必須有此個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創見，這客觀上的可能才能够適當的實現。”

2月7日 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秘密召開鐵路工人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宣言。

2月10日 在《向导》第53、54期合刊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陕西农民的困苦》一文中，讲了陕西农民生活贫困、聚众反抗的情况。

在《日本之政局》一文中，讲了日本众议院被贵族派内阁解散事。

2月15日 致函胡适，催问蔡和森书款，并询问《努力月刊》何日出版。

2月20日 在《向导》第55期上发表文章六篇。

在《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一文中，他提出北洋军阀“一切所谓实业借款，都不过是个名义，事实上都用做军政费”。

在《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一文中，揭露了1918年曹汝霖向日本借款、出卖交通主权的秘密合同。

此外，还有《新疆省之煤油矿》、《法国政党之新趋向》、《印度自治运动》、《卷烟特税问题》四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1篇。

在《兵吗还是匪？》一文中，他说：“督军就是土匪头。”

在《呜呼宪法运动！》一文中，他说：“若是没有一种自身确能遵守宪法的力量来拥护宪法，使宪法得以施行，那全部宪法便等于一张废纸。”

在《列宁碑》一文中，他说：“列宁的伟大，乃在扶助劳苦平民，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军阀财阀。”

此外，还有《马联甲为什么铲烟苗？》、《岑春煊派员投北》、《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呜呼旧历新年！》、《外币

祸》、《缩减军备吗还是扩张？》、《非进口的外货》、《易卜园光与北洋势力》等篇。

2月27日 在《向导》第56期上发表文章六篇。

在《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声》一文中，支持上海总商会反对英美提出的修改商标法的斗争。他说：“我们希望总商会由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进一步而主张废除各种侵略中国主权的条约！”

在《意械事件》一文中，揭露意大利供给曹锟70车军火的罪行。

在《告合作社同志们》一文中，他说：“合作社是阶级斗争中一种工具，不是一种免除阶级斗争的工具。”

此外，还有《土耳其放逐教主》、《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荷兰与远东》等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新闻记者与土匪军阀》一文中，批评了新闻记者，他说：“‘外人’‘洋员’，在这班记者心中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便是该死的奴才。”

在《联省自治的下场》、《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二文中，揭露陈、赵二人鼓吹联省自治，最后依附北洋军阀，吴佩孚令其取消省宪，这就是联省自治的下场。

在《我们不问政治》一文中，批评了无政府党人。

在《中俄交涉与东交民巷》一文中，他说：“东交民巷真是中国的太上政府。”

2月29日 再致函胡适，催蔡和森书款。

2月底 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瞭且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同时规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但对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这次会议还专门就消除党内小组织问题发出了通告。

3月19日 在《向导》第57期上发表了《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一文。2月10日上海织绸厂失火，烧毙女工百多人，陈独秀认为负责者一是厂主，二是江苏省长。

此外，还有《工党政府下之英国罢工运动》一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统一》一文中，他说：“统一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统一之后，“不但不能救同胞于水火，而且兵连祸结，使同胞更不堪其苦，这种统一，我们如何赞成！”

在《慎重与上当》一文中，他说：“北京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之外交，一向是有求必应，从来不知道慎重，从来也不怕上当。”

在《无枪者连拍马也不灵！》一文中，揭露议员给吴佩孚拍马遭斥骂。

此外，还有《恐吓我们的唯一法宝》一文。

3月26日 在《向导》第58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一文中，认为自二七惨案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最近有了新的高涨的转机。

在《飞(菲)律宾之独立运动》一文中，他提出：“马尼拉的工人们学生们：要想独立，便勿怕革命！要怕革命，便休想独立！”

此外，还有《中俄会谈之成败》、《煤油战争》二文。

在这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利用国民党》一文中，他指出：“共产革命是劳资两阶级间的争斗，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对于外族及军阀的争斗，所以只有国民党能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决不能利用国民党。”

在《造谣中伤》一文中，他说：“大凡一个怯懦的个人或民族，对于敌人每每缺乏公开争斗的勇气，他们最得意的手段，是藏在暗中造谣中伤。”认为无政府党人对共产党就是如此。

此外，还有《华官与西人不睦便须更换》、《曹锟的妾舅与洋大人》、《娼优》、《武力统一的榜样》等四文。

4月2日 在《向导》第59期上发表了《工界最近之惨剧》一文，介绍了三大惨案：“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一百多女工；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75个；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53个。”

此外，还有《评中俄协定》一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国故党与复辟党》一文中，他说：“文学革命运动中，颇现出复辟的倾向，文学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

着来。”

此外，还有《拜寿的吃耳光》、《老马与小犬》、《反动》等文。

4月9日 在《向导》第60期上发表了《湖南废省宪运动》一文，揭露鼓吹联省自治的赵恒惕，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只好暗地里做废省宪的运动。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二篇。

在《呜呼改大！》一文中，不同意西南各省把学校改成大学，认为这是“重名忘实”。

此外，还有《外交失利？》一文。

同一天，致函胡适。《中国青年》准备出版反对太戈尔的特号，约他写稿。

4月16日 在《向导》第61期上发表了《上海租界三大问题》一文。指出：“上海租界近来发生三大问题：（一）是公使团要求推广上海租界，以为交还会审公堂的条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届纳税西人会提议取缔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纳税西人会提议增加码头捐。”此3事引起上海商界的普遍反对。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部落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他说：“人类社会之政治观念及组织是由部落的而国家的、而世界的。”他认为中国还处在部落阶段。

此外，还有《美国驻华海军》、《读书时代不许干政》、《帝国主义者制驭殖民地的公式》、《谁叫他们不要皇帝》、《三位一体的国故、孔教、帝制》等篇。

4月18日 在《中国青年》第27期上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认为太戈尔鼓吹的东方文化有三点：“（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三）轻物质而重心灵”。他说：“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

4月23日 在《向导》第62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导淮问题与政治》一文中，反对向美国借款导淮，主张向国内银行团借款。

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中，他说：“国民党左右派之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

此外，还有《美国移民案与海军案》一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象的民族》一文中揭露，外交使团以一象为吴佩孚作寿，而象的特点是“庞大而麻木”。

在《复辟预言》一文中揭露，清室已退位多年，但溥仪仍授张英麟太子太保官职。天津19日办皇会，穿满清制服，全城若狂，此为复辟征兆。

在《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一文中揭露，美国传教士一面传教，一面经商发财。

在《马蜂党与曹锟》、《反对曹大总统？马蜂桥四号》二文中，批评研究系与曹锟相勾结，研究系会址在马蜂桥4号。

此外，还有《外人——外交当局——中国报馆》、《冤大头》、《崇拜太戈尔的主张派兵征服蒙古》等文。

4月30日 在《向导》第63期上发表了文章二篇。

在《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一文中，揭露了1921年中美签订的无线电密约。

在《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一文中，主张学习土耳其，收回教育主权。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太戈尔与梁启超》、《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二文中，批评了太戈尔，称他是“没良心的东方文化代表者”。

在《中国土匪军阀之来源》一文中指出，吴佩孚承认因外国武器运到中国，以至中国土匪越弄越多。陈独秀认为应加上一条，军阀也越弄越多。

此外，还有《洛桑议约与中俄协定》一文。

同一天，还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

4月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一文。认为太戈尔有“两个错误的根本观念”，“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

5月7日 在《向导》第64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一文中，号召学生们团结战斗。他说：“爱国的青年们！我们应该只看见敌人——列强与军阀——压迫我们侮辱我们是何等凶猛，我们不应该单看见弟兄们的小过，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吧！”

此外，还有《英、意人毆伤巡士税吏》、《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欢迎奉天〈东报〉复刊》等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惩罚战争》一文中揭露，上海字林西报鼓吹帝国主义对华实行惩罚战争。

此外，还有《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无聊赖无意识的中国报界》二文。

5月10—15日 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听取了中央局的报告，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对当时党内出现的一些右倾错误也进行了批评。

5月中旬 国民党派汪精卫、张继等人与陈独秀举行谈判，要求中共停止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这次谈判未获解决。

5月17日 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对汪原放等人说：“文学革命不仅要革文言，提倡白话，便算了事，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干的。”

5月21日 在《向导》第66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工界厄运重重》一文中，揭露了当时镇压工人运动的三个事件：（一）5月13日汉口逮捕了工人领袖杨德甫、许白昊等人；（二）湘潭锰矿罢工被镇压；（三）开滦煤矿死难工友只给抚恤金一、二百元，不及骡马之价。

在《汉口之党狱》一文中，针对杨德甫、许白昊、刘伯垂等九人被捕事，他说：“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

此外，还有《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一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中国命运已在华盛顿会

议决定!》、《热心收蒙的先生们那里去了?》、《黎元洪又缩头了》等短文。

5月28日 在《向导》第67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太戈尔与北京》、《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等文中，主要批评了太戈尔。

在《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一文中指出，所谓北京政府是“一班卖国贼合伙凑拢的”。

此外，还有《康有为的道德》、《可怜想吃天鹅肉的中国人!》、《卖阶级的工党政府》等篇。

5月31日 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中俄悬案大纲协定》，两国正式恢复邦交。

6月4日 在《向导》第68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一文中，在揭露了吴佩孚5月27日下令杀害了杨德甫、许白昊等五人的罪行之后，指出：“营私无法乱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们，他们这种行为本不足责，我们所希望的是有良心有判断力的国民，能在这些具体的事实上分出是非向背，然后国事才有可为。”

此外，还有《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三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二文中，继续批评太戈尔，说他是政客，不是诗人。

在《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一文中指出，弱小民族喊大同主义，是“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在《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一文中，主张后者，

反对前者。

此外，还有《以伪乱真》一文。

6月11日 在《向导》第69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一文中，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有两个错误：一是“只做经济斗争，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二是“工人团体独立自主，反对一切政党”。同时他又提出：“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

此外，还有《德国对华赔款问题》一文。

在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英政府何不枪毙罢工的铁路工人?》一文中指出，英国支持吴佩孚枪毙罢工的铁路工人，但在国内它并不这样做。

在《法捕房何不拘捕过激派?》一文中指出，法国要成立俄国协会和俄事通信局，这是大过激派行为，为何不去拘捕?

此外，还有《反对太戈尔便是过激》、《准印度人的亡国奴何东!》、《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等文。

6月14日 为了贯彻扩大会议的决定，党、团中央共同议决并发出通告，要求党和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共组审查委员会”，将青年团中凡超过法定年龄之团员，于信到之日起三个月内，尽量加入党。

6月16日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伪装革命的蒋介石窃踞了校长职位，廖仲恺任党代

表。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其他工作。

6月17—7月8日 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等人出席会议并发了言，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报告中国党进行统战工作取得的成果。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6月18日 在《向导》第70期上发表了《法国政潮》一文，对法国米勒兰政府倒台进行了评论。

同一日，国民党右派分子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再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共产党的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了《“护党”宣言》，明目张胆地反共反人民，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6月25日 在《向导》第71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一文中，提出：“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政，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

在《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一文中，对上海万名丝厂女工罢工，表示支持。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研究系之丑表功》、《政客还不及军阀有良心！》、《研

究系不至如此下流!》三文中，揭露和批判了研究系，他们造谣中伤，下流之极，还不及军阀有良心。

此外，还有《为美国排日》、《还不问政治吗?》、《一个弄错帝国主义之意义的新闻记者》、《石狮子也跑到王氏门前去了》、《仰面事仇的湖南劳工会》等文。

7月2日 在《向导》第72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法西斯党与中国》、《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三K党》二文中揭露，美国的法西斯党——三K党已经传入中国，6月25日在上海曾破获其机关。

此外，还有《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内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二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世界上竟有求军民长官提倡的社会党!》一文中揭露，中国社会党发表通电，请各省长官对社会党惠予提倡。

在《自由舒服与革命》一文中，批评了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太拘束，太严格的错误观点。

此外，还有《华府会议议决到底有效无效?》一文。

7月3日 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本期所长是彭湃。

7月7日 中苏互派大使，加拉罕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

7月9日 在《向导》第73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一文中指出，意大利在天津，法国和美国在上海大量私运军火，这是中国兵匪横行的根源，也必然影响中国的治安。

此外，还有《孙宝琦去职与金佛朗案》、《英法两国之对外政策》二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1篇。

在《假革命党》一文中指出，孙中山说：“升官发财，畏难苟安，这是假革命党。”希望国民党员经常想一想。

此外，还有《顾维钧不会不肯》、《奸商与劳工孰重？》、《“七一”与“五一”》、《恶人假借好名义》、《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玄学家原来如此》、《外国的文化侵略与国民革命》、《老先生们歇歇罢！》、《北京的议员那里去了？》等篇。

7月13日 陈独秀写信给维金斯基，提出：“我们认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即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而必须支持左派的各种活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支持了敌人。”

7月16日 在《向导》第74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上海防盗问题》一文中，他说：“根本弭盗之策，只有止住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本国的实业得以发展，失业游民得以减少，然后才有治标的防盗政策之可言。不然，群盗满国，上海岂能独免！”

在《收回教育权》一文中，支持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决议收回教育权的要求。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二篇。

在《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一文中，他说：“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便不算是国民主义的革命党，便是假革命党；

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更是反革命党。”

在《精神生活与金钱》一文中，讥讽了太戈尔，章行伊等人，提出精神生活也要靠金钱养活。

7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五号通告，针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指出：在政治上，我们为着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们，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同时对国民党之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应由我党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在组织上，则“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并“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同时，要求各地即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同右派排挤和攻击共产党的反动活动进行斗争。

7月25日 在《向导》第75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美国侵略与蒙古独立》一文中，支持蒙古独立，反对北京政府派兵收蒙。

在《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一文中，对北京成立的这一组织表示支持。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学校与监狱》一文中指出，外国是监狱学校化，中国是学校监狱化。

在《收回教育权与中国学校》一文中，对一些人主张由外国人来主持中国教育的谬论，进行了批评。

在《谁是革命分子？》一文中，赞扬了工人阶级在争民族

人格、争自由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斗争精神。

此外，还有《无政府党与研究系》、《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当中国船员》、《神童与诗圣》、《两件不可解的事》等文。

7月30日 在《向导》第76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新银团与中国》一文中，他说：“银团为中国之隐患和使团为中国之显患，是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中国一个政策的两方面，前者是经济方面，后者是政治方面。”

在《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一文中揭露，继意大利利用军火援助曹锟之后，美国又用军械援助吴佩孚，被天津海关扣留。他说：“历来军阀（自袁世凯至吴佩孚）都是依靠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而生存、而恣意为恶，革命党若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者，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

在《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一文中揭露，沙面新警律规定，华人出入要查护照，为此工人举行罢工，而奸商们“对此民族耻辱一声不响。”

8月1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3号上发表了《答张君勱及梁任公》一文，对他们的攻击和诬蔑进行了驳斥。

文章首先回答了张君勱的三点攻击。

第一，张君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发达的英国而发生在落后的俄国？陈独秀回答说：“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此乃就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一般趋向而言；至于资本主义之崩坏与夫社会主义之现实，果在何国开始及完成，又另有其特殊的因果关系。”

第二，张君勱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恢复私有制，

是翻云覆雨。陈独秀回答说：“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何况半亚洲式的俄罗斯；所以此时苏俄采用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

第三，张君勱认为社会发展是很难预料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幻想。陈独秀回答说：“生产力大发展，分工制度大发展，生产方法及生产工具都日趋于集合而不可分离，其结果财产制度亦必日趋公有；此等都可据今因以推求后果，过此以往，欲求知千年万年后的社会制度如向，待富于神秘性的玄学大家重造新推背图，社会科学家惟有甘拜下风！”

此外，张君勱还攻击陈独秀只知接受莫斯科的训令。陈独秀回答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

文章还回击了梁启超的两个攻击。

第一，梁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意志的能动性，是机械唯物论。陈独秀回答说：“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许多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

第二，梁启超攻击唯物史观会导致宿命论。陈独秀回答说：“历史的唯物论不否认个人之努力及其和宿命论不同。”

8月6日 在《向导》第77期上发表文章四篇。

在《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一文中，他说：“我们敢说，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不停止，中国决无治安之可言，尤其于治安有直接影响的是私运军火。”

在《大水灾与赈灾附加捐》一文中揭露，军阀乘北方大水灾之机大发横财。

此外，还有《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加哇的民族运动》二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六篇。

在《留美学生》一文中指出：留美学生“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

此外，还有《光棍平民》、《不要动气？》、《帝国主义者对华一致行动》、《洋人的汽车》、《曹锟的兵》等篇。

8月13日 在《向导》第78期上发表了《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他说：“我们要倾覆帝政，我们要倾覆特权阶级之统治，都应该实行横的国内阶级战争，不应赞成纵的国际战争。”又说：“在此时代，我们不愿反对一切战争，我们只主张以国内战争代替国际战争。”

8月20日 在《向导》第79期上发表文章五篇。

在《美国人又以军火供给北洋军阀》一文中揭露。最近美国又私运军火到厦门，援助吴佩孚。

在《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一文中，警告广东政府不能对商团军采取优柔政策。他提出：“我们以为革命政府的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

此外，还有《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又是一个乐志华！》等篇。

8月27日 在《向导》第80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江浙战争》一文中提出：“此次战争如果起来，我们将取何态度呢？第一，我们应该努力使此次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叫他成为两方地盘战争；第二，我们应该努力在此次战争中增加平民的力量与利益。”

此外，还有《伦敦会议》一文。

在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0篇。

在《佛化恶人》一文中，他说：“几乎可以说凡受佛化的都是恶人！”

在《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一文中，他说：“越受敌人的疾视，越是革命党的荣誉；越受敌人的优容，越是革命党的耻辱。”

在《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

在《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见面》一文中，欢迎孙中山在广东农民联欢会上做演说。

在《“亡党”》一文中，提出：“主张民族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族运动表同情；主张民权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权运动表同情；主张民生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

劳工贫农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工人农民运动表同情；因为表同情是局外人的态度，主张一种主义的党，不应该这样滑稽的不负责任。”

在《猪一变而为狗》一文中揭露，曹锟的猪仔议员又被人骂为“政府狗。”

此外，还有《恶政府碑》、《大学工科与杨杏佛》、《中俄协定与奉张》、《第二犹太！》等篇。

8月31日 党中央为准备召开“四大”，致函各地，要他们准备意见。

9月3日 在《向导》第81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改正了他过去对义和团的错误看法，驳斥了当时某些攻击义和团的言论。控诉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正义性。

9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广州商团事件发表宣言，谴责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干涉。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揭露了曹锟、吴佩孚当政一年来投降卖国、军阀混战和惨杀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等罪行，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最后提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同一天，陈独秀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指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

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9月15日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在上海召集“四大”的通知，原定11月开会，因国际代表未到，故推迟。

9月17日 在《向导》第83期上发表了《我们的回答》一文，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攻击。他们在《护党特刊》、《民权旬刊》等书刊中，叫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说什么“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他们要求跨党的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同时他们还大肆鼓吹劳资调和的谬论。陈独秀指出：“劳资斗争是社会进化上一种不可免的革命现象，主张劳资调和是一种和缓革命的政策，无人能够相信不革命的调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权、可以节制资本，世界上哪有这样好说话的大地主与资本家。”同时他还提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对国内军阀并重”、“不与任何军阀妥协”等号召。

9月24日 在《向导》第84期上发表了《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一文，批评了国民党主张西南团结的策略。他说：“‘西南团结’是和南方军阀有关系的政客们的投机运动，不是革命的方法，……因为西南将领不但没有一个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我们实不愿看见一个革命的领袖为投机的军人政客所玩弄！我们大声疾呼：中国国民党若不放弃国民革命的口号，便不应再走‘西南团结’这条旧路！”

9月 中共中央发出党和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合作办法的指示，提出“要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才介绍入党或青年团；国民党中之左倾分子，除忠实的工人外，不宜勉强拉入党或青年团”。同时规定国共合作后在组织设置上，建立党和青年团

的“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的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这是我党关于设立“党团”的最早规定。

10月1日 在《向导》第85期上发表了《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提出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策略上，应当“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

10月8日 在《向导》第86期上发表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如只提“排满”，所以清室退位，有人即认为革命胜利了。“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

10月中旬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粉碎了广州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

秋 陈独秀和高君曼感情破裂，曾提出离婚。经汪孟邹调解，不离婚，高君曼和两个孩子迁居南京，由亚东图书馆每月汇去30元生活费。

秋 陈独秀曾因伤寒病住院，同中央失去联系，中央秘书处任作民等人曾在《民国日报》登寻人广告找他。

10月15日 在《向导》第87期上发表了《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一文。指出：“近来国民党中所谓右派的反动行为，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

10月23日 发生了“北京政变”，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

翼等率部占领了北京，囚禁了曹锟，改组了内阁，并发出停战主和通电。25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0月29日 在《向导》第89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认为北京改变只不过是“英美更换新工具”，“不但决不能解决中国的纠纷，而且必然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合起来更加紧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之枷锁”。他号召人民“奋起以自力创造和平安定的局面”。

在《肃清内部》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

11月1日 陈独秀签发了《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要求各地加强请示报告。对孙中山北上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11月7日 在《向导》第90期上发表了《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一文。指出：“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制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有力的暗示。”

11月12日 在《向导》第91期上发表了《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一文。他认为国民党应该“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这才是

上策。

11月13日 孙中山应邀北上，行前在广州发表了《北上宣言》。

11月19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以防止北京政变后军阀独裁政权的重新出现。

11月24日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被拥为“临时总执政”。

11月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第二十二号通告——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展开活动》。

12月3日 在《向导》第93期上发表了《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一文，赞成召开国民会议和预备会议，并认为这种会议不仅是议政机关，应同时成为执政机关，以还政于民。

12月10日 在《向导》第94期上发表了《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一文，揭露了段祺瑞亲日卖国、滥借外债、妄开兵祸等罪行。认为孙段合作，决不能实现孙中山之主张。他最后指出：“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

12月17日 在《向导》第95期上发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一文，赞成各省人民团体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他说：“民主政治决非没有人民的动力而可以实现的。”他又说：“中国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一是军阀恢复其势力，武力专政，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

12月20日 在《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发表了《27年以来

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总结了27年以来国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党成立后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事件等。对于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关于二七大罢工，他说：“‘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最后他指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同一天，在《向导》第96期上还发表了《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一文。赞成民选省长，但绝不能搞成“联省自治”。

12月31日 在《向导》第98期上发表了《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一文。指出“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只赞成由军阀和他们自己主持的国民会议，不会赞成有民

众参加的国民会议。

12月 陈独秀和林育南共同签发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通告——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一大时机，因此党及青年团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

1925年 46岁

1月7日 在《向导》第98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一文。当时正值“四大”召开前夕，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造谣说共产党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因而才相信其主义。又说共产党可能勾结吴佩孚陷害工人。文章对这两个谣言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他说：“这两个谣言若是真的，我们便应该枪毙。”

1月10日 陈独秀和罗章龙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

1月11—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二十人，陈独秀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批评了“左”的和右的倾向，并着重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会议通过了决议多项，并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1月21日 在《向导》第99期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告中国民众》一文。他称颂无产阶级的伟大

领袖列宁说：“独有同情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列宁，他对于远在数万里外的中国近代重大事变及在这些事变中所受欧洲各国的欺凌，无不注意到，无不严峻的批难到，他并不宽恕他本国（俄罗斯）政府欺凌中国人之罪恶。”

1月26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修改了团章，张太雷被选为团中央书记。

1月28日 在《向导》第100期上发表了《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一文。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的，它是与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相对抗的一个御用会议。陈独秀在文中号召人民“反对军阀官僚包办的善后会议”，“揭破各派军阀间分赃或暗斗的黑幕”。并要求修改善后会议条例，人民能够选举代表参加。

2月7日 在《向导》第101期上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他说：“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又说：“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2月14日 在《向导》第102期上发表了《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一文，指出：段祺瑞召开的没有民众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只是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一封给章行严的信》。章行严时为司法部长，曾下令以内乱罪镇压共产党。陈独秀的信对他进行了驳斥，同时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存在了五年，其根本职任是拥护工人、贫农的利益，其目前的政治主张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其言为天下人之所欲言，其行为天下人所当行，别无阴谋异行有损害于国家人民而足以构成内乱罪者。”

2月21日 在《向导》第103期上发表文章二篇。

在《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一文中揭露，段祺瑞准备公布国民会议条例，其目的在于愚弄人民。他指出：“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军阀派站在统治地位，那里会有真正的国民会议出现？”

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中，他说：“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六篇。

在《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一文中，坚决反对所谓“孙段合作，加入善后会议”的主张。

在《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一文中揭露，有些国民党的右派组织了“反共产救亡会”。

在《你们早已背叛了国民党呵！》一文中揭露，章炳麟、冯自由、马君武等人竟在中山先生病危时，宣言脱离了国民党。

此外，还有《国际奴隶境遇！》、《善后会议与社会主义》、

《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等文。

2月 陈独秀亲自参与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和其他外国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具体指导罢工工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中、外资本家进行谈判等。这次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3月1日 为了对抗善后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200多人,李大钊、恽代英等人都出席了大会。

3月7日 在《向导》第105期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一文。指出帝国主义者和买办阶级总是以反“过激”、“赤化”为幌子,阴谋分化群众的爱国运动。他呼吁说:“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的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段祺瑞》一文中,反对徐志摩再去请太戈尔的要求。

在《崇信外国》一文中指出,段祺瑞是“崇信外国”,而不是“外崇国信”。

在《陈炯明与辛亥同志俱乐部》一文中揭露,辛亥同志俱乐部是在陈炯明支持下成立的。

此外,还有《军阀与国民会议》一文。

3月12日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3月 孙中山逝世前后,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成

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了“辛亥同志俱乐部”，大肆造谣挑拨，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

3月14日 在《向导》第106期上发表了《悼孙中山先生！》一文。主张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说：“吾们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更有力量。”

同时，还发表了《工人运动与各国在华工业序》一文。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八篇。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文中揭露，过去国会议员去保定给曹锟拜寿，现在善后会议的议员，停会去奉天给张作霖拜寿。

在《废帝得志是何意义？》一文中揭露，溥仪曾向杨以德说，“得志决不忘卿”。

在《护党呢还是叛党？》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另组同志会，唐继尧任理事，他们早已背叛了国民党。

此外，还有《社会党与政府官吏》、《高一涵应该知罪呵！》、《“过激”之第三个解释》、《静候江亢虎在善后会议宣传社会主义》、《“反……救国会”》等篇。

3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有歿而有所变更。”又说：“全中国的民众呵！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

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

同一天，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国民党》。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希望贵中央执行委员会，承继此伟大的革命遗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到底！”

3月21日 在《向导》第107期上发表了《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一）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赞扬孙中山之爱国，一方面批评其晚年倾向布尔什维克。（二）安福系军阀，主要想利用孙中山逝世制造国民党的分裂。（三）研究系政客，对孙中山极力进行诋毁和诬蔑，说中山先生精神久已死去，并造谣说他靠“莫斯科共产宣传费以维持生活”等。

4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的左派力量》。指出“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是我们目前在国民党中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这样才能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4月5日 在《向导》第109期上发表了《统一与分立》一文，再次批判了联省自治，认为这只能是割据，不是联邦。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七篇。

在《呜呼孙段合作》一文中揭露，孙中山死后才一周，段祺瑞在北京就开始逮捕国民党员，封闭了《民国日报》，这就是所谓孙段合作的下场。

在《反段与降段》一文中，认为这也是区分国民党左右派的一个焦点，他说：“反帝国主义与不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农

工运动与压迫农工运动，联俄与仇俄，这三件事本是国民党左右派重要争点；现在应该加上一个反段与降段了。”

在《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劳工！》一文中揭露，上海组织了劳动反共产同盟会，并申请备案。陈独秀认为“不如老实改名资本家官僚的走狗同盟会”。

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究竟是谁荒谬！》、《可惜了50万元的民脂民膏！》、《两角同盟》等四篇。

4月19日 在《向导》第111期上发表了《亡国的上海！》一文。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同时，批判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软弱性。他说：“他们只是在外人及军阀统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军阀的统治权，这原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根性。”

4月22日 《新青年》从这一期开始改为不定期刊，到1926年7月，共出五期。陈独秀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介绍了列宁关于民族革命的理论，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瞭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其更明瞭、确定、周密、扩大之点，最重要的便是资本制度与共产制度间之无产阶级独裁制及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这两个理论”。

5月1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77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通过了章程，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

5月5日 陈独秀和张太雷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要求“各处县、市党部

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

5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由中局指定中央委员一至二人，会同当地书记，外加技术委员一至二人组织临时委员会，以便代表中局就近指导当地的一切实际工作。关于政治问题在非常紧急，时间上不能商得中局同意时，得决定主张，但此项主张，不能与党的根本政策违背。”在这一指示下，广东和北京建立了临时委员会。

5月10日 在《向导》第114期的寸铁栏中发表短文12篇。

在《〈圣经〉与鸦片》一文中揭露，英国向国际联盟报告，一年出口鸦片价值124.6万英镑，出口《圣经》100万部，其中40%在中国售出，我们应该感谢“英人之厚赐”。

在《反共产与军阀》一文中指出，这二者是一脉相通的，反共产就能得到军阀的支持。

在《段祺瑞解散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一文中，认为现在搞国民会议运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在《赤化与软化》一文中，他说：“国民党此时在事实上不赤化即软化，没有中立的余地。”

此外，还有《卖国》、《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班禅与张天师》、《今年“五一”的感想》、《“五一”运动到底应该反对谁？》、《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等篇。

5月15日 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共产

党员),由此引起了大罢工。

5月19日 陈独秀签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为号召和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指示各地要“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5月24日 在《向导》第116期上发表了《“反唐”与国民革命》一文。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采用的工具，北方是段、张，南方是唐继尧，国民党右派又是这两个工具的工具。”当时唐继尧与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共谋颠覆广东政府。陈独秀认为，进行反唐战争，将是“第二次有价值的战争”。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出席。为反对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决定5月30日举行游行示威，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的五卅大示威的决议》。

陈独秀在会上发表过错误的意见，他认为在租界组织示威运动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是我们的成功”。后来在运动中他改正了自己的观点。

5月30日 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群众十多人。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群众中去，实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把斗争坚持下去。

5月 在“五卅”运动时期，陈独秀曾亲自到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英美烟草公司等工厂，向工人宣传反帝爱国斗争。还到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宣传爱国运动。并到郊区（青浦吴家巷等地）找农民谈话，了解农村情况。

6月1日 在我党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陈独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号召群众坚决进行反帝斗争。

6月5日 陈独秀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的文告。指出：“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主义之第一页”。号召开展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的斗争，并提出了四点注意事项。

文告还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

6月6日 陈独秀在《向导》第117期上还发表文章两篇。

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文中，总结了“五卅”事件的五条教训。指出，“五卅”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他还提出了“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等五条最低要求。

在《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一文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五卅”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及其政治背景。

6月7日 上海总工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国驻军等17条交涉条件。

6月19日 为了抗议“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十多万香港工人撤回广州。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

6月20日 在《向导》第118期上发表了《此次斗争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指出“五卅”运动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斗争，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斗争”。认为这次斗争，不能靠法律解决，不能靠政府交涉。“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

6月 广东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

7月1日 由大元帅府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7月2日 在《向导》第120期上发表了《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一文。总结了“五卅”运动的经验，根据敌人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事实，他提出：“急需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同时还提出了组织全国工农兵学商联合大会等5条应付办法。

7月10日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

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并提出了10项要求。

7月16日 在《向导》第121期上发表了《广州战争之意义》一文，分析了广东平定刘、杨叛乱的意义，回击了一些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和诬蔑。指出，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战斗，决非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他又声称：“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

7月 戴季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它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只单独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等等。

8月10日 在《向导》第123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我们认识江亢虎了》一文中，指出，过去只知江亢虎自称是社会党领袖，最近他给宣统皇帝写信，证明“他乃是一位‘颇念旧恩’、‘尚不忘本’的复辟党！”

在《醒狮》与《诚言》一文中揭露，英国印了许多本《诚言》，攻击苏联。

此外，还有《孙宝琦与《醒狮》》一文。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为坚持罢工告工人

兵士学生》。指出：“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

8月11日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表《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发出呼吁说：“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惟有团结自己的势力，联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者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8月15日 在《向导》第124期上发表了《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文。他说：“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

8月18日 在《向导》第125期上发表了《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一文，揭露张作霖派兵去上海镇压民众运动，而上海资产阶级则始终采取犹豫态度。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的联合宣言。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8月20日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

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提出：“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

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

8月23日 在《向导》第126期上发表了《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的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斗争才能继续下去。”他还明确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口号。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江亢虎的人格》、《江亢虎的宣传之道》二文中，批判了江亢虎，指出他的人格“比阴谋复辟还要下流”。

此外，还有《罢工与法律》、《孙宗昉三出风头》二篇。

9月7日 在《向导》第128期上发表了《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分析了三年来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及政治形势的变化，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策略，并始终坚持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且已经深入到民众中去了。

9月11日 在《向导》第129、130期上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戴季陶的攻击和诬蔑，特别是批判了他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论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一文中揭露，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开会，一致讨伐广东政府，并决定出版一反共产刊物。陈独秀提出，这一刊物应请戴季陶去主持。

在《可怜的段政府》一文中指出，段祺瑞政府只敢查禁国民党购买的外国军械，但不敢查禁张作霖。

在《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一文中揭露，奉军在北京可以自行拿人和封闭报纸。

此外，还有《加伦将军的分身法》一文。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的文告。指出：“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社会势力，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卖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

9月25日 在《向导》第131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一文。当时英国为了平息“五卅”怒潮，提出召开关税会议，得到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持。陈独秀提出，中国人民应利用这次会议，力争关税自主。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九篇。

在《“赤化”与“过激”》一文中指出，凡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会被军阀扣上“赤化”或“过激”的罪名。

在《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一文中指出，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开倒车”。

在《是谁的国家？》一文中揭露，天津政府下令禁止学生集会，说它危害国家，不知指的是谁的国家。

此外，还有《康有为与奉系军阀》、《段执政的〈甲寅〉》、《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奉军之大义灭亲》、《帝国主义者

不可无走狗》、《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帮助反动军阀》等篇。

10月12日 在《向导》第133期上发表了《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一文。称赞广州政府“是继续辛亥以来的革命政府”，是“名符其实”的国民政府，它的成败关系着民族运动的命运。又称蒋介石为左派，说他“为国民党建了惊人的功劳”。文章还驳斥了所谓“联俄”政策是“以狼易虎”的谬论。

10月20日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

10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号——声援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指出：“广州国民政府更成了南方抵御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柱石。”“中国现在是处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中，中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

10月30日 在《向导》第134期上发表了《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一文，他说：“我们反奉之目的是在对外得到民族的自由，对内得到政治的自由”，这与直系军阀打着“法统”的假面来反奉根本不同。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五篇。

在《戴季陶之道不孤矣》一文中指出，“想用旧的道德文化救国之戴季陶”，得到了张宗昌、荆嗣佑等人的支持，可称不孤矣。

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一文中指出，每一运动，军阀都说共产党主持的，“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何等力量能够使军阀们这样惊心动魄”。

在《又是一个共产军！》一文中指出，杨宇霆在天津宣布，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是共产军，“岂非奇之又奇。”

此外，还有《究竟谁是不良分子？》、《孙传芳自己想想看！》等篇。

10月 广东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击溃了陈炯明，收复了东江。

10月 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中央局的工作报告。鉴于戴季陶主义出笼，国民党右派极力向共产党进攻，因此他提议，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我们应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样才不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会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决定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要竭力赞助和扩大左派，反对右派，尤其要反对戴季陶主义。

11月7日 在《向导》第135期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称颂十月革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苏联是“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既要反对“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要反对“只坐等世界革命的到来”。他主张“全世界凡是被压迫的阶级以及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家才有出路”。

文章还论述了联俄政策的重要意义，批判了对联俄政策的怀疑和攻击。最后他指出：“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

11月21日 在《向导》第136期上发表了《中国民族运动中
之资产阶级》一文。指出“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
带反动倾向”，在运动后期，“资产阶级已经不掩饰的反动起
来了”。他说：“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
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
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
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
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
求，很容易被他的反动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11月23日 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了西山会议，自称国
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随后又在上海成立了右派伪中央。形成
了“西山会议派”。

同一天，张作霖部郭松龄倒戈，使奉系军阀的统治几遭
倾覆。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打败了郭松龄，使奉系转
危为安。

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
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各派斗争问题》。号召各地发表通电，声
明西山会议无效。

12月1日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为郭松龄倒戈告
全国民众》。宣称“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
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
统一政府’。”

1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开展
群众示威运动，打倒段祺瑞反动政府》。提出：“我们急须助
左反右”，“在左右派势力并存的地方，我们即据三民主义学

会和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在左派势力盛大的地方即应极力阻止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之侵入，并即须不犹豫的开除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表现右倾的分子。”

12月3日 在《向导》第137期上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他说：“国民党的左、右派的分别究竟是什么呢？在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前后，可以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是右派；现在的左右派，都不是这样简单的分别了。”

12月8日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蒋介石召集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党代表开会，公然要求“校内共产党活动公开”，并把党员名单告诉他。提出如有国民党人“愿意加入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事后，又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为了保证军校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企图限制我党的活动。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六十七号通告》，决定开展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批判。根据这一指示，在党的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文章。

12月10日 在《向导》第138期的寸铁栏中，发表短文七篇。

在《中国军阀之左、右派》一文中，转述东方社电，认为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是军阀中的右派，冯玉祥、岳维俊、郭松龄是军阀中的左派。

在《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一文中揭露，西山会议派要在上海设立执行委员会，扬言是为了“预防赤化”。

在《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一文中揭露，郭松龄曾说要“优遇劳工”，奉天商会却发表通电，说这是“俄国赤化之倡言”。

此外，还有《说假话》、《工贼替安福派说话》、《联贼军总司令部》、《〈时事新报〉太赤色了！》等篇。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若干解释》。

12月20日 在《向导》第139期上发表了《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一文。对国民党老右派，他指出：“这批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对国民党新右派（主要指孙文主义学会），虽然他也批评了其反动倾向，但却说：“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他称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他们“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

年底，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中，陈独秀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傖、邵元冲等人举行了会谈。陈独秀反复表白共产党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经过会谈，达成了七条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虽然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等。并建议国

国民党“二大”延期，等这些人去广州后再开。又派张国焘为国民党“二大”党团书记，贯彻上述精神。

12月 陈独秀著《字义类例》一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他自序说：“这本书是我于民国二年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作的，其中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意见，要求读者加以注意！”“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我所以允许亚东主人将他出版。”

12月 胡适致函陈独秀，讨论关于群众烧《晨报》报馆问题。又说：“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

1926年 47岁

1月1—19日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50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占多数。在大会筹备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吴玉章等同志商议，确定我们的政策应该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在中央执委选举中我党党员能占1/3。但这个意见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他派张国焘任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又写了几封长信给出席大会的我党代表。他认为现在正处在革命低潮，因此，在统一战线方面要实行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可以团结国民党。按照他的意见，不仅请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36名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只占7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次大

让步。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目前政局的分析与对策》。19日，又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目前政局的分析与对策的补充》。提出，“在现时政治情形之下，对于实际能否解决政局，我们不必存过分的希望。我们的根本责任是在乘此机会，宣传民众与组织民众，在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势力，扩大革命的势力。”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认为中东路事件“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月 陈独秀在上海生病。国民党右派肖淑宇等人在《醒狮周报》和《民国日报》上却造谣说，陈独秀去武汉勾结吴佩孚。为此，1月21日，《向导》第143期上专门做了辟谣。

1月 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反赤”的口号下，实行了反革命的联合，把矛头指向冯玉祥的革命军，终于迫使冯部退出京津地区，造成了北方革命形势的暂时低落。1月28日，张作霖发表声明，不承认加拉罕是苏联大使，不承担保卫苏联大使馆安全的责任。

2月7日—3月15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蔡和森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通过了《中国问题议决案》。在会议期间还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对省港大罢工表示声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民党作为同情政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代表国民党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当了主席团“名誉委员”。

2月7日 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呼吁说：“全国的革命民众！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行总攻击！”

2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要各地宣传国民党“二大”的成功和重要意义。要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政策”和“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在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去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去拉住一部分较好的右派首领，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

2月21—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人出席。会议确定我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同时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要求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民支援北伐战争。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3月2日 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诺夫斯基)为首的“苏俄观察团”到达上海，同陈独秀进行了会谈，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的状况和广东的形势，讨论了北伐的时间、利弊以及同国民党军合作的可能性等。陈独秀的看法比较悲观，布勃洛夫认为，虽然现在处于革命低潮，但资产阶级还没有退出民族运动，可以尽快北伐。会谈后，观察团去广州。

3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

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员书》。提出：“中山先生有灵，应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认为右派分裂有三个原因：一是反对共产派，二是反对苏俄，三是反对联共联俄的左派。最后提出“总的口号”是：“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

3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第七十九号通告——关于2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又说：“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

3月17日 在《向导》第146期上发表了《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指出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出现了反赤运动。他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又说：“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

3月18日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领导下，为反对日本兵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到国务院要求见段祺瑞，段下令卫队开枪，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3月20日 广州发生了“三二〇”事件。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逮捕了海军局代

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阴谋反共的一次进攻。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给以还击，陈独秀却主张采取退让政策，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太突出了，只能退让，不能还击。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指出：“目前这一时期是再危险没有了。”“苟安的心理是再不能有了。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否则苟安就是送死。”

同一天，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还发出了《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

3月23日 冯玉祥动身去苏联访问。他在《真理报》上表示：“本人深佩共产党之勇气、奋斗精神及其对人类之责任心。”

3月24日 布勃洛夫和苏联顾问开会研究“三二〇事件”。布勃洛夫认为这一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小规模政变”。会后，布勃洛夫领导的“观察团”返回苏联。

3月27日 在《向导》第147期的寸铁栏中发表短文三篇。

在《红派势力与外人势力及曹锟势力之消长》一文中揭露，冯玉祥败后，北京出现了释放曹锟和撤销检查贿选议员案的运动。《字林西报》认为，这是铲除红派势力的运动。

在《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一文

中揭露，在南京和湖北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时，国民党右派大声疾呼打倒共产党，不知他们究竟是谁的信徒。

此外，还有《安格联为什么要听张作霖的电令》一文。

3月29日 国民党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篡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恶毒攻击和谩骂中国共产党，造谣说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47万元之多”。他们认为：“三二〇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等等。

3月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了军校情况，他说：“黄埔军校竟然升起‘蒋’字大旗。校长吃饭，要军乐队伴奏，真不成体统。”陈独秀要他冷静、忍耐。

3月 针对“三二〇事件”，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报告，陈述个人意见，主张国共合作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我们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共产国际不仅拒绝了他的建议，反而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评。同时，派维金斯基再次到中国来，矫正退出国民党之倾向。为了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陈独秀放弃了自己的建议。

4月3日 在《向导》第148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声明中国共产党决无“倒蒋阴谋”。又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

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广州事变之研究》一文。认为“三二〇事件”，“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他说：“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就形成了以宋教仁为首的右派，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国民党“一大”时，又出现了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国民党“二大”时，又出现了以戴季陶等人为首的新右派，这个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他又说：“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三篇。

在《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了》一文中揭露，帝国主义使团开会，极力主张促进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完全合作。

此外，还有《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国民党右派之光荣》两文。

4月初 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代表共产党中央去处理“三二〇事件”的善后事宜。

4月初 苏联共产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布勃洛夫观察团的报告，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决定：继续进行留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对国民党右派或使其退党，或开除；继续援助国民军；停止省港罢工等等。

4月13日 在《向导》第149期发表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什么是帝国主义呢？他说：“现代所谓帝国主义乃指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同时指出，苏联决不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正是帝国主义之仇敌了”。

什么是军阀呢？他说：“军阀的特性有二：（一）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二）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对于蒋介石假装辞去军职一事，他说：“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然绝不可有军阀，但不可无担任军职之军人，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又说：“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

陈独秀在文中还提出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居很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六篇。

在《你们代表谁？》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开会时，代表是任意指定的，未曾经过选举，不知他们代表谁？

在《反赤苛政》一文中指出，宣传反赤最力的军阀，也

是搜刮人民最惨，实行苛政最厉的军阀，如李景林、张宗昌等。

此外，还有《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一个不行动的党》、《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独立报〉对谁独立？》等篇。

4月20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提出了“拥护北伐”、“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

4月23日 在《向导》第150期上发表了《国民军与北方政局》一文。分析了当时北方的革命形势，在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被迫下野，国民军也开始右倾，采取了遂段（祺瑞）、释曹（锜）、迎吴（佩孚）的政策。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大会》一文，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彻底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4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七号——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对策》。分析了北方的政局，提出以下宣传口号，“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和平！召集国民会议！”

4月29日 鲍罗廷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了会晤，达成了三条“君子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翼的措施；（三）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战争。

4月 蒋介石、李济琛等人在广州组织了特别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制定北伐的军事计划。

5月1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502人。大会通过了12项报告和决议案，号召全国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

同一天，陈独秀在《向导》第151期上发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一文。分析了几年来工人运动的情况，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指出：“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但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九篇。

在《唐生智也赤了吗？》一文中指出：吴佩孚打冯玉祥，说是讨赤，现在叶开鑫打唐生智，也说是讨赤。唐生智也赤了吗？

在《反赤的滋味》、《各国公使为什么均有喜色》、《白俄不是外力吗？》三文中，主要是揭露奉军进占北京的罪行。他们以白俄骑兵400人由安定门入城，又强令兑换军用票，更要求俄大使加拉罕离京，因此各国公使均有喜色。

在《这是以党治国吗？》一文中揭露，广州公安局竟然检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这不是以党治国，而是以警察治党。

此外，还有《捷足射利的上海》、《讨赤大元帅》、《国民外交原来如此！》、《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等篇。

5月3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招收学员320

人，毛泽东任所长。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〇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在对时局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我们敢断定现时最反动的局面，欲得一长期的巩固，比较困难。”“我们现实的工作原则是：统一革命势力。取得群众，深入群众，扩大及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注意部分的要求，地方的要求，从小的斗争汇合成总的革命势力。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维持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注意农民运动。”

对于我们党的工作，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行动左稚，并且还未脱研究的小团体的习惯，不能称为政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学会，至多只做到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不能实际领导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不能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

5月8日 在《向导》第152期上发表了《最近政局之观察》一文。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局势，特别指出，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张和直吴可能发生冲突。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我们要认清敌与友》一文。他说：“应该简单明瞭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等处驻兵及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奉军胜利之教训》二文中，用国民党和讨赤军的军纪作了对比，揭露奉军军纪败坏的罪

行。

此外，还有《张作霖口供中之赤与反赤》、《章炳麟与镇威孚威》二篇。

5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〇三号——北方的政局与我们的宣传活动》。

5月15日 在《向导》第153期上发表文章三篇。

在《南方形势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根据地。”

在《宪法与贿选》一文中揭露，吴佩孚致电张作霖，提出5点理由要求维护曹锟制定的宪法。对此，陈独秀指出：“人民便坚决的回答道：我们根本主张贿选的国会议员、所制宪、所举总统及贿选总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一切无效。”

在《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一文中，认为世界已进入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是整个世界的革命时代”，应该“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支援过中国的五卅运动，中国人民也应该支援英国工人的大罢工。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张作霖吴佩孚的假慈悲》一文中揭露，张作霖要运粮进京，赈济灾民；吴佩孚要请张天师去汉口祈祷和平。实际上这都是“猫哭老鼠假慈悲”。

在《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谁？》一文中，指出，外国人对初进上海的孙传芳表示优待，其目的在于以对他的好感换

取他对中国人民的恶感。

此外，还有《不怪外人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官民合作》二篇。

5月15—22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行委员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第三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

自这次会议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逐渐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

5月22日 在《向导》第154期上发表了《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采取的态度》一文。当时，张作霖与吴佩孚因组阁问题发生了冲突，陈独秀认为这是对民众有利的。他还提出国民政府在军事行动上要“先讨吴后讨张”。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孙传芳最近的主张》一文。孙传芳主张由颜惠庆摄阁，同时声明他仍采取保境息民的政策。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10篇。

在《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一文中指出，孙传芳说中国三千年前就有了过激主义了，如汉朝时的匈奴即有过激行动。如此说来，过激主义也成了国粹。

在《李景林张宗昌之共产》一文中指出，如果把“强夺他人财产以肥私就是共产，那么李景林、张宗昌早就实行”。他们是自己骂自己了。

在《是地痞还是警察?》一文中提出，在北京扰民最甚者
是地痞? 还是王怀庆的警察?

此外，还有《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师生合作与学生
会!》、《合肥段公与总统曹公》、《又是一个曾左!》、《吴佩孚
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孙宝琦语妙天下》、《你们还要反
赤吗?》等篇。

5月25日 在《新青年》不定期刊第4号上发表了《孙中
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一文。批判了国
家主义，指出“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他
认为民族运动有三种，孙中山先生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
的民族主义理论也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

5月30日 在《向导》第155期上发表了《打破“民族的巴
士的狱”》一文。为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号召继续开展反帝
斗争。他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
族的巴士的狱’”，“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
革命运动之开幕”，“如果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打破帝国主
义者所加于我们精神上的镣锁，一致起来打破八十年来这‘民
族的巴士的狱’，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运
动的工作!”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三篇。

在《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一文中揭露，吴佩孚曾说：孙
中山、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等人都过激了。

在《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一文中指出：日本为了
推行大亚细亚主义，在长崎召开“亚细亚民族大会”。陈独秀
认为，中国人不能参加仇人召开的会议。

此外，还有《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一文。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指出：“去年今日的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又说：“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啊！”

6月3日 在《向导》第156期上发表了《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一文，批评了在纪念活动中总商会和国民党右派的表现。提出：“更希望大家今后一致起来巩固我们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国主义持久作战，以期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我们中国人才有生路。”

6月4日 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对蒋介石的一些攻击言论给予了必要的驳斥。但他又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陈独秀这一说法，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

同一天，陈独秀还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不但不进行反击，反而提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

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

6月16日 在《向导》第158期上发表了《红枪会与中国农民暴动》一文。红枪会是农民暴动组织，遍及河南、山东及河北、安徽等地，其纲领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捐杂税，反抗土匪。陈独秀认为，不能任其自发暴动，应把他们引导到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之下。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六篇。

在《威林顿眼中的华人价值》一文中揭露，英国代表威林顿来华后在京演说：“余囊中携有一万万元巨资，故华人皆愿与英人合作。”

在《反赤军惠及警察》、《请看反赤军阀之卫国救民！》、《好个“为国家立了大功”！》等文中，揭露反赤军（奉军）的军纪败坏，在天津到处抢劫，逼得天津警察罢岗。

在《人类的耻辱》一文中，称猪仔议员是“人类耻辱的下贱东西”。

此外，还有《平民之不平》一篇。

6月中旬 在北伐前夕，苏联顾问加仑提出，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东区委派周恩来去上海请示。当时陈独秀正在生病，对此事漠然置之，回答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好了。”于是，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在北伐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这实际上等于听任蒋介石为所欲为。

6月23日 在《向导》第159期上发表了《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一文。认为皖系失败后的奉直对峙是“非常之苟安的苟

安局面”，这是不能持久的，不能希望军阀的诚意合作，以求苟安。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八篇。

在《中日亲善声中之日本侵略》、《好个经济上的提携》、《平民的中日亲善》等文中，主要是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同时提出：“我们只应对日本平民讲中日亲善，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讲中日亲善。”

在《官绑票》一文中揭露，反赤军居然绑架了中国银行行长汪撈伯，可称“官绑票”。

此外，还有《“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工人活命问题》、《共产主义适合于国情》、《徐锡麟孙宗防你又来了》等篇。

6月28日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对陈独秀给他的信作了公开答复。他说：“陈独秀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他是辩驳我对党代表宴会的时候所讲演的一篇话，……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3月20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再声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的！”

6月30日 在《向导》第160期上发表了《革命的上海》一文。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以前‘洋奴化’的上海”。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九篇。

在《左排赤党右讨军阀》、《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的政纲》三文中，揭露和批判了国家主义派。他们崇拜背叛民族的曾国藩等人，又劝蒋介石用武力铲除共产党。

在《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一文中指出，他们以同一声调骂农会是土匪。

在《可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一文中，他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

此外，还有《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刘芦隐与张君勱》、《雷殷犯了什么罪？》、《美术家再往何处遁？》等篇。

6月 陈独秀派彭述之去广州，代表中央同国际代表和广东区委的同志们商议，主张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琛等人的枪械，匀出5000支来武装农民。国际代表却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因而拒绝了这一要求。

6月 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商，确定了联合进攻革命的计划。孙传芳由于同他们有矛盾，暂时挂起了“保境安民”的招牌。

7月1日 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7月7日 在《向导》第161期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的北伐》一文，对北伐持反对态度。他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

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又说：“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四篇。

在《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文中指出，吴佩孚曾说：“蚩尤是赤化之祖”，孙传芳说“过激主义这名词已发现三千年前了”。若如此，则都应是国粹。

此外，还有《吴佩孚与国会议》、《顾维钧的巨款从何而来？》、《丁文江第二次“友谊的磋商”之结果》等篇。

7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的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同时提出了民众联合战线的23条共同政纲。

7月12—18日 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报告》，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民族运动的前途和党的状况。会议正确地指出，国民党内部已经分化成左、中、右三派，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会议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能否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还主张发展工农武装。

但是，会议对北伐持消极态度，13个决议中，对北伐只字未提，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竟指责我们犯了“包办”的错误。在农民问题上，批评农民运动“过左”，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这都表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7月14日 在《向导》第162期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同时指出，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是如何横暴侮辱；中国代表买办阶级的总商会是如何卖国自残同类；官僚是如何昏聩误国；新闻界是如何畏怯不能发表舆论”。

7月25日 在《新青年》不定期刊第5号上发表了《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反对苏俄援助的谬论，指出：“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又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他还指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斗，不断的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地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

7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对吴佩孚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分析了当时的政局，指出，“广

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仍是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号——关于省港罢工》。对坚持一年之久的省港罢工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提出：“我们现在要有决心和有很好的政策去结束罢工了，但我们的目的，要工人得到有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

8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坚决清洗混入党内的投机腐化分子。

8月7日 中共中央通知各地，迅速建立农委，并和中央农委建立密切关系。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粤港罢工工人书》。提出应很好结束此次罢工。

8月14日 发出《中央致豫区信》，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人从事军事工作，认为从事军事工作就无力顾及民众工作，必将徒然“替别人作苦力”，“替别人造成战胜的局面来压迫我们”。

8月19日 北伐军占领长沙。

8月底 北伐军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

9月3日 北伐军开始进攻江西。

9月5日 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和平居民，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五、六千人，炸毁民房数百家，制造了“万县惨案”。

9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五号——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要求各地发表宣言，发动民众，“以遏阻英帝国主义之阴谋”。

9月初 北伐开始后，在国民党中掀起了一个迎汪（精卫）抑蒋（介石）运动，国民党左派和李济琛、唐生智等实力派，都希望汪能复出。对此问题，陈独秀一方面赞成迎汪复职，另一方面，又要在汪、蒋、唐（生智）之间搞“均势”力量平衡，以便互相牵制，维持革命统一战线。

9月初 蒋介石请胡公冕同志去上海见陈独秀，请求共产党勿赞成汪精卫回国，理由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些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缓和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士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9月13日 在《向导》第171期的读者之声栏中发表了《答张人杰等》一文。指出，民众“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它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又说：“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

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9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提出，“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

9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粤区的信》，再次提出现在倒蒋太危险，一是“将使国民政府发生极坏影响”，二是“继蒋而起之李济深、唐生智亦不可靠，”“恐蒋去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因此，要宣传蒋汪合作的口号。最后，指示粤区“应把所有能力集中在农民运动上，去做反对土豪劣绅工作。”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提出，“我们现在对付这各派冲突的政策是：一，从革命的全局看，若果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在现时的军人，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

《报告》在分析了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变化后，认为已形成“蒋介石独裁局面”，“党权、政权、军权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报告》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是，“一，要建立我们独立的政治宣传，巩固我们的社会力量；二，积极发展左派的实力，使左派能够实际管理党务，直接参与反对右派之斗争；三，使国民党的组织更宽大些，能包容整个的革命团体加入，使国民党更能成为群众的大党；四，对右派不断的暴〔露〕其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这是使右派失去社会地位、隔离中派与右派结合的方法；这种攻击是与左派共同动作，才能免去使此斗争成为共产派与非共产派斗争之嫌。”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提出，“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改造广东省政府”等。针对“三二〇事件”，指出，“若把3月20日真相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混一点。”

9月21日 中央局和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起开会，研究迎汪复职问题。为了避免蒋、汪及各派军阀之间的冲突，保持权力平衡，作出如下三条决定：

一，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回粤，将党权交汪。

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力的冲突，将地方的军队和财权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主自治政府，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致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

三，我们当引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给广东信）》。指出，我们赞成迎汪复职，决不是为了“迎汪倒蒋”，而

是为了“蒋汪合作”。

9月25日 在《向导》第172期上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提出“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还明确表示，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决不会同国民党争夺政权。他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又说：“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些都反映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11篇。

在《人民之军队!》一文中揭露，孙传芳自称是人民之军队，要求国民革命军把武汉让给他，作为和战条件。

在《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一文中揭露，美国公使马慕瑞在招待会上说，治外法权“此时实属必要之物，明知其弊，而实不能去之”。

在《这也是赤化运动吗?》、《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二文中，揭露了吴佩孚和国家主义派对“万县惨案”的态度。

此外，还有《张宗昌的亲口供状》、《南军之行为》、《……政还诸……民》、《丑哉和平运动!》、《师生合不作》、《反赤的老国民党原来如此》、《建设专家研究系》等篇。

9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局给鄂区的信》。对董必武等人参加湖北省政府，表示反对。指示说：“我们的人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

9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五号通报，刊登了“加仑同志对未来国民政府的见解”一文。他提出“国民政府在与各省政府的关系方面，不应是一个过分集中的政权，因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能采取各省自治政府的联邦形式。目前每个省应举出两人，联合组成中央政府，再由这个组织推举出各部司负责人。当然，各省的政权应当比广东省偏右一些。”

10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粤区信》。当时，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汉口成立“特务委员会”，以处理湖北的党政事务，并拟请李大钊参加。中央指示广东区委出面同国民党中央交涉，“李同志绝不能参加这个组织”，“不仅李同志，就是我们任何同志现时都不能加入”。

10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当时，黄埔军校决定在武汉建立分校，招收大批入伍生，以培养北伐的下级军官，这本来是我党派人从事军事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中央通告中却规定：“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把黄埔军校仅当成谋生的场所。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粤区的信——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认为：“蒋个人此时确日向左倾。”“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

不可鲁莽从事。”

10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提出要努力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给他们“以负责的机会”，使他们“有群众，有力量”，“去掉怀疑、畏惧、防闲的心理”。并严厉指责广东区委犯了托洛茨基派的错误。认为“过去我们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使党及革命的前途均受着许多坏的打击”，“这个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现在“尚使我们不扶助国民党左派有力的独立起来，工作起来，便是等于背叛革命的利益”。

10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指示各地党组织，迎汪(精卫)是为了“蒋汪合作”，因此，迎汪一定要得到蒋之赞许，千万不可“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否则，“殊太危险”。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复湘区信》。指出：“此时必须立足于在野党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在野党态度”。

10月10日 在《向导》第173、174期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一文。揭露了英国制造万县惨案的事实，并指出：“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

同日，北伐军攻克武昌。

10月12日 在《向导》第175期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争斗？》一文，分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认为当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是民主主义胜利呢？还是半封建的军阀胜利，这要看我们是怎样争斗和争斗的努力至何程度

了”。关于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他提出：“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11篇。

在《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等文中揭露，孙传芳化了一千元大洋，请章炳麟写了一个劝其讨蒋的电文，章炳麟真是“廉耻丧失”。康有为去奉天拜见张作霖，也得了仪程不少。

在《妙哉孙传芳的三爱主义》一文中指出，孙传芳提出了三爱主义：“一爱国，二爱民，三爱敌”，以此来抵制三民主义。

在《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一文中揭露，《时兆月报》鼓吹顺从才能和平，应该“服顺所有中外掌权的人，惧怕他，恭敬他”，这就是中国和平的奥秘。

在《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他提出应该“以党治国”，“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此外，还有《研究系主张社会革命！？》、《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请看治外法权所产生之公道！》、《反赤派听者！》等篇。

10月15日 在北伐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如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动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同时还决定迁都武汉，敦促汪精卫回国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些决议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的猖狂进攻的。

10月17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出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我们党已经“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发展到四万人以上，青年团应照此数增加一倍。”并规定了各地要达到的数字和成份。他说：“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他又提出，在农民运动已经兴起的省份，我们党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

10月19日 在《向导》第176期上发表了《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一文，认为国民党中央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确立新的政纲。他说：“应该产生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纲，而且马上就能够实施这一新政纲。”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九篇。

在《北京黑化了！》一文中揭露，北京禁烟所明文规定，鸦片和烟枪可以上税，已登记烟馆四百余，烟枪八百余，鸦片也涨价了。这样北京吸毒就合法化了。

在《上海包庇贩烟土者是谁？》一文中揭露，私贩烟土者就是孙传芳、丁文江、傅筱庵三人的合股公司。

在《避开革命的新方法》一文中，批判了张水淇提出的“中国人多所以盗贼多”的谬论。他说：“中国的经济命脉倘不操诸外国帝国主义之手，内部倘没有军阀扰乱和摧残农工商业，以中国的土地产业养中国人，一时那里会有什么人口问题。”

在《高喊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一文中，他说：“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

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因而也没有国旗。现在“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在《丁文江与爱国行动》一文中揭露，上海逮捕了讨论万县惨案的各团体代表，丁文江还主张严办。

在《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一文中揭露，曾琦扬言，讨论万县惨案，“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

此外，还有《讨赤特捐》、《傅筱庵的和平运动》、《那里有中华民国?》等篇。

10月24日 爆发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曾一度占领浦东，但不久即失败。

10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提出：对于那些已在军队中工作或将要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央要他们只作政治教育工作，不得就任“其他实权官职”。

10月 共产国际曾给中共中央发来一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还明确提出，要向北伐军地主出身的军官让步。

11月4日 在《向导》第177期上发表了《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一文。对冯玉祥的五原誓师表示赞赏，他说：“我敢说他(冯玉祥)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的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14篇。

在《军阀口中的赤化与苏俄》一文中揭露，福建后方司令

李生春发出取缔赤化布告，造谣说：“苏俄实行赤化，时未数年，几致国破人亡，其由饥饿而死者，竟达全国五分之一。”

在《何以军阀辈这样爱国？》一文中揭露，杨如轩曾发表通电说：“赤党弄兵，为俄服役，祸国殃民，普天同愤”，以此表示爱国。

在《请看研究系站在那一边？》、《原来抗张吴就是乱华！》二文中，主要是揭露和批判研究系。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苗民和蒙古的国家主义者》等文，主要是揭露和批判了国家主义者。

此外，还有《到底谁没收人民财产？》、《帝国主义者意中的反赤作用》、《孙传芳、丁文江是不是中国人》、《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比约与顾内阁》、《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爱国的顾内阁》等篇。

11月4—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认为“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国民党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但国民党内部已经发生变化，“三二〇事变”以来，戴季陶和蒋介石已形成新右派。最后他说：“现在我们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政策，和上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国民党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国民党左派联盟因农民问

题而分裂。”

在这次会议上，还制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指出，“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并提出了九条农民政纲。

11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粤区信》。当时有许多同志向中央提出，对占领两湖的唐生智要提高警惕，陈独秀不仅拒不采纳这个意见，反而指责他们是受了蒋介石的影响，意在“扶蒋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关于北伐军东下问题，提出，“为免除北伐军内部的地盘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提出，“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

同日，中共中央给在冯玉祥国民军中工作的刘伯坚写信，指示他“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同日，北伐军占领南昌，蒋介石在此设立了总司令部，并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迁往南昌，以便控制在自己手中。

11月14日 孙传芳主力被打垮。上海成立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并发表通电，表示中立。

11月15日 在《向导》第178期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东方》一文，分析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指出，帝国主义者对待十月革命，“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在中国，军阀及其走狗则“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8篇。

在《研究系运不亨通》、《研究系是只白虎》二文中，对研究系进行了揭露，他们先后投靠满清、袁世凯、段祺瑞、曹吴、孙传芳，结果都被打倒了，真是运不亨通。有人说它是只白虎，“谁沾染他，谁就晦气”。

在《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二文中，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揭露。

在《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一文中，指出，现在搞苏浙皖三省自治，实际上是孙传芳失败后，为他“保江山的运动”。

此外，还有《军阀讳败之词令》、《和平代表自身的和平问题》、《为什么不要求赤俄撤退驻华海陆军？》等篇。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对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和民众运动问题，作了指示。提出，“我们要保护北伐已得的胜利，为要巩固党及政府的基础，须集合所有力量去从事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并警告国民政府注意此事，

要能如此才可以保证已得的胜利，且作未来发展之准备。”

11月22日—12月16日 共产国际召开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邵力子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问题，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决议正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注意帝国主义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指出：“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他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决议还强调了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毅然攫住这个问题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决议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

决议的缺点是过高的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过低的估计了共产党的作用。如决议提出，共产党人要“巩固左派，与之密切合作，共产党人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整理党务案”。

11月25日 在《向导》第179期上发表了《革命与武力》一文。正确地指出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

功。”但他又说，现时中国“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而只能是“武力与民众合作的时代”。他说：“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他甚至说：“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即使“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也可以“造成统一的中国”。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八篇。

在《到底是谁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己有？》一文中揭露，张宗昌等军阀早在京津和山东等地实行了“共产共妻”。

在《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一文中揭露，江苏省的苏民自治协进会打着自治招牌，却发表通电，要求孙传芳保境安民。

在《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三文中，批判了国家主义派，他们称吴佩孚的军队是爱国军队，五色旗是国旗，骂三民主义是“残民主义”，反对国民政府及其青天白日旗，并造谣说，这种国旗是共产党制定的。

此外，还有《英国律师口中之帝国主义》、《花姑娘大老板与反赤运动》、《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三篇。

11月下旬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举行了天津会议，力求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合力南伐。会议达成以下协议，由奉军(张作霖)直鲁军(张宗昌)和孙传芳系直军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任副司令。张宗昌退出

河北地盘给张作霖，由张学良率领奉军由河北进兵河南，帮助吴佩孚进攻武汉；张宗昌率直鲁军进兵东南援助孙传芳，孙让出苏、浙两省长江以北地区给张宗昌；孙传芳由浙江进攻革命军。这次会议使军阀势力在表面上统一了。

11月30日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共讲了八个问题，他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又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但斯大林当时说的革命武装是指国民党的军队国民革命军。

1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共产党员王怀心、涂振农、师古隆等人担任了永修、九江等县县长，中央却批评这是“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并限令他们“必须急速纠正”，要“限期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

同时，又质问江西党组织，为什么让李富春、林祖涵、朱克靖等人参加省政治委员会。江西党组织说明，这些人参加乃因他们都是各军政治部主任，并非我党决定。江西又正处混乱时期，稍一退让右派可能乘虚而入。这样中央才勉强同意暂不退出，但仍提出“以后必须换人”，“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

12月5日 在《向导》第180期上发表了《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一文。指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及奉鲁军入境，实际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地盘，以便

他们得以参加政权”。

文章还指出，“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军事行动，……二是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三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关于农民暴动，他说：“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短文六篇。

在《中国人都赤化了吗？》一文中揭露，英国人说顾维钧也赤化了。

在《国家主义者有了帮助了！》、《怪哉没有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社会！》二文中，主要揭露了国家主义派。

在《江苏人快要受反赤运动之赐！》一文中揭露，张宗昌占领江苏后，发行军用票一千万，盘剥人民。

此外，还有《向直鲁军乞援的是孙传芳还是董康呢？》《张作霖讨赤不彻底！》等篇。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认为只有汪精卫回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强健有力”。

对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出：“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政府，在这样政权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是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

应取策略》的指示。当时，唐生智为了取得我党和苏联的帮助，曾请我党湖北省委书记彭泽湘去担任政治部主任，并表示可以“在他军中进行秘密组织”。中央在指示中表示，彭只能任顾问，“不就其他实权官职”。又说：“在唐军中我们不做秘密工作，…只助唐做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

12月上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等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指出：“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因此，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极其危险”的。决议重申“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

12月12日—18日 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瞿秋白等出席。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以我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报告》。他认为我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主要是反左。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左稚病”的六种表现：（一）“看不起国民党”；（二）“包办国民党”；（三）“包办民众运动”；（四）“否认左派存在”；（五）“误解党的独立”；（六）“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他批评有些人“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

在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议决案》中也说：“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

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为了反对党内的左稚病，陈独秀还提出把革命的军权、政权、党权、甚至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他还提出要从“上中下三层”帮助国民党左派，使“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这次会议还极力贬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并要限制工人的罢工斗争等等。总之，这次会议使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更加系统化了，在中央领导机关已占据了统治地位。

12月 中央特别会议之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了中国。党中央专门进行了讨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的文件，检讨和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又指出，若我们“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

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新送国民革命。”

文件还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12月13日 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委员会(后称“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徐谦当选为联席会议主席。

12月20日 蒋介石致电武汉，表示支持临时联席会议。

12月底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有人提议把中央机关迁往武汉，但陈独秀和多数委员认为，武汉局势仍然不稳，不同意立即迁往武汉。

1927年 48岁

1月1日 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并请汪精卫回国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1月3日 英国水兵在武汉刺死我海员一人，打伤群众数十人，制造了“一三惨案”。5日，武汉40万群众举行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占领了英国租界。

1月6日 英国水兵又在九江打死打伤群众数人，愤怒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占领了九江英租界。

1月上旬 蒋介石去武汉，协商有争议的问题，受到鲍罗廷的批评，停留一周后即返回南昌。

1月11日 在《向导》第182期上发表了《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一文。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

(二) 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三) 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四) 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他还号召人民用实际行动支援国民政府,不要以为各国承认国民政府,北方的军阀政府就会垮台。

1月17日 在《向导》第183期上发表了《谁杀了谁?》一文。揭露了英国水兵在武汉和九江的暴行,提出:“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对英反抗,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男女老幼一律不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海关不止!”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张学良不怕赤化吗?》一文中揭露,张学良用俄国战术训练骑兵,不怕赤化。

在《张宗昌八字韵语的宣传》一文中揭露,张宗昌誓师时提出八字韵语:“见饭就吃,见×就×”,真是实行了共产共妻!

在《好忠厚老实可怜的英国人!》一文中揭露,英国政府竟称赞在武汉和九江杀人的水兵是“勇士”。

在《张天师破产了!》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查封了封建迷信团体“同善社”,在江西查抄了张天师的财产,张天师破产了。

此外,还有《极端分子之志》、《上海英租界不干涉任何政党吗?》、《好狗政府》等篇。

1月21日 在《向导》第184期上发表了《列宁逝世三周年

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一文。指出：列宁早就说过“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今天一定会欢呼“革命的中国”。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他说：“负有中国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的一个至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希望每个国民党同志，都要谨守中山先生的遗训，继续中山先生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切勿效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结合一切黑暗反动势力，使中国仍旧是不革命的中国，落后的中国！”

1月27日 在《向导》第185期上发表了《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一文。揭露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侵略政策，他说：“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比硬的进攻更加厉害。……我们希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党员群众，现时仍须十分警戒，庶几使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软的进攻仍归失败。”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谁践踏了谁？——斥麦克唐纳尔》一文。批判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麦克唐纳尔对汉口“一三”屠杀事件的辩解，称他是“大工贼”、“工人阶级的叛徒”。同时指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党人，

都应该懂得反对阶级争斗、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应该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争斗与民族争斗、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了；应该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国际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了！”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九篇

在《呜呼稳健分子！》一文中揭露，英国人也说国民党中有稳健分子，是他们的朋友。

在《国民党的敌人是谁？》一文中，明确指出，有些国民党人“大概以为他们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劣绅，而是中国共产党”。

在《去年今日的汉口与广州》一文中指出，“去年今日的汉口，正在压迫工农运动，禁止民众对英示威；去年今日的广州，正在扶助工农运动，号召民众对英示威。今年的汉口与广州，恰恰相反，怎不令人有今昔之感！”

在《张宗昌的三不知》一文中揭露，张宗昌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小老婆有多少。

在《放屁狗的〈甲寅〉》一文中，讥讽《甲寅》杂志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

在《妙哉圣道会！》一文中揭露，圣道会原来不是迷信团体，而是奉军的宣传机关。

此外，还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傅筱庵》、《大学生眼中的农民》、《优伶也赤化了吗？》等篇。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的向

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

1月31日 在《向导》第186期上发表了《革命与民众》一文。指出，发动群众“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他认为发动民众要做到三条：“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

他还指出：“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四篇。

在《无耻的九省联合会》一文中揭露，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解散后，又出现了一个九省联合会，其目的是，“促讨赤首领迅速出兵，收复被寇各省”。

在《稳健之孙文主义！》一文中揭露，奉天军阀提出，要软化国民党稳健派。

在《英国雇佣的奸细国民外交协会》一文中揭露，该会不反对英国派兵来华，却抗议苏俄在边境增兵。这是受英人

指使，转移国人视线。

此外，还有《反革命者的国旗》一篇。

1月 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陈独秀和在上海的维金斯基等人主张联蒋，鲍罗廷和在武汉的同志主张反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陈独秀派汪寿华去武汉了解情况，进行磋商。

2月7日 在《向导》第187期上发表了《“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一文。赞扬了铁路工人的斗争。他说：“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他提出，铁路工人“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三）肃清交通系。”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一文。他说：“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3篇。

在《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曾琦与麦克唐纳尔》、《国家主义者眼中的国家和政府之分》、《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究竟是谁无祖国？》、《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六文中，都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英国对华出兵，遭到英国工人的反对，只有工贼领袖麦克唐纳尔说英国工人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曾琦跟着说中国青年都是反动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外国人完全管理了中国政府，也不过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国家本身的问题。”他们只会缩进龟头，说些

令人肉麻的话。

在《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一文中，驳斥了国家主义派的攻击。他说：“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用他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

在《好高明的稳健派！》一文中揭露，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宣称：“内部的民众过激和共派活动，到是我们的切身之患，非压服下去不可。”

此外，还有《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谁对谁的宽大政策？》、《北洋军阀“安”的成绩！》、《英国不是帝国主义？》等篇。

2月9日 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武汉召开高级干部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五人行动委员会（徐谦、吴玉章、孙科、邓演达、顾孟余），并发表宣言，重申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同时决定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

2月16日 在《向导》第188期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一文。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的关系，批判了国家主义派，他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因要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于任何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形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又说：“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已经分明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那边，……他们已经是反革命者，我们用不着对反革命者谈什么革

命的理论！”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张作霖宣言之解剖》一文。指出，张作霖发布了十条政纲，主要有二条：“一是发展民治，一是剿灭过激主义”。事实上，张作霖不但想消灭共产党，还想消灭国民党，甚至也想消灭吴佩孚。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一文中，批判了南北妥协的谬论。指出：“北方军阀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经纪，是代表封建势力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名为一致对外，实为一致降外，军阀是永远不会和革命党合作一致对外的。”

在《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一文中揭露，奉军杨宇霆宣称：“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我们且看蒋介石怎样在行动上回答杨宇霆这个提议！”

在《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一文中揭露，反青天白日旗的国家主义派分子曾显浩竟然当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真是稀奇！

在《中英人之见解不同如此！》一文中指出，英国有人提出应该交还中国租界，而中国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分子却认为“汉口罢工及反英运动都是共产党破坏大局”。

在《日本的如意算盘》一文中揭露，日本主张南北妥协，是想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

此外，还有《曾琦与何海鸣》、《何海鸣将到广东江西汉口宣讲反赤！》、《中立呢还是共管？》等篇。

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问题。

同一天，共产国际派罗易等人到达广州，帮助鲍罗廷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并准备在广州召开太平洋劳动代表会议。因广州政府已迁往武汉，4月初罗易等人也去武汉。

2月19日 英国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浔案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两地的租界交还中国。

2月20日 北伐军占领嘉兴等地，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至24日失败。

2月21日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讲演，胡说：“共产党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并造谣说中央的命令、决议，都是垮党分子提出来的。

2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指出，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始终已表现出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势力，伟大的团结力量，已经使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发抖而手忙脚乱，已经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威权，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

同一天，武汉召开了国民党党员大会，指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这样，以武汉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对新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为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指出：“此次上海的总罢工，在中国革命上是有重

大意义的。”“全上海市民们！工人是革命的市民中最急进的先锋，你们须继续与这最急进的先锋携着手前进。”

2月28日 在《向导》第189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十篇。

在《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一文中揭露，奉军杨宇霆宣称：“将来南方如有悔祸之意，能对于赤化分子驱除，奉方亦不愿过为已甚。”看来，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

在《不受抬举的唐生智！》一文中揭露，张作霖提议，北方由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南方由蒋介石、唐生智、谭延闿、李济深、冯玉祥等组织一个委员会，总揽全国政务。唐生智首先起来反对。

在《果然是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吗？》、《国家主义派又为张雨帅所赏识了！》、《外看强权内储国贼》三文中，揭露和批判国家主义派，他们不相信各国工人阶级会支援中国革命，认为这是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他们主张把外抗强权改为外看强权，把内除国贼改为内储国贼。

在《三民主义信徒的双包案》一文中揭露，戴季陶大喊大叫他是“真正的民党”、“三民主义信徒”，西山会议派却骂他是鲍罗廷的走狗。他们实际上是演“双包案”。

此外，还有《共产党造谣惑众！》、《宣讲呢，还是拍影戏？》、《戴天仇其奈日本人的一定范畴何！》、《中国人能忘“五七”“五九”吗？》等篇。

2月 瞿秋白写了长达四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原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从理论上有力地批

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提出，党已有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但没有点陈独秀的名。

3月6日 在《向导》第190期上发表了《我们目前的奋斗》一文，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渐高涨起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奉系军阀“一面出兵讨赤，一面……向国民党右派吊膀子，企图软化右派，使右派帮他们讨赤，以达其对南各个击破之计”。在此形势下，“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他最后指出：“奋斗胜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合力坚持，而不为右倾分子的妥协政策所动摇、所恐吓！”

在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一文。他说：“我们反对非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同时也反对不愿革命原则的党内和平。”“为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计，为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计，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佬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11篇。

在《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一文中揭露，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访问上海资本家虞和德，提出共同反共，虞表示不赞成。

在《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内，从前号称左派分子，现在居然接受了西山会议派的理论，反

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人要有多少？”

在《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一文中揭露，张静江原是倒卖假古董的投机商人，一跃而为国民党主席，民党干部却说他是蒋介石的左右。

在《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一文中揭露，亲日派赵欣伯说，蒋、张二人“政见相同之处甚多”。陈独秀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无所谓与北方合作！”

在《呜呼美国博士！》一文中揭露，美国博士程天放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谓帝国主义。”

此外，还有《党皇帝》、《反革命当然攻击革命》、《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可为曾琦辈浮一大白！》、《苏俄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工友为什么只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等篇。

同一天，陈独秀和罗亦农在上海环龙路26号，晤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吴说：“研究共产学说……当在二百年之后。”对此，陈独秀给与了驳斥。

同一天，蒋介石指使倪弼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等人，制造了赣州惨案。

3月7日 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招收学员800多人。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昌总部讲演，攻击苏俄和国际代表，又说武汉的国民党“造谣煽惑”，在“后方捣乱”。对南北妥协

的舆论却不表态。

3月8日 陈独秀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观》一文。

3月10—17日 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挫败了蒋介石控制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会议决定在政府中设立劳工部和农民部，由共产党员苏兆征和谭平山任部长，这在实际上否定了“整理党务案”。

3月12日 在《向导》第191期上发表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一文。指出，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稳健派，自命为不左不右的革命领袖，竟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他最后提出：“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津汉情形的确不同》一文中揭露，北京政府要求英国同汉口一样，归还天津租界，英国人说两地情形不一样，予以拒绝。

在《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张作霖吴佩孚的提议吗？》一文中揭露，张作霖宣布：“党军苟驱逐左派，予将抒诚与图统一。”

在《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是谁？》一文中揭露，日本曾报道：“蒋氏北伐之动机及思想的倾向观之，氏与共产党不相

容，殆无疑义。”

在《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一文中揭露，亲日的《顺天时报》载：“蒋介石……现已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请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尚不能宣布”。

此外，还有《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军阀为什么怕纠葛?》《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我即党与朕即国家》等篇。

在这一期的读者之声栏中，还发表了答读者来信两篇。

在《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一文中，指出：“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

在《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一文中，指出：“现在是‘以党治军’，还是‘以军治党’？现在是‘力助工人农民’，还是‘力助商人压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团摧残农民’？”研究北伐问题，要注意到这些事实。

3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要求对南北妥协等流言表态，并质问关于蒋介石要纠正、制裁共产党的讲话，是个人行与，还是多数人的意见。要求回答，在国共联合战线中，究竟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

3月17日 蒋介石指使青红帮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九江市党部和共产党领导的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打死四人，打伤九人，制造了九江惨案。

3月18日 在《向导》第192期上发表了《评蒋介石3月7日

之演讲》一文。明确指出蒋介石“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这同西山会议派的论调是相同的。他提出：“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毕庶澄和西山会议派就这样纪念中山！》、《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同样的纪念中山！》、《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三文中，主要是揭露和批判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环龙路总部竟然开枪打伤游行纪念中山先生的群众三人。他们的《江南晚报》是由日本人出钱办的，经理和编辑也是日本人。

在《帝国主义者眼中之蒋介石》一文中揭露，据路透社报道：“蒋介石为保守分子所公认之领袖。”

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与工农群众的力量，正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最有力的武器，抛弃这些武器的人便是不愿意革命，他迟早总要跑到反革命那边去。”

此外，还有《曾琦与薛大可》、《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想推翻国民党的是谁？》《戴天仇愿意出卖工人吗？》等篇。

在这一期的通信栏中，还发表了《答蒋希曾——讨论救党运动》一文。他说：“‘救党运动’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过从事此运动须认清事实，要将党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状态

况中救出，不可将党从日渐革命化的状况中救回老家！”

3月中旬 陈独秀写信给江浙区委，提出要缓和与蒋介石和张静江的斗争，对蒋介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答应。

3月21日 北伐军占领龙华。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地占领了全上海。领导这次起义的是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同一天，在江浙区委主席团会议上，陈独秀提出，要多与蒋介石接洽，“以缓和冲突”。不久，他又提出，可以把工人纠察队的干部和队员派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工作，“以淘汰复杂分子”。

3月23日 上海召开十万市民大会，陈独秀出席并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的英雄壮举。

同一天，陈独秀致函吴稚晖，提出：“在中国革命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共产党决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他又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勿为右派浮言所动”。

同一天，蒋介石收买安庆的地痞流氓，捣毁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及总工会、省农会，打伤多人，制造了安庆惨案。

3月24日 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3月27日 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呼吁书》。

3月28日 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写了两篇重要文告：《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指出：“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3月29日 斯大林发表了《论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的演说，认为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是想在心脏地带打击中国革命”，结果却使“帝国主义以其赤裸裸的公开的强盗和压迫者身分站在全世界面前”，“他们目前只达到了一点：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了国民党的力量，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向左移动。”

3月31日 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造了重庆惨案，当场打死打伤群众500多人。

3月底 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汉口旧俄租界。瞿秋白等人随中央机关至汉口。

4月1日 汪精卫从巴黎回到上海，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斯大林表示对他完全支持。

4月2日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开始进行秘密会谈，最后达成四条反革命协议：

(一)同意由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但要汪负责通知陈独秀，下令在国民党统治地

区的共产党员在召开四中全会前停止一切活动；

(二)国民党中央迁武汉后发布的一切命令无效；

(三)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各军队、党部和民众团体负责人，如认为内部有阴谋捣乱者，可自行加以纠正和制裁。

(四)工人纠察队及其它武装组织应归总司令指挥，否则认为反革命行为，严行取缔。

4月3日 吴玉章、瞿秋白等人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去，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和监视蒋介石的行动，这一主张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原计划3日做好准备，4日出发。

4月4日 第四军调动前，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此事，鲍罗廷等人反对将四军调往南京，理由有二：第一，认为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第二，认为汪精卫已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我们和蒋介石闹翻，他可能扣留汪，不让他来武汉。多数人同意了鲍的意见，四军东调计划未能实现。

4月5日 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在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经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却说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又说：“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这个宣言麻痹了我们党和无产阶级，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起了烟幕弹作用。

4月6日 在《向导》第193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一文中揭露，英帝国主义过去视蒋介石若洪水猛兽，现在却说：“要多侍他的态度和势力。”

在《稳健派原来如此!》一文中揭露，路透社提出“所谓稳健派，原来就是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意!”

在《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一文中揭露，张作霖提出“本人始终反对共产，南军苟驱俄人，南北不难妥协”。张又说：“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之俄人，表示诚意，余决不峻拒。”

此外，还有《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徐朗西做人难》等三篇。

在这一期的读者之声栏中，还发表了《答沈滨析、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一文。他说：“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又说：“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

同一天，在张作霖指使下，北京军警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六十余人。

4月上旬 陈独秀和汪精卫等人都到了武汉。陈独秀到武汉后还打电报给江浙区委，反对他们提出的打倒蒋介石的主张。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充分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4月13—15日 在武汉召开了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罗易和鲍罗廷在会上发生了争论。罗易做了题为《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的报告，他反对立即进行北伐，主张应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地区，使革命深入，然后再北伐。他认为即使北伐胜利了，也只是加强了军阀的地位。鲍罗廷主张应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进攻北京。

4月15日 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共产党人董必武以湖北省党部的名义，要求中央委员明白表示对蒋介石的态度。其他共产党人和邓演达等也纷纷发表意见，主张讨伐蒋介石。会议决定了对蒋介石的免职令。

同一天，李济深、钱大钧等人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和杀害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000多人。

4月中旬 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致电党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师，东征讨蒋。

4月16日 根据罗易的意见，中共中央做了一个《关于继续北伐问题决议》，不主张立即进行北伐。决议说：“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但因意见分歧，两天后，又撤销了这个决议。同意了国民党继续北伐的主张。

4月1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蒋介石

的党籍，“并逮捕惩罚”。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

4月18日 武汉国民政府颁布了东征讨蒋的命令，由张发奎率四军、十一军东征蒋介石，并在武昌体育馆举行了誓师大会，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声讨蒋介石叛变的宣传大纲，各部队也领到了战时三色识别带，分配了轮船，准备了给养。后因意见分歧，各部队又返回原地待命，东征讨蒋也烟消云散了。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胡汉民当选为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北伐军和中国人民承认并支持它，以推翻武汉政府。

4月19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通缉陈独秀、鲍罗廷等197名共产党首要分子。从此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同一天，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继续出兵北伐。

4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中国共产党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同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代表国民党内外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

4月22日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

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指出：“现在蒋介石已经是民族的叛徒了，惩罚他必须和惩罚叛徒们一样的利害。”又说：“这并不是个人或某几个人叛党，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并且转过来反对国民革命。”

4月中旬 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由邓演达、徐谦、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等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4月26日 土地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应邀出席并对土地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

（二）公布佃农保护法。

（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予土地。

（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

以上是原则。

（五）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之实现。

（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

（七）各省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

以上是进行方法。”

4月27日—5月9日 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多人。陈独秀代表中央做了《政治

与组织的报告》，国际代表罗易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会议主要是总结党的“四大”以来的工作，决定党的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就革命领导权等问题，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陈表示接受。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多项。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以挽救革命的建议，但在陈独秀阻挠下，建议未能提交大会讨论。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等2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担任总书记，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职前由蔡和森代。

4月28日 李大钊等20余人在北京遇害。

4月29日 共产国际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就张作霖袭击北京苏联使馆后公布的文件发表的声明》。

4月 吴玉章等人曾打算把共产党员连×领导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军械、粮饷都已经筹划好了。陈独秀到武汉后，怕引起别人妒忌，又怕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因而反对，结果没有建立起来。

5月1日 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死的抗议书》。同一天，苏联大使馆自动封闭，不久，使馆人员也撤离北京回国。

5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指出：“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又说：“共

产党加入国民党同他合作，强健左派，帮助他领导革命，可是同时不要失掉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行动的政治独立性质。”

同一天，斯大林与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提出：“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这是错误。……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又说蒋介石“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倒台，分享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命运。”

同一天，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公开叛变，随即占领嘉鱼、汀泗桥等地，直至距武昌40里的纸坊。

5月17日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挺为讨伐夏斗寅前敌总指挥，很快击退了夏的进攻。

5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指出，夏斗寅妄图联合城乡各种中等阶级于反革命旗帜之下，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因此重申了我党对中等阶级的政策，表示：“无产阶级决不能一面和中等阶级互相同盟，又一面破坏这个同盟军。”

对于湖南农民运动，表示“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认为这是未能真正实行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造成的。

5月18—30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

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又说：“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

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中央发来两次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

关于武装问题，建议中国党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强调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关于对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的政策，首先要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及中央机关，在里面贯彻正确政策，使之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机关。并强调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农群众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等。

5月19日 武汉国民党中监委发出训令，严禁武汉工人纠察队继续活动。

5月21日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

5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主张避免纠纷，争取和平解决湖南长沙事变问

题。决议说：“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

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派谭平山等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冲突事。委员会对湖南问题提出五点意见：“（一）改组湖南省政府；（二）改组湖南省党部及农协、工会；（三）制裁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四）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五）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

谭平山等五人到岳阳后，因许克祥佯言对代表施以武力，故返回武汉。

5月26日 陈独秀通过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说：“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

6月1日 中共中共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对“马日事变”仍主张和平解决。同时提出：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农民革命。

同一天，国际代表罗易同汪精卫谈话，汪要求看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向汪讨好，罗易晚上派人给汪送去文件副本。汪精卫以此为借口，积极准备反共，罗易这一行动，遭到中共中央全体成员的反对。

同一天，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会师。

6月4日 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发表了《中国

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又说：“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提出“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同时提出，农民在斗争中“应当与小地主结成同盟，共同参加反抗大地主与豪绅的争斗。因为要巩固同盟军，对于小地主无论如何是不能加以扰害的。革命军人正在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战，也是农民的友军。对于他们的土地也不能没收，对于他们的家属更不能波及。”“禁止这些幼稚行动，是农民协会的重大责任！”

6月5日 朱培德在江西实行“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6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指出，“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

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又说：“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的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实行改选。”最后指出：“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

同一天，汪精卫、徐谦等人离开武汉去郑州，出席冯玉祥召开的郑州会议。此时冯玉祥的反共态度已较明朗。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国民军占领郑州后的形势。陈独秀提出时局已到危急关头，冯玉祥所谓的共同北伐之日，就是共同解决中共之时，因此，他在会上提出再次东征的主张。

6月10日 冯玉祥主持召开了郑州会议，表面上是研究同武汉、南京共同北伐的问题，实际上想借此促成“汪蒋合作”。会议决定成立开封政治委员会；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撤回武汉。

6月中旬 郑州会议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一个乐观的报告，他认为唐生智和张发奎的部队撤回武汉，共同北伐的计划已经打破，共同解决中共的危机已经延缓。

6月11日 在《向导》第198期上发表了《蒋介石反动与中

国革命》一文。指出：“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因此，“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政策。”又说：“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6月13日 汪精卫等人回到武汉。

6月14日 陈独秀通过党中央宣传部发表通告和宣传大纲，提出：“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6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并为会议通过。

他在电报中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才引起了军人的反感。他说：“夏斗寅的叛变和长沙的武装政变就是这种全面反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共产党也必须实行让步的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动，缓和没收土地政策的进行。……不这样做，将会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直接冲突，并同国民党发生分裂，而且我们还可能沦为反对党。”电报还说：“同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吸收这些左派领袖，找出一个共同的政纲。假如同他们分裂，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军队是困难的，而且是

不可能的。”

对于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他表示：“贵方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

同一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6月4日的公开信作出答覆。表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便无从解决，农民问题不能解决，革命便不算成功”。对湖南事变，提出两项解决的原则：“（一）对武人越轨行动，必须制裁；（二）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纠正。”

6月16日 蒋介石和李鸣钟等人去徐州，准备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徐州会议。

6月1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免除鲍罗廷等苏联顾问职务的决定。

6月中旬 蔡和森和陈独秀、李立三等人商议，决定努力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实行土地革命。接着，召开了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四人参加的常委会，决定发出一个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给上海。

6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上海的指示信，指出：“中国革命主要特征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一方面反帝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

信中还指出：“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到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420人。大会总结了北伐以来的工会工作，讨论了蒋介石叛变问题，驳斥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谬论，强调了组织工农武装的重要性。

6月20日 在《向导》第199期上发表了《湖南政变与讨蒋》一文。他说：“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又说：“湖南政变中所表现的事实，分明不是什么纠正工农的幼稚行动，分明不是什么救党运动（岂有离开最高党部，并且要枪决中央委员的救党运动？），而分明是和蒋介石、夏斗寅一气的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这四大政策的运动。”

同一天，冯玉祥召开徐州会议，冯玉祥、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徐谦、李宗仁、白崇禧、顾孟余等人参加。会

后，冯玉祥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通电。

6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上海区委的信》。提出：“上海必须在一个月內准备强大的反帝运动。工商学宣布总罢工，示威游行要进入外国人的地区。这次运动必须比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又说：“我们不应害怕帝国主义征服和干涉蒋介石的地区，帝国主义全部占领上海、福州、南京等地比蒋介石或李济深占领更为有利。因为，如果是帝国主义占领，我们就可以发动一场新的反帝战争。这场战争将直接导致武装工农和没收土地的必要性。在这个高潮中，国内反动派不敢抬头，分裂的趋势可以避免。……这是最正确和最必要的策略。”

同一天，在中共中央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要求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公布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陈独秀不但压制了任弼时的发言，还把意见书撕碎扔在地上，表现了严重的家长作风。

6月24日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提出，我们现在的策略“应是防御斗争”。

6月25日 蔡和森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现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讨论此信时，陈独秀态度犹豫，认为搬到武昌后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当时决定迁往武昌，因有人反对，又迁回汉口。

6月27日 中共中央军事部晚上接到紧急报告，说何健

准备在汉口叛乱。

6月28日 清晨，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及鲍罗廷等，研究武汉的形势，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鲍罗廷等人的提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的军队。

6月29日 汉口《民国日报》登载了“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的布告。

同日，罗易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致上海区委的信》提出了批评。他说：“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要使反帝斗争成为革命的基础。这个建议的想法是违反现实的。”“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清王朝的绝对主义的策略。”“这是一个难于理解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策略，共产党绝不能接受这样的策略。”根据罗易的意见，政治局决定由张国焘另起草一个通告，纠正这一错误。

同日 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延年曾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后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广东区委书记、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同日，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发出反共训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胡说我党“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以会场为刑场”，以杀人为儿戏”，“阳奉三民主义，暗行屠杀掠夺之实”。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6月30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两党关

系决议案》，共十一条，主要内容是：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共员参加政府，“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政府公布之法令”，“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工人纠察队“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这一决议，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大成。

6月底 陈独秀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各军政治部负责人，要政治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听从国民党军事长官的命令，“切忌”在军队里宣传阶级斗争，“切忌”引起军事长官的恶感。

6月底 毛泽东召集被迫转移来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鼓励大家回到原来的地区，恢复工作，发动群众，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用武装保卫革命，坚决同敌人斗争。

7月1日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武汉工人大罢工，认为这是开罪于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当时，汪精卫已向陈独秀当面表示了对罢工的不满。

7月3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再次提议，停止土地革命，党员集中力量在通商口岸活动，挑起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斗争，以便使统一战线重新建立。这个建议遭到罗易的反对，未被通过。会后，罗易即离开武汉返回莫斯科。

7月4日 中共中央继续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

出：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以应征加入。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队势力的基础”。

7月8日 在《向导》第200期上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一文。指出，蒋介石之流所谓的“救党清党运动”，只不过是為了讨好帝国主义。“国民党现时之真正危机，不是右派所谓共产党之阴谋破坏，而反是右派之自身”。“所以欲救国民党之危机，决不是清除党内革命分子，而是要清除党内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不然将名存而实亡。”“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他又说：“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

在这一期的寸铁栏中，还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可怜的山西各界代表！》、《阎锡山的国民党……的国民党？》、《张胡子真笨！》、《山西省议会移交烟具》四文中，主要是揭露阎锡山，他假借山西各界代表坚请的招牌，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他刚入党就开始进行清党。

在《急求南北妥协的是北张还是南蒋？》一文中揭露，阎

锡山电称，蒋介石曾请他与张作霖之间斡旋，并证实蒋介石确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求和。

在《纯正三民主义信徒的奉宁晋联盟》一文中指出、张作霖、蒋介石、阎锡山三方合作，决非困难之事。

此外，还有《请加入张作霖的党去罢！》、《究竟什么是真正工农？》等篇。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领导工作。

7月13日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明确宣布共产党要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据此，苏兆征、谭平山发表了辞职书。

同日，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辞职，从此，他就深藏不出，不再理事。

7月15日 武汉汪精卫集团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即“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同日，汪精卫又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作了反共报告。从此，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六、从取消派到托派

(1927.7—1932.10)

1927年 48岁

7月18日 《向导》出版第201期(最后一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提出了八个问题:(一)反帝国主义;(二)经济;(三)政治;(四)工人;(五)农民;(六)军人;(七)教育;(八)妇女。表示“中国共产党提出此草案,愿与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共同商榷而实行之”。

7月19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共”。

7月中旬 “七一五”事件后,鲍罗廷以健康不佳为借口,偕瞿秋白到庐山,研究当时的形势及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问题。

7月中旬 汪精卫叛变后,武汉充满了白色恐怖。陈独秀化装成苦力模样,同秘书黄文容等隐藏在武昌,住在党开设的一家纸行的楼上。

7月23日 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了“制裁共产党的办法:(一)本党在籍的共产党员,即日脱离各党部、军政部及国民革命军;(二)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前,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党活动之共产活动;(三)党员中无中央

之命令，不得随意加入他党”。

同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到达武汉。在此之前，国际已给中国党发来“训令”，指出中国党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加以揭发，同时改组中央。罗明纳兹来后，要求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因来不及通知，后改在8月7日召开。

7月24日 汪精卫致电冯玉祥，表示：（一）共产党及鲍罗廷已加处置；（二）可依6月间议案迁都南京；（三）对蒋介石个人无私怨。

7月2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为其反革命罪行辩解。

7月下旬 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及工作人员140多人，陆续离开武汉回国。

7月底 陈独秀给中共临时中央局写信，提出三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党中央没有接受他的这些建议。

8月1日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8月7日 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者2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议谴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在全党公开这些错误，要求全党同志从中吸取教训。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政治局常委。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告诉他关于八七会议的内容。

8月13日 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旋去日本。

8月25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正式迁往南京。

9月9日 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9月10日 陈独秀由黄文容、汪原放等三人伴送乘英国船“公和”号去上海。他带上风帽，装成病人，躲在船舱内。船至九江，正值中秋，半夜时出来赏月。他说：“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表示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

陈独秀到上海后，先住在酱园弄彭礼合家中，后搬到浙江北路一个小弄堂里。

10月24日 中共中央新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创刊。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在该刊前19期的寸铁栏中，共发表了短文147篇。

在第1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一文中揭露说：“国民党分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

在《滑稽的禁令》一文中揭露，各省的财政本来都在军阀之手，国民政府却下令“各军长官，严禁干涉民政财政，可谓滑稽之至！”

在《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一文中揭露，在帝国主义眼中，蒋介石由赤军首领变成了基督将军，不知再变成什么东西。

此外，还有《不进则退》、《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马

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阎锡山冯玉祥仍然是赤?》、《张作霖的共和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等五篇。

10月3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2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十四篇。

在《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一文中揭露,由于蒋介石疯狂镇压革命,各帝国主义开始减少驻华军队,“不须御驾亲征了”。

在《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张作霖的遗嘱》三文中,揭露了国民党的对外政策,他们开始打着反帝的旗子,现在却提出要恢复中外旧时的友谊。何应钦对英国记者说:“今后吾人必须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并表示可以用讨论的方法解决纠纷。张作霖曾讲,收回主权只宜和平交涉。何应钦好像听了张作霖的遗嘱,忘了孙中山的遗嘱。

在《国民党清党的效果》一文中揭露,据军会迎汪通电话:“自清党后,昏庸投机分子操持政局,滥捕党员,压迫民众。”真是不打自招。

在《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二文中,揭露吴稚晖,他怂恿蒋介石杀人,汪精卫说:“所谓无政府党,也许本来就是这样。”

在《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一文中,指出:“汪精卫曾历数国民党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冯自由,第二代是陈廉伯,第三代是杨希闵,第四代是蒋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谁?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己!”

在《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一文中,批判了张继所谓

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观点，指出：“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暴！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内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则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

在《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一文中揭露，这是刘湘、王陵基在重庆街头贴出的大标语。

在《杀尽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揭露，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最近发出的口号的第一条。

此外，还有《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孙中山无常识处》、《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等篇。

11月7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3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黄埔失败第一个重大原因》、《军阀政客是哪些人？》二文中，主要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说：“如果我不辞职……将来最好的结果，亦不过做几个军阀的掌柜和政客的傀儡而已。”真是不打自招。

此外，还有《团结三民主义信徒之结果》一文。

11月8—10日 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由瞿秋白、张太雷主持，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这是自动主义错误的最高潮，并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11月12日 陈独秀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

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他主张用开展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关于农民问题，他建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代替“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11月14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4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二十篇。

在《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一文中揭露，吴稚晖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不用为“四一二”辩解，说什么“工人互斗”。

在《反共清党与收回租界》一文中揭露，白崇禧说：“若不是共产党捣乱，我们就早通告向外人收回租界了“哈哈！事实恰正相反，共产党捣乱时收回的汉口租界，反共清党以来，却要在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党忠实的党员手中失去了！”

在《为新军阀造机会》一文中揭露，孙科在讨伐唐生智的报告中说：“若不将此极大之障碍扫除，即北伐成功，亦不过为一般新军阀造机会，徒使国无宁岁，民不聊生而已！”其实他们和唐生智都是一路货色。

在《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去日本，表面上说是去向宋母求婚，实际上是向田中内阁求婚，“想求这位田中保镖”。

在《国民党仍难团结吗？》一文中揭露，戴季陶说，有共产党留在党内“则党员间共信不立，有碍党之团结”，清党之后，他又说：“愈欲团结，而团结愈难！”

在《双包案的清党运动》一文中揭露，国民党讨伐唐生智，说他是假清党。实际上，“真清党，假清党，国民党这种双包案的清党运动，实在闹得人们头昏脑晕，一世也弄不清楚！”

在《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在日本神户演说，“国民革命之大业，今已成功三分之二”。原来挂上青天白日旗就算胜利了。

在《以国民党党员为限》一文中揭露，财政部规定，任会计师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文章说：“最好由官厅令示通衢，凡行路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庶几全国四万万人很快的都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

此外，还有《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提高党权？》、《党治之下不谈法治了！》、《江南二老》、《反共清党后的忠实党员》、《枪决大批共犯》、《替代》、《汪精卫行为不当》、《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作壁上观的北伐》、《横逆变成了神圣》、《我真是害了你们了！》等篇。

11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决定把托洛茨基等75人开除出党，并决定将一批托洛茨基分子流放。

11月2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5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五篇。

在《国民党中的端庄刚毅》一文中揭露，何应钦说，“共产党不好，共产党的方法还是可效法的”，结果遭到胡汉民、邹鲁、张继等人的批判。

在《盛哉党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清党后，一切党化，上海海左书局大登“党化新小说”的广告。上海建新手帕厂，又有“党化手帕”出名，“将来恐怕还有党化妓院出现！”

在《辽皇帝与党皇帝》一文中揭露，张作霖想做皇帝，国号曰辽，年号曰“宏宥”。

在《党国》一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新鲜的，不可解的名词，“党国”看来就是“党的国”之意。

此外，还有《改组与纠正》一文。

11月 蒋介石由日本回国，经冯玉祥的调解，实现了蒋汪合作。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恢复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11月底 汪精卫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

12月5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7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19篇。

在《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一文中揭露，该会13个参事，是清一色的资本家。

在《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一文中指出，清党后有两个印象：一是帝国主义要求取消反帝口号，一是何应钦宣布“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

在《数典忘祖》一文中揭露，有些国民党人骂共产党主张“耕者有其田”，而忘记了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在《驳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郭先生和自己开玩笑》二文中，讥笑缪斌和郭任远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马克思学说太不革命了”，真是荒唐可笑。

在《移步换形的骗术》一文中揭露，蒋介石说：“我清除共党后仍要做左派反对右倾。”汪精卫和孙科在武汉也说，反共后仍要反帝和讨蒋。实际上，“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移步换形的

大骗术”。

在《同志之标准》一文中揭露，江苏省财政厅电各县长说，交钱多者，“引为同志”。

在《世界太左了！》一文中揭露，胡汉民说：“共产党是右派，国民党是中派，无政府党是左派。”张继说：“我比共产党还左。”如此说来，帝国主义更左，全世界太左了！

在《中国人的晦气！》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清党后，又给中国人加上了“党国”、“党治”、“党化”、“党外无党”这类怪东西的束缚。

在《汪精卫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一文中揭露，蒋介石曾骂汪精卫是伪君子。

此外，还有《圣诞》、《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吴稚晖的思想还不落后吗？》、《主义的流弊》、《沈恩孚的教育目标》、《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杀其人而用其法”》、《夸大狂》、《不同》等九篇。

12月9日 中共中央常委回信陈独秀，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和放弃武装暴动的意见，驳斥了他“夺取政权时机未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不能巩固的情况下，“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暴动。汇合、联合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政权”。回信同意他提出的农民运动“四不”的口号，但必须由“四不”发展为暴动。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了广州暴动，经过三昼夜激战后，撤出广州。

12月12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8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第五层序”的革命》一文中提出，李石曾认为苏俄革命是“第三层序”，蒋介石反共是“第四层序”，那么，张勋复辟就应算作“第五层序”的革命。

此外，还有《反共产的国民革命》、《下层轰动》二篇。

同日，陈独秀再次写信给党中央常委，认为“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否定。并要求中央宣布一个明确的政纲。

12月13日 陈独秀再次写信给党中央常委，表示他赞成广州暴动，并提出五点建议：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迁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

（二）不要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改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议政府”。

（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与之党外合作。

（四）广州离香港太近，反帝行动要谨慎。

（五）苏俄同志最好不要去广州参加暴动。

12月 党中央常委覆信陈独秀，这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对他提出的五点建议答覆如下：

（一）广州暴动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配合。

（二）广州暴动时已提出了“工农代表会”的口号，我们不要怕说“独裁”，“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这种解释，我们只有公开的对一切人宣传，无论如何避忌是无用的，也是不应该的”。

（三）召开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

(四) 同意。

(五) 已不是问题。

12月19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0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11篇。

在《共贼汪精卫》一文中揭露，汪精卫曾大喊：“杀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但在南京讨共大会所发的请愿书中却骂他是“共贼汪精卫”。

在《反共的共产国际》一文中揭露，有人胡说：“汪精卫在汉口反共是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

在《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对记者说，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

在《杀人的国民党》一文中揭露，当时报载，国民党在黄安杀人1500，在广州14日夜就杀了2000多人。这也许是各报受了共产党的金卢布，故意宣传国民党之惨杀！”

在《小人党》一文中揭露，吴稚晖骂汪精卫、胡汉民、徐谦、陈公博、顾孟余等都是小人，国民党岂不成了小人党。

此外，还有《少一个皇帝》、《我们发现了国奉之不同了》、《李宗仁骂自己》、《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讣告》、《之洞主义》、《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等篇。

12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政府对俄绝交宣言》。指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祖国，她是以发动世界被压迫剥削人类反对帝国主义及各地豪绅资产阶级为天职的。”又说：“中国全国的革命大暴动，目下正在酝酿待

发之中，广州的暴动绝对不是此大暴动之流产，而仅仅是此大暴动之一序幕。中国全国的革命大暴动，不久将像火山般爆发出来。”

12月26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1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究竟是谁惨杀?》二文中，介绍了日本东方社和上海《申报》报道广州杀人情况，广州已杀害5700多人，有女共党数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浇以火油焚烧，残忍至极。

在《共产党是抢劫的吗?》一文中指出，敌人造谣共产党到处抢劫，但在广州事变时中央银行的金库却很安全，这就粉碎了敌人的谣言。

在《反共先生的下场》一文中，指出“今后有枪的人处置异己的最简便方法，就是给他戴上红帽子”。

此外，还有《研究系称心了罢!》《叶开鑫与汪精卫》二篇。

12月 党中央决定要陈独秀去苏联学习，并找他多次谈话。他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他认为这是排挤他这个老头子，因此，拒绝前去。

12月 陈独秀编辑出版了《革命文学史》一书，在卷首他写了《献诗》，在卷尾写了《致读者》。

在《献诗》中他写道：“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

恢复固有的幸福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在《致读者》的诗中他写道：“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昏迷沉饮；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来自卫生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1928年 49岁

1月2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寸铁栏，发表了短文六篇。

在《舅子政府》一文中揭露，蒋介石的舅子宋子文是财政部长，何应钦的舅子王伯群是交通部长，国民政府可谓“舅子政府”。

在《真正国民党》一文中指出，真正的国民党应该是西山会议派，“因为只有他们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彻底”。

在《如此这般的反共清党》一文中揭露，西山会议派曾骂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是“受第三国际主使苏维埃之走狗”。

在《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一文中揭露，白崇禧在汉口演说：“过去的清党，有报私仇者，有受厚贿而为富家翁者，误杀冤死者不乏其人”。

此外，还有《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孙中山瞎了眼睛》二篇。

1月16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4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12篇。

在《金箍棒》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是“挂着羊头卖王八肉”。

在《蒋介石也是共产党》一文中预言，将来蒋桂矛盾，桂

系也会这样骂蒋介石。

在《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喊：“停止一切民众运动。”

在《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文中揭露，西山会议派也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过去蒋曾夸他们是“反共先觉”。

在《可怜的胡汉民！》一文中揭露，胡汉民说：“目击吾党命脉，已日就陆危，比虽昼夜徬徨，勤筹补救之方，而茫无所得。”

在《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在南京党校纪念周上说，要丈量土地，清查户口，准备解决土地问题。

此外，还有《容安与共信》、《武汉又多一个冤鬼》、《反共不彻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呀！》、《忠实同志又多一个！》、《吴稚晖识主》等篇。

1月30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5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11篇。

在《逼钱与打战》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和北洋派一样，只知逼钱、打内战，“所以国民党的势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

在《杀穷人》一文中指出，国民党“采用苛捐杂税等杀穷人的办法，而终于自杀”。

在《国民党的劳动立法》一文中揭露，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下令，工人“不得有轨外行动，倘敢聚众滋扰、无故罢工，即按军法惩处！”这就是国民党的劳动立法。

在《请看中国的阶级与争斗！》一文中揭露，顾孟余认为中

国没有阶级，所以不应有阶级争斗。

在《大元帅不是好做的呀！》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就任了海陆军大元帅，冯玉祥立即要求拨军费五百万，大元帅不好做！

此外，还有《两件肉麻的事》、《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冯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新军阀》、《反共始祖》、《险象丛生的国民党》等篇。

1月 朱德、陈毅等人领导了湘南年关暴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江西弋阳、横峰的年关暴动。

2月6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6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八篇。

在《反革命的阶级》一文中指出，上海商业资本家“总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而反对革命的！”

在《铲共还是铲蒋？》一文中揭露，白崇禧出兵湖南与何健作战，却通电话“彻底铲除共党”，如此下去，“将来非铲到南京不可”。

在《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一文中，他说：“我以为能救中国之穷的，只有去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而不是什么拜金主义。”

在《太好了！》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学习共产党的方法。他说：“以军阀豪绅官僚政客大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凑合的党，而抄袭共产党严肃的办法，在事实上如何行得通？”

此外，还有《国民党本来不过尔尔》、《殖民地驯服的奴隶》、《第三国际之野心？》、《呵！原来你们是革心党！》等篇。

2月9—25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

向忠发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2月13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7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七篇。

在《欢迎改造博士》一文中，他说：“好奇心与改造，是人类文明进步之一大原因。”

在《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一文中揭露，蒋介石等人在“改组中央党部建议”中说：“窃以本党为代表全体被压迫民众利益的党，而唤起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更为本党所主张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此话出自蒋某之口，真是怪哉。

在《乱党》一文中指出，任何时代，总有一班人因为不能满足现有制度，起而反抗谋改造，当时的统治者总称他们为乱党。因此，我们可以说：“乱党正是社会进化之一种重要的动力。”

此外，还有《呵要难为情嘎》、《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三民主义的交友与模楷》、《哈同花园与俄领馆》等篇。

2月20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8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十篇。

在《即是》一文中揭露，蒋介石从前说：“反对我即是反革命。”现在又对南京军校学生说：“反对校长即是反对国民政府。”古有“莫须有”，今有“即是”。

在《忠实同志乎叛逆乎？》一文中揭露，过去称唐生智、何健、杨森为同志，现在却称为唐逆、何逆、杨逆。“世界上的政党，只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这种怪现象”。

在《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指出，这次国民党全会的主要精神，“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

此外，还有《是谁从中播弄呢?》、《国民党还能欺骗民众吗?》、《达尔文与马克思同时倒霉》、《运动民众与民众运动》、《谁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无赖与有赖》、《“党人可杀”》等篇。

2月27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19期的寸铁栏中，发表了短文三篇。

在《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一文中揭露，蒋介石去杭州时，公安局叫工厂停工去欢迎，这时他们还是要民众的。

此外，还有《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二篇。

2月 在蒋介石操纵下，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决定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取缔工农运动，并通过了《制止共党阴谋案》。会议决定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

4月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五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6月6日 陈独秀次子陈乔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乔年曾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3年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湖北省委委员，“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被捕，6月牺牲，年仅26岁。

6月18—7月11日 在共产国际主持下，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4人。大会曾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五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人出席，自己则拒不参加。

“六大”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向忠发任总书记，李立三任中央秘书长。

“六大”以后，陈独秀不再是中央委员，也未分配任何工作，仅保留党籍，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

8月17—9月1日 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出席了大会。

是年 陈独秀避居上海，同党中央仍保持联系，有时还到中央机关或找负责同志谈话。

是年 陈独秀的长女筱秀在上海病逝，年仅28岁。

是年 陈独秀还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1929年 50岁

1月 原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陆续回国后，于1929年1月在上海租界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通过了政治纲领，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建立了领导机关“全国总干事会”。选举梁干乔、区芳、陈逸谋、施叔云、宋逢春等人为中央委员，并决定出版

《我们的话》杂志。

2月 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

春 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到中国，他向陈独秀介绍了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吹捧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苏联的开国元勋，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才华盖世，在苏联深得人心。攻击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又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吹捧托洛茨基的著作拿给陈独秀看，对陈独秀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春 彭述之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中，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稿：《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1928年6月5日）、《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彭认为托洛茨基的分析极为精辟，并请陈独秀研究，陈独秀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托氏的基本观点。”

4月下旬 刘仁静从苏联取道欧洲回国，专程去会见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盘桓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一文，交刘仁静带回中国。

5月 陈独秀通过尹宽，看到了“我们的话”派印发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文章和书信，他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的意见与自己不谋而合。特别是看到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文过饰非，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时，更中他的下怀。这时，他已开始倾向托派。

5月27日 东北当局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派军警搜查了领事馆，监禁了总领事和工作人

员，逮捕了苏方人员39人，开始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事件发生后，苏联向南京政府发出了抗议书。

6月26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日的口号》，提出了“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太平洋战争！”“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6月 为了挽救陈独秀，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去陈独秀家中做工作，指出其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作法是错误的，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能接受。

6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的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在《政治决议案》中又说：“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这向陈独秀和托派接触，提出了警告。

7月10日 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片面撕毁了中俄共管中东路的协议，下令武力接收中东路，将苏方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2日 针对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

众，在国际反帝赤色日——8月1日举行示威”，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同时提出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苏联万岁！”等口号。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口号。

7月13日 苏联政府通牒南京政府，抗议片面撕毁关于中东路路的“中俄协定”。

7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也提出了“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等口号。

同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从此在中苏边境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7月28日 陈独秀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央写信，批评党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认为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他主张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保卫苏联”、“拥护苏联”的口号。

陈独秀还认为，宣传苏联不放弃在中东路的权利，“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这种说法是不能够服人的。他还反对中央在42号通告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的提法。要求补发一通告，取消这一提法。

8月5日 陈独秀再次给中央写信，针对政治形势和革命策略等问题，提出了12条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当时的形势，

不是“革命高潮时期”，而是“两个高潮间的过渡时期”，因而应采取“退守政策”，不应采取“直接进攻政策”。不能强迫群众游行示威或罢工，这样只会失去群众。他还提出，要发扬党内民主，不能用“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

陈独秀在信中还错误地提出，大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认为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

8月7日 在《红旗》报第37期上公布了“撒翁”7月28日的来信，同时发表了《中央答覆撒翁同志的信》，不仅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的信是“反国际路线”的，他和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指责他“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他提出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根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

8月11日 陈独秀再次给中央写信，在关于中东路事件宣传问题上继续提出意见，不同意中央对他的指责。他认为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群众。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但又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他批评中央“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

8月16日 刘仁静回到上海，因拜访托洛茨基事，被开除

出党，他和郑超麟一起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文章，该文后来成了中国托派的政治纲领。

8月20日 在《红旗》报第39期上公布了“撒翁”8月11日的来信，同时发表了《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长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是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文章还指责陈独秀“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缺乏阶级观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是18世纪的机械的唯物论的观点，而且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8月28日 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责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并表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陈独秀认为，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所指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

同一天，《红旗》报第42期公布了《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

9月1日 王明以“韶玉”的笔名在《布尔什维克》第2卷10号上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指责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个错误，表现了五种机会主义的特点。并口口声声要同陈独秀作坚决的斗争。

9月2日 《红旗》报第43期公布了中共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

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又指出：“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布第四十九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其中提到：“现在党内反对派与机会主义者好像与统治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一样，极力来动摇党的正确路线，破坏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在全体同志中肃清他们的思想。如果发现了他们小组织的行动、反党的宣传，这便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疑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9月20日 中共江苏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恽代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与坚持托派观点的彭述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9月 “我们的话”派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广东分支的提议，将刘仁静开除出“我们的话”派。刘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10月6日 党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同时通知他：“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

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对此警告，陈独秀表示：“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10月10日 陈独秀再次给中央写信，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果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陈独秀在信中还谴责中央领导人经常用官僚政治的“命令主义”，用“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10月15日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在给中央信中提出的观点，认为“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大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决议还指出：“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茨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决议最后提出警告说：“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10月25日 江苏省委作出了《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

10月26日 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给中央写信，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然认为“目前既是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他们在信中直呼托洛茨基为同志，并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

同一天，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他的主张，不但否认正在增长的革命高涨，甚至于否认使这革命高涨必然到来的那些客观前提。”“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0月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指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具体分析了产生反对派的四条客观原因，指出：“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最后提出，对反对派“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

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信——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要求各地积极开展与反对派的斗争，指出，“忽视这一工作是非常错误的，中央特提起你们严重的注意！”

1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决议指出，陈独秀“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1月20日 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报第55期上发表了《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一文。批判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提出：“我们号召不愿反动的分子从速公开的脱离反对派，回转到列宁主义的党里来！我们号召全体同志积极起来肃清反动的反对派的理论和组织。”

11月27日 王明以“慕石”的笔名在《红旗》报第57期上发表了《论陈独秀》一文。他说：“现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全世界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公开宣布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把他从共产党的组织内驱逐出去，中国革命群众将都要知道有一个反动的陈独秀！”又说：“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久的将来，或者中国一般社会上，又要轰传一个反革命

的陈独秀！”

11月28日 毛泽东致函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11月 托洛茨基致函刘仁静，不赞成与陈独秀合作，他说：“如果太性急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1924—19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信‘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原恕的轻率。”

12月7日 《红旗》报第60期上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来阻挠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如果不肃清取消主义的思想和小组织，必然要使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工作受着莫大的阻碍。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

12月10日 陈独秀发表了长篇的《告全党同志书》。他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回顾了从党成立直到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过程之后说：“我们应该很坦白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他自己的错误只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觉的做

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

对开除他的党籍表示十分不满，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他认为开除他的党籍是“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

陈独秀还极力攻击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的路线。他说：“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

陈独秀还极力美化托洛茨基，称赞他是“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查获，送交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处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批示说：“这篇《告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做反中央工作。二，陈独秀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四，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12月15日 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开会，正式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会议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务委员，何资深为秘书长。会议决定出版

内部刊物——《内部生活》，后改为《无产者》月刊。

“无产者社”成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并在上海、北京、广州设有支部。

同日，公开发表了陈独秀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的政治纲领。这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起草，并经陈独秀修改的。《意见书》分五个部分：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权威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认为正是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断送了中国大革命。

对于中央的领导，他们认为：“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

沿着机会主义进行”，“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借以钳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他们还恶毒地攻击说：“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他们还叫嚷：“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坠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他们认为，现在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因而中国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来的政权也不是工农民主政府，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反对“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

他们最后提出了六条要求，要求国际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其党籍和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改组联共党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等。

12月初“无产者社”成立后，即同“我们的话”派商谈合作问题。“我们的话”派称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向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三，公开解散自己的小组织。”遭到陈独秀等人的拒绝。

“我们的话”派还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说：“他拒绝执行我们的要求，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12月 刘仁静也向“我们的话”派建议，同“无产者”派合作，并请陈独秀参加“全国总干事会”。他说：“陈独秀、彭述之不参加反对派则止，如其加入，必须参加‘总干事会’。”“我们的统一运动，可以说全是为陈独秀，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

12月20日 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省委通知第四号》，决定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人的党籍。

12月22日 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们的话”派，对陈独秀等人倾向托派表示欢迎。他说：“陈独秀站在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大致已与我们的主张相接近了，这当然是很欢迎的”。

1930年 51岁

1月 刘仁静、王文元、濮一凡、宋逢春等人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十月社”，发表了《告同志书》，并决定出版《十月》杂志。

1月25日—2月6日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苏联“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三次“关于陈独秀主义历史根源讨论会”。出席会议者认为鲍罗廷和维金斯基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他们都为自己做了辩解。会后发表了《论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文章。

2月8日 共产国际为了最后一次挽救陈独秀，给他发来一电报，提出：“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

程中去讨论。”

中央在转送这一电报时并有附电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覆，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2月17日 陈独秀写了《答国际的信》，拒绝了共产国际要他去参加会议的要求。说他同国际“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他指责共产国际说：“国际的领导，却教中国党战至卸甲丢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只留下一些雇佣队！”又说：“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提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达到的结果。”

陈独秀还对中国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乱！”“现在中国党的官僚主义，已与小资产阶级失败后愤激的情绪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深相结合，党的群众基础已扫地无余。”

这封信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彻底决裂了。

2月21日 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将陈独秀等人接受托派观点及建立组织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3月1日 陈独秀主办的托派刊物《无产者》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写了《无产者发刊宣言》，提出刊物的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二是批评共产党。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还发表了《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

策略问题》一文。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正在走向统一和稳定，他说：“这些战争（指新军阀混战）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通常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乃是其经济复兴之可能的前提。”

在创刊号的杂碎栏中还发表了《究竟是不是造谣？》等短文七篇。

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托洛茨基写的《中国发生着什么事？》一文。

3月12日 向忠发发表了长篇文章《陈独秀等之反革命的政治意见书》。批判了81人的政治意见书，指出：“陈独秀派为的要否认自己在过去之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为的要进攻共产国际，所以处处找托洛茨基做护身符，以形成其一贯的反革命的系统理论，以迷惑政治意识落后的群众。”

3月29日 《红旗》报第88期上发表了《陈独秀不如中国资本家》一文。提出：“只有陈独秀们，他们情愿公开做进攻苏联的急先锋，他们情愿鼓动全世界进攻苏联的战争。”认为陈独秀“比任何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要无耻，比中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还要反动。”

3月30日 “我们的话”派以“全国总干事会”的名义，发表了《致无产者社一封公开信》。要求“无产者社”解散，然后个别审查，个别吸收其加入“我们的话”派。

4月3日 陈独秀写成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7月1日在《无产者》第三期上正式发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利用穷

乡僻壤的农民搞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反对红军，反对苏维埃运动。他说：“全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遵守恩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现在中国……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后来，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曾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

同一天，托洛茨基写信给刘仁静，他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4月9日 李立三发表了《回答托洛茨基的问题》一文，对托洛茨基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一文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4月12日 《红旗》报第92期上发表了白登的《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的“稳定”》一文，用具体的事例批判了陈独秀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文章说：“陈独秀先生，……你可以一面舞着，一面歌着‘天下太平，万邦稳定’。”

5月14日 中共中央公开发布了开除吴季严、王文元等人党籍的通知。

6月11日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

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第四部分专门讲了与取消派作斗争的问题。指出：“现在取消派无论在他的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实行反革命的阴谋），都与改组派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他的作用完全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另一工具。到革命高潮的时候，更无疑的要公开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变成完全的法西斯蒂。所以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只是党内思想上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到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的影响。”

6月14日 易元发表了《红军与陈独秀先生》一文，驳斥和批判了陈独秀对红军的攻击和诬蔑。指出：“独秀先生的公式便是：红军等于流寇土匪，流寇土匪等于游民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等于各阶级中破落分子的渣滓堆。”

6月18日 《红旗》报第111期发表了《独秀的嗅觉》一文。指出：“独秀先生的嗅觉似乎比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的走狗还更差得多。”

6月21日 王明化名“韶玉”发表了《什么是“流氓”与“匪”？》，继续批判陈独秀对红军的攻击和诬蔑。

6月 托洛茨基写信给中国的托派，要求几个小组织统一起来。当时曾开过“协议统一”的代表会，因各派相互攻击，闹得不欢而散。

7月5日 《红旗》报第116期上发表了徐德的《论红军的前途——答覆陈独秀》、《反取消派的反革命理论》二文。继续批判陈独秀对红军的攻击和诬蔑。文中提出“打倒统治阶级的新工具——取消派！”“打倒欺骗群众的取消派！”等口号。

8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其中第四部分谈到取消派问题时指出：“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他们与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共同背叛了共产国际。他们鼓吹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稳定，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帮助着南京政府，一样高唱“全国统一”“政权稳定”的欺骗论调。他们之一贯的取消革命的理论，企图使全国工农群众永远作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批评工人罢工为‘盲动’，谩骂红军为‘土匪’，这些都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吻完全一样，客观上他们完全代表着统治阶级向革命势力进攻。……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公开的宣布，陈独秀及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完全是中国革命的叛徒，完全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罪人。”

8月22日 托洛茨基写信给刘仁静，对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他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是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他责备刘仁静说：“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他命令刘仁静：“请你代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刘仁静接信后，立即向陈独秀进行了转达，并同“我们的话”派联系。表示“完全拥护”托洛茨基的指示，并提议“各

派派一代表开一次谈话会，决定成立‘协议委员会’的方法和日期”。

同一天，托洛茨基还写信给“我们的话”派，十分关心托派组织的统一。他表示读了各派的信后，“我的总的结论，就是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的歧异，……你们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当时“战斗社”未成立）有什么各自分立的理由”。他批评“我们的话”派说：“你们将统一归结到一点，别的两派先得在你们面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加入你们的组织”，就是要“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允许与不足为训的”。他要求“大家一起草拟一个系统的统一政纲，然后根据各派人数推代表，召开统一大会”。

9月1日 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写信，更明确的表示：

“(一) 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够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分歧意见。

(二) 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 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12月10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他建议：“各派组成协议委员会以拟就

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

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陈独秀是另眼垂青的。

9月16日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大众在安庆病逝，终年55岁。高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陈独秀没有回去。

9月29日 “十月社”和“我们的话”派的北方组织首先统一，取名“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并发表了《接收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但他们继续指责陈独秀“在许多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

9月 托派临时国际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仍坚持反对中国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文件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不懂得革命。”

秋 由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等人组织了托派小组“战斗社”，并决定出版《战斗》杂志。

11月10日 陈独秀在《无产者》第5期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一文。

11月12日 “无产者社”发表了《致“协议委员会”的信》。信分三大部分，洋洋万言，谈了十五个问题，对其他托派组织进行了指责，并要求以“无产者社”为核心，来实现托派组织的统一。同时宣布召回自己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

11月20日 “我们的话”、“十月社”、“战斗社”三派代表以“协商统一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表示愿与“无产者社”合作，但反对他的指责。

同一天，刘仁静也以“中国左共同盟”的名义发表了《答复与质问》。对“无产者社”的公开信作了回答。

在这样争吵情况下，统一很难实现，于是各派都向托洛茨基告状。

12月 陈独秀在《无产者》第7期上发表了《为国民会议运动告民众书》。

是年 陈独秀与潘兰珍结婚，潘兰珍又名潘若兰、潘云仙，江苏南通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小陈独秀20多岁。结婚时不知陈独秀为何人，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时才知道，以后一直同陈独秀生活在一起。

1931年 52岁

1月8日 托洛茨基再次给中国托派组织写来一封长信，极力调和陈独秀派和其他三个托派组织之间的矛盾。他在信的一开头便说：“研究了新近文件之后，我确实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没有原则分歧的。”接着他对革命性质问题、政权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红军问题等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他恳切地呼吁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1月20日 陈独秀在《无产者》第9期上发表了《答列尔士（即刘仁静）同志》一文。认为托派组织之间的争论是“咬文嚼

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他在信中指责刘仁静说：“你回国的時候，負了組織工作的責任，我那時對於你，懷了莫大的希望，當時你若不中途惑於正統的見解，即令大家爭論無結果而訴之國際，現在的局勢已實現於去年的今日，可惜你不曾這樣做，至今反對派的小組織不但未由兩個變成一個，而經過你的奮鬥，由兩個變成三個，並且幾乎變成四個。”

2月1日 陳獨秀在《無產者》第10期上發表了《國際路線與中國黨》一文。

2月5日 陳獨秀寫了《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以後發表在《無產者》第11期上）。他表示：“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並提議“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

2月15日 陳獨秀寫成《我們為怎樣的國民會議奮鬥》一文（後發表於《無產者》第11期上）。

3月15日 陳獨秀在《無產者》第12期上發表了《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中國民族命運已放在勞動民眾的肩上啊》等文。

春 根據托洛茨基1月8日的來信，各托派組織之間停止了爭論，每派選代表二人組成了“統一大會籌備委員會”，在籌備過程中，對代表產生的辦法展開了爭論，“無產者社”成員較多，主張按人數選代表，其他三派則主張各派代表人數相等。彭述之怕托派統一後自己當不上領袖，也故意進行拖延。

春 陳獨秀同梁干喬、王文元等人談話，表示，“統一

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灭亡，因为，反对派今后艰巨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3月 托洛茨基再次写信给中国托派，要求：（一）马上进行统一，于最近召集统一的大会；（二）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三）在统一大会前，组织一协议委员会，委员由各派推选一人充任，负责起草各种议案、宣言，审查代表资格等事宜。最后他说：“我希望在最近的国际反对派大会中，有统一的中国反对派代表出席。”

春 陈独秀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无产者社”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由他和尹宽二人出任代表。关于统一大会代表的产生，他提出了既要照顾派别也考虑人数的建议。陈独秀的热情，影响了其他三派，决定迅速召开统一大会，由陈独秀负责起草大会文件：（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二）《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

5月1日 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出席代表20人左右。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同志默哀三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彭述之作了职工运动决议草案的报告，来燕玺作了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

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发言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发言不同意“国民会议”的口号。陈独秀批评他们是形而上学，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会议确定托派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

会议用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区芳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总书记，郑超麟管宣传，陈亦谋管组织，罗汉任秘书，王文元管党报。

会议决定出版《火花》杂志，做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大会共开了三天，陈独秀最后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不能忘记，他们期待着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付给我们的使命。”

会后，由罗汉起草了给托洛茨基的电报，喜气洋洋地说，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

5月 托派统一大会后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政纲》，是根据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为基础写成的。共分五个部分，（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四）中国革命的前途；（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纲领》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任务，都强调要“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但又断言“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他们攻击党说：“企图依靠乡村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冒险主义”。“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的象征。”

5月 托派统一大会后不久，马玉夫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跑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去告密，又发表自首文章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决无存在的余地”。

5月23日 由于马玉夫的告密，托派中央遭到了一次大破获，被捕的中央委员有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还有何资深、江常师、楼国华、刘静贞（郑超麟妻）、张以森（何资深妻）等人。中央委员区芳，罗汉也躲了起来，托派中央只剩下了陈独秀、彭述之二人，已名存实亡了。陈独秀哀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5月 国民党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制订了《训政时期的约法》，确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固定下来。事前，托洛茨基曾指示中国托派“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

6月 托派分子严灵峰等人挑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著作，反复论证中国已经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了。他的谬论遭到了吕振羽、刘梦云等人的批判。

9月5日 托派中央的机关刊物《火花》正式创刊，陈独秀

在第1期上发表了《国民党与中国统一》一文。

9月12日 蔡和森在《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分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实质，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9月 陈独秀、彭述之与刘仁静合作，创办了一个托派刊物——《热潮》周刊。

9月18日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了东北三省。

9月下旬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并在《火花》、《热潮》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10月9日 陈独秀在《火花》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一文，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他说，“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他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的“大规模的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认为抗日战争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10月 陈独秀在《火花》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章多篇。继续号召抵制日货和武装抗日。

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陈独秀编写的《托洛茨基同志论苏维埃》、《托洛茨基同志论国民会议》两文。

10月 陈独秀为托派中央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痛斥了日军侵东北、胁锦州的罪行，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并号召推翻国民党。

11月7日 在《火花》第1卷第5期上发表了《国际第二次会议后的局势》、《我们争论之中心点》等文章。

11月28日 陈独秀在另一托派刊物《校内生活》第1期上发表了《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两个路线》等文。

11月30日 在《火花》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最近上海工人运动与党的领导》等文。

12月15日 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回浙江隐居，但大权仍为其亲信所把持。

12月17日 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来南京请愿的学生和南京学生几万人，组织游行示威，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在珍珠桥附近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打死30多人，打伤100多人，制造了“一二、一七”大血案。

12月20日 陈独秀和刘仁静主编的《热潮》杂志出版了《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发表了《“一二、一七”与“三、一八”》一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揭穿了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独裁政策的阴谋。

12月26日 陈独秀在《热潮》第5期上发表了《谈谈〈越轨行动〉》一文。热情地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

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私有财产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是，“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

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

12月下旬 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推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是年 高君曼因患子宫癌，在南京逝世，终年46岁。自陈独秀与潘兰珍结婚后，高君曼即带子女住在南京东厂街，在此地有草房十多间，地数十亩。高君曼生活困难，每月由亚东图书馆补助30元度日。

1932年 53岁

1月6日 陈独秀以“顽石”的笔名在《热潮》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一文。

1月中旬 蒋介石在重新上台之前，以在野身分发表长篇外交演讲，提出了对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其目的在于力图避战。

1月21日 汪精卫去杭州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达成权力分赃的协议后，联袂入京。后经国民党中政会议决，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1月23日 陈独秀在《热潮》第7期上发表了《由反日到反国民党》一文。

1月28日 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进

攻上海，遇到了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

同一天，陈独秀在《火花》第一卷第7期上发表了《评工农民主专政》、《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等文。宣称他们主张“国民会议”，反对“工农民主专政”；要求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由他们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选举为基础之全权国民会议”取而代之。

1月 淞沪抗战爆发时，陈独秀和罗汉曾向我党中央提出过合作抗战的建议，并且专门写信托施卜君夫人送给中央。因那时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对陈、罗的意见未予理睬。陈独秀还为托派中央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和《为日本占领淞沪告民众书》等文件。

1月 国联拼凑了一个由美、英、法、意、德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所谓“中日冲突问题”。

2月10日 托派中央常委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和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此时陈独秀把持的托派中央，采取的是抗日，反蒋的立场。

春 经过陈独秀半年多努力，勉强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央

“临时常委”。有陈独秀、彭述之、罗世璠、宋逢春、濮德治（后二人因病，保外就医）五人为常委，谢德盘为秘书长。

3月 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定都长春，改名“新京”。

3月24日 中日双方开始了淞沪停战谈判。

4月1日 陈独秀在《火花》第一卷第8期上发表了《拥护帝国主义政策的特殊论据》一文。

4月7—17日 汪精卫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出席人数很少，主张抗日民主和不满蒋汪统治的人均未参加，会议只是号召人民“赞助政府，共同御侮”。

4月16日 陈独秀在《火花》第一卷第9期上发表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等文。他认为在中国革命中农民是最重要的成分，并进一步论述了他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5月5日 中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苏州河以北，沿安亭镇东侧、北至望仙桥、浒浦口一线以东，中国军队不得进驻，而日军则“可暂时驻扎”。这一协定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6月15日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信，向他报告了托派中央重新组织的情况。

6月16日 陈独秀在《火花》第一卷第10期上发表了《中国反日斗争已经没有希望吗？》、《前进与后退》、《东京事变与远东局势》等文。

7月28日 陈独秀在《火花》第一卷第11期上发表了《谁和怎样救中国》一文。

9月1日 陈独秀在《校内生活》第5期上发表了《反极左倾的错误》一文。

秋 托洛茨基于9月22日、26日、10月3日，三次写信给陈独秀，对托派中央重新组织表示祝贺，并十分具体地指示中国托派在中国当时出现的抗日反蒋运动中应如何活动。可是陈独秀没有接到这些信就被捕了。

10月1日 陈独秀在《校内生活》第6期上发表了《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

七、狱中生活

(1932.10—1937.8)

1932年 53岁

10月15日 国民党特务和一些叛徒，跟踪濮德治，发现了托派常委开会的地点，于是进行了紧急逮捕，当场逮捕了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罗世璠和谢德盘。陈独秀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后因谢德盘叛变，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寓所被捕。此外，被捕的还有何资深、王平一、彭道之、梁有光等人。可以说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在报纸上大肆吹嘘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并发给特务和叛徒奖金3万元。

10月16日 陈独秀被捕后，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关押在侦缉队，侦缉队长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写字留念，他写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横幅。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独秀等人妥慎押送南京。在押送途中，陈独秀一路酣睡，表现了不怕死的无畏精神。

10月20日 陈独秀等人押解到南京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车站迎接，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陈独秀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陈公博等人。

10月22日 国民党中央派组织委员会干事黄凯，携带陈独秀案件的重要文件去武汉，向蒋介石面述一切，请示定夺。蒋介石又把叛徒谢德焘等人调到武汉行营，亲自审问。一切材料都证明陈独秀和共产党已无联系。

10月23日 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从上海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对陈独秀进行营救，电文中说：陈独秀“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学术幸甚，文化幸甚”。

同一天，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37期上，也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标题是“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10月24日 蒋介石电令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0月25日 陈独秀由军法司司长王振南陪同，拜见了何应钦。何告诉他将交地方法院审判，并要陈独秀为其题字，他挥笔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0月26日 陈独秀等人由军法司移交江宁地方法院看管。

10月 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也致电蒋介石，对陈独秀进行营救。

10月 陈独秀被捕后，一些反动政客也纷纷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说情。

10月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学生界发动了有声有势的援陈运动，好几个大学都举行了讲演集会。

10月 中国托派为陈独秀被捕也发表了声明，题目是《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声明还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

10月29日 江苏省高等法院派检查官朱俊和书记官到南京，上午开庭初步审讯二小时，准备提起公诉。

11月1日 《红色中华》报再次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标题是：“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

11月17日 《先锋》第5期发表了陈独秀入狱前写的《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一文。指出：“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致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无他，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故智，使之自首告密。”

11月21日 《红色中华》报再次报道了陈独秀的消息，标题是“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文中称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反共”先锋。

12月1日 陈独秀致函胡适。他说：“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他请胡适为他找几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争取早日出版他的拼音文字的著作。他说：“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冬 陈独秀等人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病监第二号，开始时不准通信，不准探视，不准看书报，经过绝食斗争，境遇才有所改善。

是年 画家刘海粟曾到狱中看望陈独秀，并送给他一张画，他为刘撰写了对联一幅：“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此外，他还自撰过一幅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陈独秀还向刘海粟表示，“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

1933年 54岁

3月底 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提起公诉。《起诉书》中说：

“查被告(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为一党之主脑。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固无论矣，即以中央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其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竟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

3月 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邨、蒋豪士、刘祖望五人担任了陈独秀案的辩护律师。

4月14日 第一次开庭审讯陈独秀案，由胡善儒任审判长。首先由检查官朱俊宣告了陈独秀等人的拘捕经过，然后第一个审讯陈独秀，当问道：“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15日 第二次开庭审讯，首先与陈独秀查对了昨天审讯之笔录。然后分别审讯，当问陈独秀“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答：“是。”

4月20日 第三次开庭审讯，检查官朱俊提出公诉说：“查被告（陈独秀）之被开除，是被史丹林派开除，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最后又说：“综纳被告之主张，共有四阶段：（一）组织团体；（二）宣传；（三）武装暴动；（四）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被告之行为，在第二阶段中，至第三阶段，现在还办不到，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下午，陈独秀在法庭进行抗辩，他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再述了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三点理由：“（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故不得不反对。”最后他提出：“检查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接着，章士钊律师为陈独秀作了辩护，彭望邨等律师也为其他人作了辩护。

4月22日 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反动本质，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陈独秀写了书面的《辩诉状》，让友人传抄和印发。在《辩诉状》中他慷慨陈词，扼要地总结了自己一生中追求救国真理的历程，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行共产主义。

在《辩诉状》中，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曰：反抗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独立”。“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一曰：改善工、农生活”。“一曰：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陈独秀不仅不承认自己“叛国”、“危害民国”，同时还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说：“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冕之王，擅作威福，法律只制裁小民，文武高官，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已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又说：“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制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

有异说。……试问谁为‘叛国’?!”又说：“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割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陈独秀还表示：“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4月26日 法庭宣布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

5月4日 章士钊为陈独秀写了书面的《辩护词》，广引法律条例，说明陈独秀无罪。

5月 陈独秀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重大影响，亚东图书馆还编为《陈案书状汇录》出版。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两所教会学校）还选为法律系教材。

5月 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程沧波写的《约法至上答陈独秀与章士钊》的长文，强词夺理，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辩解。

5月8日 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第77期上报道了陈独秀判刑的消息，标题是：“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文中说：“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6月15日 陈独秀在狱中写了《上诉状》，托蒋豪士律师带

至上海，与章士钊研究后，送交国民党最高法院。

在《上诉状》中，陈独秀提出：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不能搞“朕即国家”；反对党的存在是合法的；苏维埃制度和民主共和制度是一致的，不能说是“变更国体”。最后提出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反对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因此，对判决不服。

7月4日 国民党最高法院将陈独秀的上诉状驳回，谓：“被告等所组织之中央反对派，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事理至为明显。被告又以其叛国宣传，尤为明晰。上诉意旨，强为曲解，殊难认为有理由，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陈独秀在狱中极受优待，独居一室，房里有二个大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供他研究，还可以随时接见外人。因他有病，特许濮德治、罗世璠二人轮流看护。

陈独秀在狱中利用优待条件，与狱外的托派组织取得了联系，由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

夏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最早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9年12月20日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曾任“无产者社”沪东区委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后，撒手而去。由陈其昌任临委书记，他和蒋振东、赵济搞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进行活动很少，不久尹宽出狱，也参加了临委。

10月8日 陈独秀以“雪衣”的笔名写了《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后发表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书中。

10月 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没有去狱中看望陈独秀，陈对他极为不满。

11月15日 陈独秀写信给汪原放，表示与胡适已分道扬镳。他在信中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说老胡的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与之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

11月23日 陈独秀为托派起草了《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文件，发表在《校内生活》第7期上。他提出：“至少1935年以前……这二、三年中也还只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在此革命低潮期间，不该采用过高的自欺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反对国民党起草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

12月15日 陈独秀写了《对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后发表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书中。

是年 托洛茨基派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到中国来，帮助整顿托派组织。

1934年 55岁

1月7日 写了《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后单独出版。

1月16日 写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收入上书。

2月8日 写了《论对宋庆龄集团的策略》一文，后在

《校内生活》第13期上发表。

2月10日 写了《应该这样答复吗？》一文。收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

4月6日 写了《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一文，收入《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书。

4月30日 在《校内生活》第8期发表了《对政治“草案”和其他问题的意见》一文。

5月12日 陈独秀写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收入《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书。

夏 格拉斯到中国后，同刘仁静勾结在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临委，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把北平托派组织的斯朝生和刘家良等人调到了上海，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托派临委。

刘仁静写了《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一文。认为陈独秀提出的纲领是“短视的经验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1934——35年的中国所描画的前途，同他为1932——33年的中国所描画的前途一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斯朝生也攻击陈其昌等人的“临委”是“上层官僚主义”。认为陈独秀在淞沪抗战时，在抗日、反蒋等问题上“与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路线”。

7月21日 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7月30日 陈独秀在《校内生活》第9期上发表了《肃清列

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一文，对刘仁静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10月22日 陈独秀写了《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一文。当时托派主张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陈独秀却认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

同时，陈独秀还写了《我对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

是年 陈独秀在狱中写了诗集《金粉泪》，共56首。有的写他自己的抱负和遭遇，如“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有的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涂炭，如“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

是年 莫斯科对托季联盟进行了初次审判。陈独秀在狱中表示：苏联“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

1935年 56岁

1月2日 刘仁静控制的托派临委发出《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了指责，通知说：“一部分同志(如雪衣(陈独秀)、高吉士(尹宽)、庄(刘伯庄)、昌(陈其昌)认为，我们可以和‘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或‘在抗日、反战、倒蒋这一点上共同行动’。他们目前建议主张为了提高我们反对派的政治地位，我们应该正式

参加宋庆龄、胡汉民及斯大林派所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反战大同盟’，和他们‘合作社会运动’、‘合作机关报’等等。”通知认为这是一错误的路线。实际上，刘仁静等想通过上海会议，把陈独秀及其拥护者尹宽、陈其昌等人开除出临委。

1月10日 陈独秀以“雪衣”的笔名为托派起草了《现局势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

1月13日 在李福仁、刘仁静支持下，斯朝生等人，背着陈其昌等原来的领导人，召开了“上海代表大会”，选举斯朝生、刘家良、王耀华、扈焕之和李福仁等组成了临时中央常委会，斯朝生任书记。并决定将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他们登台后，要陈其昌等人“放弃意见”，遭到断然拒绝。

1月15日 陈独秀写了《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的信》。他说：“1月2日所发临委紧要通知内中提到联合战线问题，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一问题及其他重要问题，都急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以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人这一滑稽手段。”陈独秀特别对李福仁不满，他说：“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同一天，陈独秀还写了《学史大林不可学得这样快》一文。收入《肃清机会主义》一书。

1月21日 托派“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通告没有直接点陈

独秀的名，却点了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陈其昌和尹宽的。认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大会认为只有与这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及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才能前进”。又说：“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思想，我们是同志，否则开除！”

1月25日 托派临委又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给陈独秀发出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中央委员会给雪衣同志的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指责陈独秀犯了原则错误，信中说：“我们的原则和纲领是铁一般不允许迁就的，内部不允许原则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或者（你们）改正错误，或者公开诚恳的分裂。”

2月4日 托派临委又发出《中常委通告第二号——为撤销陈其昌、高吉士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态度事》。通告说：“中央委员会根据上海代表大会决议，已与陈其昌同志作最后谈话，陈正式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改变’，中央……因此决定将他开除”。“高吉士最近所发表的《确定意见》，他仍保留机会主义思想，因此，决定取消他的党籍”。不久，又把陈独秀开除。

2月8日 在《校内生活》第13期上公布了陈独秀1月15日的来信。

2月14日 陈独秀致函胡适，商谈其著作的出版问题。他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春 陈独秀和李福仁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陈独秀斥

责他，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脚，摆出‘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李福仁则骂他为“不可救药的老机会主义者”。

春 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斯朝生等四个新中央领导人在上海全部被捕，其后台刘仁静也在北京车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此事发生后，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要去南京狱中面见陈独秀，被陈拒绝。

7月 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王明、康生等人出席了大会。

8月 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以记者身分在中国活动，刘仁静曾给他当过翻译，他帮助刘仁静写了《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一书。1935年8月，伊罗生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等情况，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他表示“绝不相信”。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题目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

秋 托洛茨基写信给李福仁，对于托派中央和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

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10月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年底 王文元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共收罗二十多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五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赞同。

此时，经陈其昌、王文元等人的解释，陈独秀和李福仁的关系有所好转。

1936年 57岁

年初 托派中央创办了政治机关报——《斗争》月刊。王文元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6月3日 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并寄去一些托派刊物。6月9日，鲁迅公开回信，对他进行痛斥。以后陈其昌又给鲁迅写一长信，没有发表。陈独秀得知此事后，大发脾气，认为不应该对鲁迅发生幻想。

8月19—24日 苏联法庭举行了公审托季联盟事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判处死刑。

夏 陈独秀写信给赵济，对黎彩莲（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托派）病逝，表示哀悼。

9月 陈独秀发表了《中国的一日》一文。他说：“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

12月12日 “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消息传来，监狱中如临大敌。陈独秀得知后，如同儿童过节那样高兴，托人打酒买菜，并对濮德治、罗世瑄说，我生平滴酒不饮，今日为了国仇家恨，要痛饮一杯。第一杯酒他祭奠了革命烈士，斟了第二杯酒，他呜咽地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酌此一杯，说罢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年底 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放了一夜爆竹，陈独秀从梦中惊醒。他说，从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还有群众基础。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年底 以陈其昌、王文元为首的托派新中央出版了理论刊物《火花》，曾发表过陈独秀起草的一份提纲，他认为苏联已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官僚国家。他的意见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王文元写了一篇反对文章，同他的提纲一起发表。

是年 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题为《金陵怀古》的七言绝句诗24首。许多是辛辣地讽刺国民党要人的。

是年 托派还创办了《嚶鸣》杂志，由李季主编，作为对外宣传的刊物。

1937年 58岁

1月16日 在《东方杂志》第34卷2号上发表了《荀子韵

表及考释》一文。内容有：（一）成相篇，（二）赋篇。

4月1日 在《东方杂志》第34卷5、6、7号上发表了《实庵字说》一文，主要是进行文字考证。

当时国内曾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大多数托派理论家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在民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他们还认为自秦汉以来就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同意这些观点，在考察“臣、民”等字时，他说：“古之中国氏族社会之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希腊罗马由奴隶制而入封建，中国、印度、日本则皆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者也。”他的这些观点，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

4月24日 延安《解放》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日寇侵略的别动队》一文。提出：“中国的托陈派的组织，人数不多与极其薄弱的。但是这些日寇侵略的猎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虚伪的两面派手法，用尽一切力量想侵入救国运动的队伍中间，而进行破坏、捣乱、阴谋的活动。”又说：“托陈派是中国民族解放之死敌，是日寇侵华之别动队。”

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6月1日 在《东方杂志》第34卷11号上发表了《老子考略》一文。认为老子并非李耳，老子即姓老名聃，“不与孔子同时”，也“非道家始祖”，老子著《道德经》之说，也未可信。

是年 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以下著作：

《甲戌随笔》三卷，卷一甲戌随笔，卷二音韵文字杂记，卷三古史材料。均为随笔杂记材料，没有公开发表过。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没有公开发表过，陈独秀出狱后，1940年冬曾重订此稿，1941年秋，写了自序一篇，在江津白沙油印若干册，馈赠友人。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11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4卷20、21号上。

《连语类编》，此文没有公开发表过。陈独秀居江津时，北京大学曾自昆明寄钱给他，为了表示感谢，他将此稿，加以短序，赠给北大，因战时困难，未能出版。

《屈宋韵表及考释》，此文在狱中没有写完，出狱后也未再续。没有公开发表过。

《晋吕静韵集目》，没有公开发表过。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陈独秀出狱后，1939年2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6卷4、6号上。

《中国古代史表》，出狱后，1940年1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7卷22号上。

《识字初阶》，这是一本研究文字学著作，陈独秀出狱后继续研究，后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干支是字母说》，认为干支了无意义，只不过是些字母。据他考证，“甲”字是龟形，“乙”字是燕形。此文没有公开发表过。

陈独秀在狱中治学，自号曰：“明宜”，并以此作为与友人通讯的化名。

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8月11日 李福仁向记者谈话时宣称，托洛茨基曾来信指示他发起一个“护陈运动”，此时托洛茨基担心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可能杀害陈独秀。

8月13日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抗战。

8月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8月中旬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

陈独秀所在的监狱也被震塌，他躲在桌下，幸未致伤亡。

8月中旬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原北大学生)去监狱探望陈独秀，得知监狱被炸，便同胡适、张伯苓等商议联合保释他。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听后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求无条件出狱。因此，陈钟凡等人的保释未成。

8月21日 由于时局紧张，又迫于国共合作已经实现的形势，国民党司法院院长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内称：“该犯入监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当天，国民政府就将呈文批下，发出“国民政府指令”，内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当天，司法院接此指令后，又发出了给司法行政部部长

王用宾的“训令”，内称：“国民政府将该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8月22日 宣告陈独秀减刑的消息和“国府明令”都在报纸上发表。并称：“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当天，监狱当局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濮德治、罗世璠等人都劝陈独秀发表一个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必须声明更正。当时陈独秀没有发表声明，对新闻记者也避而不见。

8月23日 中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国民党为了对他表示殷勤，特派中统局处长丁默村去监狱接他，并准备安排他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被他拒绝，而住到傅斯年家中（傅为北大学生，当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八、晚 年

(1937.8—1942.5)

1937年 58岁

8月25日 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报上刊登。

8月底 因敌机轰炸，傅斯年家中无人，陈独秀又寄居到陈钟凡家中。

8月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几次请他吃饭。先是胡适要他去美国写自传，被陈拒绝。后又拉他入“国防参议会”，他也坚不肯去，并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8月 蒋介石派亲信朱家骅去拉拢陈独秀，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以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作诱饵。陈独秀不为所动，表示坚决不干。后又想请他出任劳动部长，也遭到拒绝，并斥蒋是“异想天开”。

8月 陈独秀出狱后，包惠僧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并对包惠僧说：“老干们（指王明等人——编者）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

陈独秀还通过包惠僧给《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写了一个条子：“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想发表一个声明，但程沧波没有给予发表。

8月 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组织劝他回上海重整旗鼓，他表示这种宗派作法没有出路，决定不回上海。

彭述之出狱后即回上海，召开了一次积极分子会议，组织了托派新临委，领导人有彭述之、陈其昌、刘家良等人。陈独秀对彭述之的行动很为不满。

8月 陈独秀表示，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并托人转告我党驻南京的代表，他已脱离托派组织，愿意会见我党代表。为此，博古和叶剑英会见了，希望他公开声明，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脱离托派组织。他表示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托派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不久，应陈独秀的要求，叶剑英又和他晤谈一次。

8月 陈独秀的好朋友、已经脱离托派的罗汉到了南京，与叶剑英、李克农等人进行了晤谈，提出了联合抗日的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等人表示欢迎。但因与陈独秀联合，事关重大，于是给罗汉开了赴陕介绍信和旅费，要他去党中央会谈。

8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派第四国际通过了《中日战

争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初 罗汉到达西安，会见了我党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经与党中央联系，同意罗汉去延安，因交通阻塞，没有去成。中央根据陈独秀和罗汉提出的要求，以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名义复电，提出了作为接受陈独秀、罗汉等人联合抗日和回到党内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罗汉答应将此条件转告陈独秀。

林伯渠又叮嘱罗汉，要对陈独秀作耐心的劝说。他表示，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罗汉还会见了由太原回陕的王若飞，王表示，因回延安事忙，否则可随他南下去会晤陈独秀。

罗汉返南京后，把党中央的条件告诉了陈独秀，陈亲自写了一封信和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请罗汉转叶剑英等人，作为答复。据罗汉说，博古看后曾表示，陈的纲领和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因陈独秀对托派问题不肯公开表态，罗汉遂去宜兴教书。

9月中旬 陈独秀离开南京赴武汉。先住在武昌一个姓兰的家里，后搬到汉口德润里（一说住武昌双栢巷），他曾与

董必武等人会晤，董必武一再表示希望他切实实践党中央提出的条件，尽快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表示：“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9月23日 托洛茨基发表了《论中国战争致里维拉的信》。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有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他一面要求中国托派“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

10月1日 在《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上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认为孔子在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大，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做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农民起义时，孔子就一时倒霉，新的王朝得胜，即刻又把孔子抬得天高。但在学术上，孔孟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

10月2日 在《宇宙风》第49期上发表了《从第一双十到廿六双十》一文。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

10月6日 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讲演。认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10月初 陈独秀在汉口青年会作了题为《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的讲演。他在分析了中日双方的财力、人力后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唯武器论”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10月10日 在《武汉日报》发表了《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一文。认为抗日战争要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10月16日 在《抗战》周刊第一卷第6期上发表了陈独秀10月9日的答记者问，题目是《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关于抗战前途，他说：“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

关于是否参加政治运动，他说：“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11月初 陈独秀在武汉大学作了题为《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的讲演。认为只有“全民抗战”才能取得胜利，而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作好三件事：“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

他还提出：“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尤其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

忌。”

11月11日 陈独秀在《宇宙风》第51、52、53期上发表了《实庵自传》两章，叙述了他的少年时代和去南京乡试的情况。

11月中旬 陈独秀发表了《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一文，表明他对抗战的态度。他提出了十条纲领：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兵、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士兵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11月20日 《解放》第24期发表了署名“冰”的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首先对陈独秀的出狱表示庆幸，并热诚的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同时，承认陈独秀的观点“与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尽着日寇别动队的作用！”

“时评”还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指出：“陈先生确实像一个私塾的顽固老先生，面朝着‘五四’时代，背向着今天的抗战”。“陈独秀先生的贵体是自由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底俘虏。”

11月21日 陈独秀写了《给陈其昌等的信》，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 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中国托派临委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托派的“抗战”政纲——《“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提出了一条极“左”加反动的路线，贯彻了托洛茨基两个打倒的口号，并诬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

“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因此，“必须无情的打击”。托派中央曾把这一决议寄给陈独秀，他一怒之下，扔进了字纸篓。

11月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34卷20、21号上发表了他在狱中所写《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一文。

12月 陈独秀发表了《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小册子。他说：“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在这一单行本中，陈独秀还发表了《打倒消极先生》、《言和即为汉奸》、《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对于鲁迅的认识》等文。

在《言和即为汉奸》一文，他说：“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在《打倒消极先生》一文中，要求政府在民众运动上、在财政上、在处置汉奸问题上、在商业上、在军事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他说：“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在《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文中，他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固然有毁灭我们之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它，正是及时的无限大警钟，一针强心针和一剂最猛烈的

兴奋剂。……我们吃了悠游自在的亏太厉害了，太长久了，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或者会医好我们这一个祖传老病。”

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他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是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12月9—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刚回国不久的王明，坚决反对与陈独秀进行谈判。他声色俱厉地威胁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他还恶毒攻击陈独秀是“杀人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等等，有人提出这不是事实，他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还蛮横地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不久，王明即去武汉。

12月21日 陈独秀写信给上海的罗世璠、陈其昌、赵济等人，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缺乏合作的条件。我们没有一定的力量，所以合作很难实现。

冬 陈独秀在武汉曾想自己开创一个局面，他一方面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国民党)、不阿共(共产党)，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标。另一方面他又联络在武汉养病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准备派王文元去该师任秘书长，濮德治等人去任参谋。

后因民主人士响应者不多，何基沣又被免职，王文元、

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各奔前程，使陈独秀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冬 彭述之等人主持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极为不满，认为陈的活动是“军事投机”、“拉拢投机政客”。

冬 周恩来到了武汉，主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他曾和罗汉会谈一次，他对罗汉说，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罗汉等人“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又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1938年 59岁

1月1日 《群众》周刊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点名指责陈独秀是“托洛茨基匪徒”，散布失败论，破坏抗战。

1月11日 在周恩来等人的筹办下，《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1月28日 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期和第30期上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诬陷陈独秀是日本汉奸。他在文中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

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2月初 陈独秀的友人贺松生邀请他去湖南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文字学著述。

2月11日 陈独秀给贺松生去信表示，“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

2月18日 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陈独秀著《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陈独秀为该书写了自序，他说，上海朋友们“想拿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册子，做试验目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在高呼继续抗战期中，究竟有无成为禁书的资格，我报之曰可，并自序此书之原委见此。”

3月5日 《解放》周刊第35期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底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

3月 康生文章发表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都指责陈独秀是“托匪汉奸”。尤其是王明到武汉后，极力宣传陈是“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3月16日 汉口《大公报》上发表了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周佛海、张西曼等九人的来信，为陈独秀辩诬。信中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全国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

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3月17日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题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提出，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3月18日 陈独秀见到《新华日报》的短评后，立即写了《给〈新华日报〉的信》、因《新华日报》拒绝发表，改在《扫荡报》上发表，他在信中说：“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又说：“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同一天，张西曼给《新华日报》写信说：“我为什么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呢？就因为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3月19日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写信，叙述了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及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此信3月20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3月20日 针对陈独秀的来信，《新华日报》再次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 佯作 不知道”。又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陈独秀和托派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种说法，更加引起公愤。

3月21日 陈独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给陈其昌等人的信，表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脱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脱离托派。

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不满，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D·S(即陈独秀)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指责陈独秀“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最后指出：“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同志D·S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

一致的正确结论”。

3月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表示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

3月 陈独秀还发表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文。提出即使军队战败，也要抗战到底。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

4月5日 《解放》周刊第34期上发表了《托派是全人类与全中华民族的公敌》一文。提出“托派在上海每月领取日本人10万元的津贴，来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民族抗战的工作”。“托派在北方每月领取5万元的津贴，来专门破坏八路军及华北抗战军队与其他抗战组织”。

4月 为了解决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争论，徐特立专程从长沙到汉口，进行调解。

4月 周恩来同志为了党的利益，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以求缩小事态的发展。他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这样才使风波较快地平息下来。

4月8日 陈独秀给贺松年写信，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指王明一伙

——编者)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平,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法庭算总帐。”

4月 陈独秀发表了《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一文。分析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对战争的态度。他认为:“不惜牺牲各国的革命,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4月 陈独秀还发表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他认为国共合作,磨擦日生的原因是:“其种子已含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战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上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他提出防止磨擦的办法是:“(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4月 陈独秀还发表了《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一文。

批判了国民党关于“思想信仰统一”的谬论，指出“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他说：“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

4月24日 汉口《正报》发表了罗汉的《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为陈独秀辩护，他详细地介绍了他和陈独秀同我党接触的情况。关于和唐有壬的谈判，他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谓之廉价之高峰。”同时他还指出，康生的文章说1937年6、7月间陈独秀曾同美国托派分子格拉斯接洽，实际上陈独秀当时还身处狱中。这就完全揭穿了康生等人的谣言。

4月25日 陈独秀在《政论》旬刊第一卷第9期发表了《抗战与建国》一文。他认为现今所处的时代“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法西斯特运动，乃是这一整时代的大流将转变为另一时代之暂时的逆流。”他提出，民主任务不完成，就谈不上建国。他说：“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建国事业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业。”

4月 张国焘叛党后，逃至武汉，曾会见陈独秀，表示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并拉陈独秀参加，陈未予理睬，并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同时，谭平山也想拉陈独秀参加第三党，陈也无意于此，表示他只主张抗战救国。

5月15日 陈独秀在《政治评论》第一卷第10期上发表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他认为五四运动时代“不但现在不会过去，即在近的未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

陈独秀在文中还对共产党进行了攻击，他说：“正因为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以及由打倒富农到‘请土豪劣绅帮忙’，由苏维埃政府到国防政府，由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由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

夏 刘仁静去武汉，曾和陈独秀会晤一次。第二次他再去时，陈独秀避而不见，只给他留下一封信，表示绝交。

6月3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十四次常会，通过一项决议，恢复大革命时期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26人的党籍。包括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彭述之、包惠僧等。

我党中央发表声明，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7名共产党员，表示不能予以承认。

6月5日 在《政论》旬刊第一卷第13期上发表了《我们断然有救》一文。提出：“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

6月15日 在《政论》旬刊第一卷第14期上发表了《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一文。提出“……国民党自己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万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6月16日 因武汉形势紧张，陈独秀原计划乘坐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入川。忽遇阔别多年的大姐，携家逃难，到了汉口，姐弟相逢，又盘桓了多日。

6月25日 托洛茨基写信给李福仁，一再建议陈独秀到美国去。他说：“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6月底 陈独秀的过继母亲谢氏和三子陈松年也到了武汉。陈独秀请包惠僧帮助，先请母亲、大姐及松年等人乘军用火轮入川。

7月2日 陈独秀乘坐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专轮入川。7月2日抵达重庆，先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后迁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内。

7月7日 陈独秀发表了《抗战一年》一文。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

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敌人的失败。同时提出了“严惩贪污分子”等四项要求。

7月14日 陈独秀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他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说：“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和防守的，川军颇居重要地位……我们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

7月16日 陈独秀发表了《民族野心》一文。他认为：“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

同日，陈独秀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之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最后他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7月21日 发表了《论游击队》一文。他说：“妄想拿农村

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国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

7月27日 发表了《说老实话》一文。提出“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次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8月1日 发表了《敬告侨胞》一文，是为暹罗《华侨日报》而作。他说：“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他还提出：“我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怕的地方。”

8月2日 还发表了《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一文。他说：“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他还攻击我们党说：“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

8月2日 在《政论》一卷发表了《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一文。

8月3日 因重庆天气太热，对陈独秀的高血压病不利，因而迁到江津县。原计划住在他留日同学邓仲纯（邓初）家

中，因邓妻不允，经同乡方孝远的介绍住进了小客栈。7日又迁到东门里郭家。

8月8日 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而战?》一文。提出：“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瞭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他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他说：“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他又攻击我党说：“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8月15日 发表了《八一三》一文，认为“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

8月21日 发表了《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批评了日本一些社会主义者支持侵华战争。同时批判了周作人等人高谈在日本统治下中国文化再生的谬论。

8月24日 在《政论》旬刊第一卷第23期上发表了《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他说：“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9月3日 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在瑞士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中国托派组织成为第四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

10月12日 在《政论》旬刊第一卷第29期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文。他说：“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10月21日 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致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帮助陈独秀去美国。信中说：“仲甫于7月2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信，现住离渝百二十里之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60高龄，使弟十分悬念，未能去怀。私念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质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之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送行，感甚祷甚。”胡适曾为此事奔走安排，因陈独秀坚不肯去美国，只好作罢。

秋 陈独秀去江津时，陈松年仍留在重庆，和安徽同乡筹办国立第九中学。后决定九中设在江津，陈松年在该校任教，才陪同祖母谢氏去江津，与陈独秀同住。

冬 陈独秀迁居到江津黄荆街83号，住在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后院。

年底 陈其昌由上海绕道香港,到江津去拜访了陈独秀。并带去了托洛茨基 6 月 25 日的来信。

1939年 60岁

1月9日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长信,请陈其昌带回上海,由李福仁设法转寄。他在信中说:“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的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了。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又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

关于上海托派临委,他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又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1月29日 上海托派临委彭述之等人见到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后,十分气愤,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认为自己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不同意陈独秀的指责。

这一报告也同时寄给托洛茨基。

2月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36卷4、6号上发表了他在狱中写的《广韵东冬钟江之古韵考》一文。

3月 托洛茨基看到了陈独秀的信和临委的报告，他认为临委的意见是对的，但又不愿开罪于陈独秀，因而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表示：“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他表示：“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的分歧。”见于陈独秀和临委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他建议调陈独秀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

3月11日 托洛茨基再次写信给李福仁，提出：“我始终以为他(指陈独秀)最好是到美国住一个时期。”“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经常同他合作。”

托洛茨基还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到美国去，遭到陈的拒绝。

3月22日 陈独秀的过继母亲谢氏在江津病逝，终年78岁。陈独秀极为悲痛，他在写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表示“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夏 上海托派临委接到托洛茨基的指示后，感到委屈，专门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 S同志问题》(D. S即陈独秀)。指责“D. 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

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最后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建议，希望陈独秀能到美国去。

夏 陈独秀迁去江津后，北大同学会派罗汉专门照顾其生活，后因日寇轰炸重庆，罗汉可能被炸死。北大同学会又决定派何之瑜负责照顾陈独秀。何之瑜与陈松年都在九中任教。

7月 因潘兰珍与邓仲纯妻子不睦，陈独秀又迁居到江津城外30余里的偏僻山村——鹤山坪。先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因地区偏僻、孩子吵闹，不久，又迁居到石碑院的杨鲁承旧居（现属江津县双石公社实农大队二队）。

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家中藏书很多，院内景致优美，院外视野开阔，环境宜人。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请陈独秀帮助整理、校正杨鲁承的遗著，所以请陈去杨氏山庄居住。后来，陈独秀也帮助整理了二本著作，《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手稿》和《杨鲁承先生遗著六种》，各印1000本送人。

陈独秀还为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在成都读书）题诗一首，其中说：“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9月 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一首五言长歌《告少年》。他把民主抬到无限的高度，而仇视任何形式的专政。特别是借此攻击斯大林。他在歌中写道：“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二者惟君择，送死顺则生。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他又加“后批”说：“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痲疫鬼也，以此喻斯大林。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

9月5日 陈独秀致函郑学稼。

是年 陈独秀先后给杨鹏升去信八封。杨鹏升是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军，四川人，慕陈独秀名气，经常在经济上资助陈。陈独秀曾为其父写过墓志铭。

年底，杨鹏升来信邀请陈独秀去成都一游，陈顾忌成都海拔高，对高血压不利，未能成行。

陈独秀在江津交往最多的是邓仲纯。他在鹤山坪生病时，邓仲纯每隔三天下乡来为其治疗一次。邓成了他的保健医师兼义务通讯员。

经邓仲纯介绍，陈独秀又认识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二邓是江津地方名绅，比较开明，喜办文教事业，在重庆办了“蟾秋图书馆”，在江津亦有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陈独秀曾应聚奎中学老师之请，为邓蟾秋70寿辰题字，“大德必寿”；还用篆字写了“寿考作仁”送邓蟾秋，都刻在校园内两块大黑石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捣毁）。解放后，邓蟾秋曾任重庆市人民代表，邓燮康曾任重庆长航分局副经理。

1940年 61岁

3月2日 陈独秀写了《给西流的信》（西流即濮德治）。

他在信中说：“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1914年大战之现存结论，也应该用自己的脑子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

又说：“怎样阻止法西斯胜利呢？我认为只有希特勒对英法战争的失利，和以前拿破仑第三战败一样，引起国内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的胜利。”

3月5日 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

3月24日 陈独秀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赞扬了蔡元培先生的美德，并讨论了国粹和道德问题。他说：“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又说：“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

4月24日 陈独秀再次给西流写信，提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今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

不久，陈独秀第三次给西流写信。他认为苏、德是一条战线，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柏乌政治是一样的东西。他说：“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

6月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发表后，托派中央作了一个《临委对D. S来信的决议》，认为他的观点已经离托派的传

统观点太远了。决议中说，“他如坚持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无法接近，无法合作。”

7月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白序中，继续攻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说：“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政策，实行到底了。”

7月31日 陈独秀发表了《给连根的信》，提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跟着学话。”

他还批评王文元等人办的《破晓》杂志上的文章对“对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

8月2日 陈独秀寓所被盗，窃去衣被等十余件，还有他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文字学著作草稿。后来衣物找回，但图章和手稿却失落了。

8月20日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

9月 陈独秀给西流写了一封长信，极力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据苏俄20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共有六条：

“（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

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二) 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三) 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四) 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五) 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斯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

(六)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

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遍了全世界……”

陈独秀在信中还以英美法的民主制和俄德意的独裁制作了五条对比。

11月28日 陈独秀发表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共提出十五条看法，主要的有：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的局势。”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

“（三）……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

“（七）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问题。”

“（九）……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11月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37卷22号上发表了他在狱中所写的《中国古代史表》一文。

12月 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陈独秀曾到江津城里住了一个时期。

是年 陈独秀在江津深居简出，交际很少，有时在潘兰珍陪同下，到江津城东的“支那内学院”游玩。学院是由南京搬到江津的一个研究印度佛学的单位，院址在长江边，风景很好。陈独秀去时常同高语罕、欧阳竞吾、苏鸿怡等人聊天或打牌。

是年 朱蕴山拿了几只鸭子去看他。他为朱题诗道：“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俸独噬武荣碑。”可见当时生活已贫困至极。据邓仲纯对朱蕴山讲，周恩来同志曾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回延安。陈独秀坚持错误，未予同意。

是年 陈独秀先后给杨鹏升去信18封。

1941年 62岁

1月10日 托派中央作了一个《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对陈独秀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D·S对于战争和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了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决议”还要求“D·S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决议”希望陈独秀立即参加托派的组织生活。

1月16日 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38卷第2号上发表了《禹治九河考》。

1月19日 陈独秀写了《给S和II的信》，说他“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

同日，陈独秀还写了《给Y的信》，其中也谈到了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问题。

2月6日 陈独秀曾去重庆宽仁医院治病，住院两星期，医药费是由杨鹏升帮助的。2月20日返回江津，曾在邓燮康家中留住数月，夏天才返回鹤山坪。

2月25日 汪孟邹致函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秋 陈独秀为他在狱中写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写了自序，在江津油印了若干册，馈赠友人。

12月7日 陈独秀写了《给L的信》，公然宣称列宁所创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国布朗基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混合物。他将要“为文”来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

12月23日 陈独秀写了《致郑学稼信》，宣称重新评价马

列主义的工作，他已经作过了。他“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并表示他“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之教训》，将我辈从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是年 陈独秀在给濮德治的信中还表示：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如果他俩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就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

在给濮德治最后一封信中，他还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一个公式：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共产主义。

是年 陈独秀在江津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使用着破旧家俱，有时还自己种土豆吃。他的生活来源，一是靠北大同学会和一些老朋友及邓燮康的接济；二是担任《时事新报》的名誉主笔，每月有些津贴，有时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填补亏空。

陈独秀在江津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一直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江津县长黄鹏基(北大学生)曾对其老同学龚灿滨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侦察他的行动，一两个月要问问。”

是年 陈独秀先后给杨鹏升去信十二封。陈独秀曾劝他出去做官，最好担任县长或管理粮食的职务，这样可以发大财。关于他自己，在信中说：“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陈独秀在信中对当时生活费用昂贵表示不满，他说：“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正多，政府何不图之以自救耶。”又说：“不审何以应付之，拟否另设他法谋生，便中乞讨一二。”

1942年 63岁

年初 因四川天气炎热，对陈独秀的病体不利，加之经济困难，曾想去贵阳，因那里生活水平较低，后因病未能成行。

2月10日 陈独秀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3月21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他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

他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3月 发表了《再论世界大势》一文。他设计了一个人类进化史表：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古代世界(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近代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制)→法西斯蒂专制→未来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据此，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后可能要进入法西斯蒂专制时期。

5月13日 发表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他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他还指责苏联说：“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

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

这是陈独秀的最后一篇文章。

同一天，还发出了《给Y的信》，表示不愿在江津日报上发表文章。

5月 中国托派正式分裂为多数派(彭述之等)和少数派(王文元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在对待抗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王文元等主张，中日战争“已从属于美帝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一部分”，因此，“对国民党领导的战争态度，本质上更符合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指示的‘革命失败主义’”。彭述之等人则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彭述之得到了第四国际的支持。

不久，彭述之领导多数派召开了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他为首的托派中央领导机关。并把持了托派刊物《斗争》和《火花》，公开与少数派决裂。少数派另组了自己的中央，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国际主义者》。

抗战胜利后，多数派又创办了《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为《新声》)等刊物。少数派也创办了《红旗》杂志。一九四八年底，多数派召开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1949年4月，少数派也召开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托派组织都作鸟兽散了。

是年 陈独秀在江津除发表一些文章和书信外，主要精力是研究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他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小学识字课本》(小学指文字学)，拿到重庆出版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改书名，陈独秀不同意。因此未能正式出版，只在江津

油印过一部分。陈独秀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写完，最后整理到“抛”字，没有注释完就因病去世了。该书后为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印行，书名为《文字新诠》。

是年 陈独秀先后给杨鹏升去信三封。杨曾请他为印谱叙文，他因身体不佳，兴趣大减，以“外行”辞谢。他在回信中说，病魔缠身，文斗也黯然了。

5月中旬 陈独秀因治疗高血压病，误饮蚕豆花水中毒。13日，为欢迎远方朋友又食之过量，造成便秘，引起心脏病突发。17日开始昏迷。经多方抢救无效，于5月27日晚9时40分逝世。

陈独秀的医药费和丧葬费，都是由北大同学会出面募集的。蒋介石捐款1万元，陈立夫2千元，此外捐款的还有许静人、朱骝仙、段书贻、王抚五、余骥、胡小石、金鸣宇、欧阳竟吾等人。共捐赠3.3万多元。

陈独秀逝世后，《时事新报》、《新民报》都发表了消息，对陈独秀早期的活动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对他的晚期评论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陈独秀逝世后，一些托派也发表了悼念或评论文章。郑超麟发表了《悼独秀同志》一文，认为陈独秀到死仍是一员“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并说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彭述之发表了《悼陈独秀》一文，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是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从革命的

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的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

陈独秀逝世后，潘兰珍女士去重庆市郊农场工作，后改嫁一国民党下级军官，不久此人又病故，只得返回上海。1949年10月30日因患子宫癌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

6月1日 将陈独秀的灵柩暂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这是邓燮康家的莹地，此处背靠青山，面临长江，风景优美。

抗战胜利后，遵照陈独秀的遗嘱，陈松年于1947年6月，将灵柩运回安庆，安葬在北门外十里铺叶家冲（现十里乡林业大队先锋生产队）。并立了刻有“先考陈公仲甫之墓”的石碑，“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

1979年，重修了陈独秀墓地，重立了石碑，刻有“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